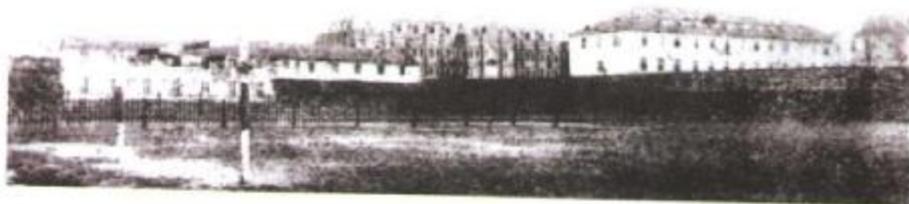




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 (1840—1939)。



依纳爵公学(又称徐汇公学)校舍。马相伯曾在该校求学(1851—1862), 后又担任校长(另一说为学生督导)。



早期震旦学院校舍。(1902—1905年, 马相伯在该校担任监院(即校长)。



1905年, 马相伯在吴淞水师提督行辕创办的复旦公学。



1929年，马相伯（右二）与蔡元培（左一）、于右任（左二）、吴敬恒（右一）合影。

马相伯



1931年9月，马相伯（坐者）与弟子于右任合影。



1937年8月3日，救国会七君子出狱后和杜重远一起拜谢马相伯（坐者）时合影。



辅仁大学师生代表拜谒马相伯时合影。

马相伯



辅仁大学全景。马相伯为该大学发起人之一。

歐洲為民治說久矣，不過大戰後愈盛行，蓋實行耳。我國則記曰：百姓則君以自治也。不曰則聖賢而曰則君者，君力之所由出，則曰則君以自治也。就於事而言耳。且君自治，絕非被治者則民自治也。非被治矣。頃年民法學會交際，負兼新自治報記者劉君，此虛來自上海編此同志志，在在理之民法會以應天下政潮之主論也。果盛行則在中國何日可實行，可不問矣。謹求同志諸公會為先。

馬相伯



馬相伯先生手迹之一。

致知说

相伯为良著

小引

题见大学朱注：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

不老也。殆即西岸所谓 Philosophia 非穿解非阿，译言爱知者

殆盖希腊：解非阿言知。非穿士言爱。世纪前三世，其国七贤之

一阿利士乃，持字多知。至西穆美封，白休教云，抑译推爱而知

耳。说见名理探，密谓惟其爱也，故欲推极之。和译曰：哲学，似泛不

如大学曰：致知，格物为学工夫。与希文更切。字义尤醒。次致知章

既亡，则神大而求诸野柯，殆西岸之说以补之。是故推知是谓大

马相伯先生手迹之二。

讀書不忘救國  
赫國不忘讀書

南京復旦同學會

九八 亥 相伯 印

馬相伯先生手迹之三。

我戰則克

庚董將軍賜

汝唯不矜

魏顧由之書

馬相伯先生手迹之四。

古之遺直也

右任先生所

中國有人焉

魏顧由之書



马相伯先生和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作者）合影。

马相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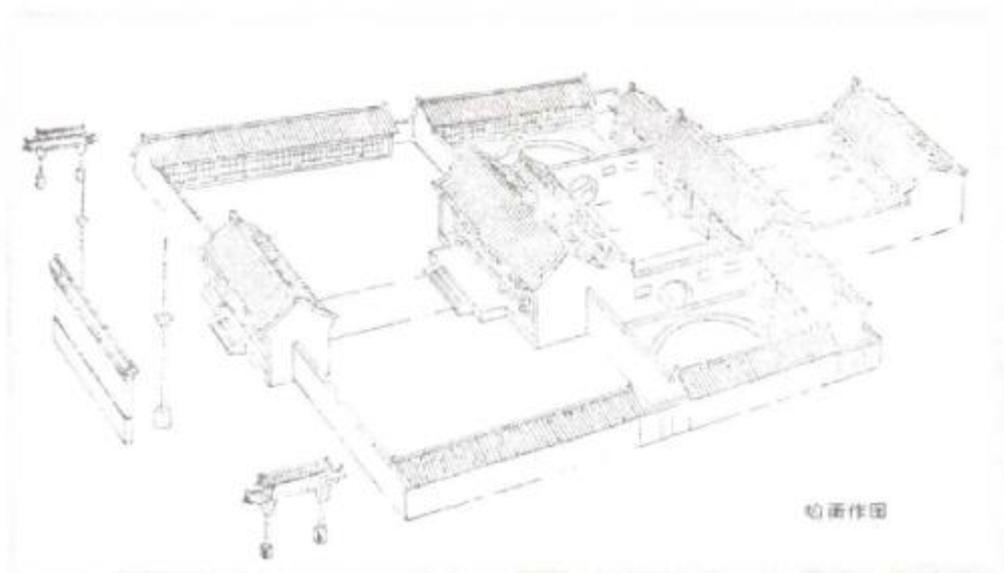
马相伯 75 岁时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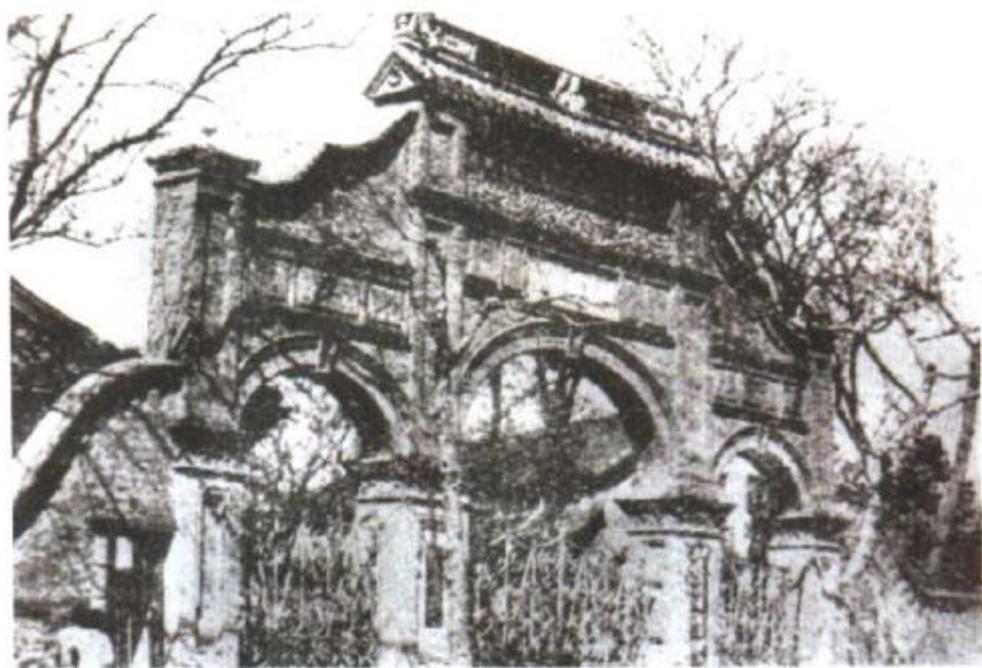
马相伯 90 岁时留影。



马相伯 100 岁时留影。



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该图形象地再现了1905年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的面貌。



1912—1921年，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在徐家汇时期的校门（原“李公祠”）。该校门已毁，现为复旦中学。



1912—1921年，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大礼堂（原“李公祠”享堂）。



20世纪20~30年代时期的复旦大学校门。



马相伯与重孙在一起。



马相伯

马相伯



马相伯先生百岁诞辰日与孙女马玉章合影。



复旦公学第二任  
监督(校长)严复。



私立复旦大学首  
任校长李登辉。



马相伯弟子于右任。



马相伯弟子邵力子  
任复旦校董时留影。

马相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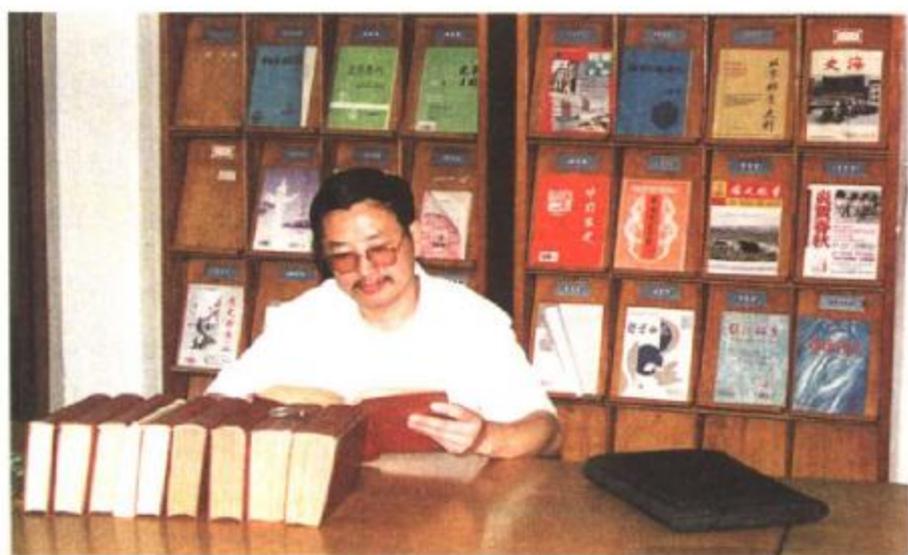


2002年6月17日，马相伯孙女马玉章与本书作者黄书光合影。



**主编** 章开沅，浙江吴兴人，1926年生。1946—1948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1951年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至今。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1984—1990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3—1990年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90—1995年，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所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第14届“黄林秀莲访问学人”等。美国奥古斯坦那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田纳西州长授予荣誉市民证书。撰著及主编的主要学术著作：《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张謇传》《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国教会大学的历史地位》《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实斋笔记》《鸿爪集》等。



**主编** 余子侠，亦名子峡，湖北蕲春人，1953年生。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毕业生。先后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华中师范大学获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兼职教授。其学术研究涉猎教育学、史学等学科领域。撰著主要学术著作《山乡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等。先后在《教育研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日)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及学术研究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10篇为国家教委主办的《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主办的《中国近代史》、《教育学》、《中国现代史》等刊转载。参编的多部学术著作先后荣获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学科类一、二等奖。



**本书著者** 黄书光，1962年11月生，1989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98年晋升教授。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专职研究员。已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教育哲学史》（第四卷）、《胡适教育思想研究》、《陈鹤琴与现代中国教育》、《理学教育思想与中国文化》、《国家

之光 人类之瑞——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合著及参编著作有《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文化革命》、《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等7部，发表论文50余篇。1997年荣获“上海市高校优秀青年教师”称号，2001年荣获“宝钢优秀教师奖”，2003年荣获“第四届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 图片说明

本书征引图片，主要来自如下出版物，特此说明并向原版权所有著者深致谢意。

- 1 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一卷（1905—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 2 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上海书店1990年据上智编译馆1947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97。
- 3 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上海书店1990年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二编97。
- 4 宗有恒、夏林根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 5 顾卫民著：《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 6 郑勇编撰：《蔡元培影集》，山东画报社，2001年版。
- 7 许有成、徐晓彬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 8 金以林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 9 《中央日报》，1937年5月16日。
- 10 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复旦校友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 总

## 序

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些大学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层次、水平，但凡能赓续流传至今者，大多经过漫长的艰苦而又曲折的奋斗历程，并且留下极为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必将有所裨益。历史同样呼唤人们面向未来，它只为现实提供借鉴与智慧，决非单纯诱使人们沉溺于怀旧之情怀。

在百余年中国新式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有一大批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先驱者，他们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国现代大学的奠基与成长做出无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



些先驱者的功绩。特别是其中那些办学有成的著名校长，他们和他们所辛苦经营的著名大学，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一块块丰碑。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精粹，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其成功或是错误（甚至失败）之处，都给后世留下一笔极其宝贵的遗产。我们编辑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并给以阐释评论，不仅仅是为了继承这笔遗产，为了纪念逝者，更重要的是为今日高等教育的深刻变革提供参考。

现今的高等教育的整体，无论是从数量、规模、师资、设备、水平哪一方面来说，当然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那些大学。然而，这些老大学毕竟为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它们的校园、师资、学生、图书、设备，不仅是历史的遗迹，而且至今仍然为许多大学的发展做着贡献。历史本身就是一种资产，而某些重要的无形资产的价值甚至远远大于其相关连的有形资产。所以，这些年来，不少精明的高校管理者都极为重视保存本校的历史，除档案文献以外，还努力维护古老的建筑、景观乃至图书、设备，用意在于彰显其悠久而又丰厚的历史底蕴。这些工作当然非常重要，而且迟至现在只能说是亡羊补牢。

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应该认真总结这些既往办学者的经验教训，继承与发扬其优良传统，避免其已经走过的弯路，克服其弊端遗留的消极影响。只有这样，历史才能成为财富而不是包袱，而人们也只有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对于历史的超越。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重复前人



已经走过的路,真正以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为起点去攀登新的高峰。我反反复复讲这些老生常谈,决不是无的放矢,更不是因循守旧。在较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我们由于不尊重历史而蒙受的损失与走过的弯路已经太多太多,而且这种错误往往是周而复始地出现。真理不怕重复,至少是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为何物而盲目自信的所谓权威人士,更应该经常忠言直谏(请原谅我又用了一句陈腐话语)。我们这一代高等教育工作者,亲身经历此类弯路太多,因而才有如此深沉的感慨,也才有如此深切的醒悟。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是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与优化自己,包括相关理论、观念、方式、方法及其实践等方面。现时人们总是片面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殊不知教育还必须正确引导社会的走向。教育史不仅记载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教育如何促进社会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如何纠正时弊乃至推动社会变革。教育并非总是被动地亦步亦趋地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教育的发展具有前后自相延续的相对独立性,而其中恰好蕴含着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如果背离教育的基本规律,任何貌似新奇的变革终将遭到失败,甚至遗留长远的负面影响。这类惨痛的教训,我们经历得还少吗?

20世纪80年代,我曾参与高校管理工作,深知校长责任的重大,不仅其办学理念、谋划决策关系着学校的发展走向,而且其一言一行所体现的品格、作风,也悄然无声地对众多师生员工产生某些影响。甚至在卸职多年以后,偶然



在外地遇见相识的或已忘记姓名的校友,经常可以听到“某年某月某会曾听过你的报告,你说过的某几句话给我印象特深”之类亲切怀旧话语。我给学生做报告一般不带讲稿,往往采用对话交流方式,学生虽然听得兴趣盎然,自己却惟恐口无遮拦而可能给他们以某些误导,所以,每逢听见过去的学生复述我的若干“佳句”时,内心深处往往涌生惶悚之感。也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对于历史上这些著名大学校长理解渐深而敬佩日增。他们当年的办学条件比我们差,困难比我们大,可以利用的资源比我们少,却能与众多教职员工同心协力、苦心经营,把学校办得各有特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并且在国内外赢得与日俱增的声望。可以说,他们的生命与学校已经融为一体,而学校的声名正是他们与众多教职员工一起用心血浇铸而成。所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结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我想,《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的出版,当可使读者重温这些著名教育家的音容笑貌,并从他们的生平业绩中吸取许多有益的养分。

他们之所以能把自己的大学办成海内外公认的名校,首先在于他们具有明确的办学理念,并且把人格塑造放在首要地位。在他们看来,知识传授与能力训练只是手段,新型的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培养才是主要目标。因此,在要求学生努力读书的同时,更强调学会做人,而人格教育遂与通识教育合为一体。同时,他们都具有世界眼光,不仅注意教





育与国际接轨,加强对外学术交流,而且关注世界教育改革潮流,瞄准发达国家顶尖名校,以一流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此外,他们还善于节约运用有限的资源,决不好大喜功,贪大求全,而是在一定时期集中力量办好若干重点专业和重点学科,以求形成自己的特色,并在某些领域形成优势。当然,他们都是长期工作在教育第一线的科学家,深切理解并极为尊重教育的内在规律,譬如重视基础,循序渐进,学用结合等,因此,才能以较少的资源获致较大的效益,使学校发展蒸蒸日上。

这些校长本身就是全校师生员工的学习榜样,他们的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儒雅风貌,如春天的细雨一样润物于无声。言教不如身教,乃是多数著名校长的准则。他们反对哗众取宠,恪守职业伦理,注重行为规范,这些都对学校优良传统的形成产生深远的影响。当代大学校长在国际视野、知识更新与管理能力等方面可能有超越前辈之处,但是,在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恪守伦理行为规范和艰苦奋斗、勤俭办学等方面,恐怕仍然需要向先驱者学习。对于当前社会风气的某些不良影响,并非所有高校主管人员都能高度自觉且富有成效地抵制,大学校园已经不再是一方净土。尽管现在我们大家已把大学的定位从精英教育改为大众教育,但大学(特别是著名大学)就整体而言仍然是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因此,大学校园风气的败坏,乃是最可怕的败坏,因为这必将影响一代新人的健康成长,甚至正如海外某些报纸所直言:意味着社会良心的迷失。我们并非过高期望大学的作用,而是希望大学应该自觉地承受更为重大的



社会建设的责任,不仅是物质文明,而且还有精神文明。如果本书系能增强读者在这方面的醒悟,那将是我们最大的欣慰。

回顾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我对现今大学校长任期制的具体运作还有一点儿看法,即千万不可也不必机械执行。因为对一所大学的内部情况与外部环境,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真正有所认识,而制订学校发展的目标与规划,以及相应的制度、条例等,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检验其利弊得失。在短短四五年时间内,是很难实现一个校长的宏大抱负与施政方针的。实践表明,校长与领导班子的频繁更换或更换幅度较大,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并不一定有利,有时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校长与教职员有一个相互认识过程,其所花费的精力与时间,远远超过对于校园、建筑、图书、设备的熟悉。平心而论,仅仅了解一所万人以上的大学的全面情况,没有三五年也很难形成校长自己的真知灼见。萧规曹随容易被等同于因循守旧,但其中确有合理的成分,即应该尊重前任的经验教训;对于那些行之有效的大政方针,不必也不应轻率加以变更。譬如蔡元培有关兼容并包、择才而用乃至提倡美育等等精彩教育理念,从蒋梦麟到胡适等后任校长都能承续推行并加以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在数十年内形成北大优秀的传统校风——北大精神。如果每逢来一位新校长,下车伊始便哇啦哇啦宣称什么学校发展的新纪元,另提一套未经深思熟虑的新目标、新蓝图、新口号,势必造成师生员工思想混乱,很难形成新的共识与默契。高校颇感痛苦的是缺少相对持续稳定且行之有效的办学准



绳,不断地推倒重来,又不断地整顿纠偏,乃至形成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我期望有更多的人温故而知新,从本书系中汲取若干有益的办学规律。

当然,强调大学校长决非提倡人治,更不是提倡家长制独裁。对于大学来说,民主作风与学术自由具有同等重要意义。每一个办学卓有成效的著名校长,大多具有较高的民主观念,至少是逐步推行教授治校,努力发挥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与个人资质相较而言,应该承认制度更为重要。任何优秀的校长总有自己的任期(或长或短)限制,但健全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往往可以延续数十年。我在海外一些名校工作,深感规章制度相对稳定的重要,而严格遵守规章制度更为重要。我每到一所学校,开学伊始接受 Orientation,时间不过两个小时,主要是介绍学校重要规章制度,不像我们对新教职员的岗前培训要花费3天乃至1周,而且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务虚”接受思想教育。我常爱说一句话:“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校园譬如军营,师生如同士兵,老师(包括校长)、职工和学生一批一批来了,又一批一批走了,如同连绵不绝的流水,但名校如同铁打的营盘,历经世变沧桑而长盛不衰,靠的就是一套人人必须遵守的合理制度。光靠校长自身的聪明才智,是治理不好大学的。我愿读者认真体味斯言。

我热爱高等教育,尊重前人的劳绩,更关心现今乃至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高等教育从一百多年前走来,它与现今高等教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近代以来大学校长们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用美好理想和教育实践酝积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治校经验,以及他们承先启后、发扬光大、舍我其谁的心志,必定对跨入新世纪的人们认识高等教育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刻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学校长作为研究对象,编撰出版《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

学术研究需要凝结朝气蓬勃的学术力量,发挥团队的智慧。为了保证本书系的学术水平,我们从全国多所大学广泛敦聘专家、学者,群策群力,共襄斯举。我们很高兴,本书系的撰著者,都是多年来活跃在中国教育史、中国近现代史及高等教育管理研究领域术业有专攻的学者。旧友新朋,为了共同目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讲究严谨求实的学风,不囿成说,勇于创新,各展学术个性,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两年来,孜孜兀兀,笔耕不辍,对大学校长的教育思想及办学特色作出了新的认识,新的考辨,新的评判,新的结论,这是很可宝贵的,也是本书系可以欣然贡献于学术界和读者朋友的。

本书系得以顺利完成,实赖于各位撰著者的精诚合作,谨表衷心的感谢;本书系终能如期付梓出版,还有赖山东教育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谨表诚挚的谢忱。此外,我们对本书系所有被征引的资料和图片的著作者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章开沅  
2003年2月





# 目 录

<b>第一章 国难中的求学与教士生涯</b> .....	(1)
一、天主教家庭文化熏陶 .....	(3)
二、私塾生活与个性成长 .....	(7)
三、上海依纳爵公学的中西学磨练 .....	(11)
四、徐家汇神学院深造与神学博士学位 .....	(18)
五、教士生活的尝试与受挫 .....	(23)
<b>第二章 人生转折：从宗教追求到政治参与</b> .....	(28)
一、赴山东参与洋务新政 .....	(29)
二、担任朝鲜国王顾问期间的改革建言 .....	(31)
三、轮船招商局的调查与反思 .....	(36)
四、滑稽的美国之行 .....	(40)
五、欧洲考察与沉思 .....	(42)
<b>第三章 艰难跋涉：教育救国与政治信念</b> .....	(47)
一、强国之路的反思与教育救国思想形成 .....	(47)
二、政治民主化的不懈探索 .....	(53)
三、教育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综合治理 .....	(60)
<b>第四章 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上)</b> .....	(66)
一、毁家兴学与创办震旦学院 .....	(67)



二、震旦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	(72)
三、民主自治制与震旦风潮 .....	(78)
四、复旦公学的诞生 .....	(82)
五、经世致用与复旦公学的价值取向 .....	(87)
六、复旦公学的办学成绩与曲折发展 .....	(90)
七、薪火相传与复旦大学崛起 .....	(99)
八、治校经验与管理创新 .....	(105)
<b>第五章 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下)</b> .....	(121)
一、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与总统府高级政治 顾问 .....	(122)
二、构建理想中的中国科学院——函夏考文苑 .....	(126)
三、发起筹建辅仁大学 .....	(138)
<b>第六章 宗教探索与中西教育思想的文化审视</b> .....	(150)
一、宗教的精神价值与教化功能 .....	(151)
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	(157)
三、反对文化殖民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 .....	(163)
四、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精神的把握和吸收 .....	(173)
五、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	(178)
六、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与汇合 .....	(187)
<b>第七章 国难中的民族精神与教育文化使命</b> .....	(199)
一、发表抗战言论,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 .....	(200)
二、主张民治救国,坚信人民力量 .....	(207)
三、组织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 .....	(211)



四、阐发国家民族精神,引领青年前进方向 .....	(219)
五、重申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 .....	(223)
六、举世敬仰的救国老人 .....	(225)
七、哲人星黯,薄海同悲 .....	(234)
<b>第八章 马相伯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b>	<b>(241)</b>
一、立足爱国、与时俱进的宗教、政治与教育价值 取向 .....	(242)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与开拓者 .....	(249)
三、近代大学理想的不懈追求 .....	(253)
四、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	(257)
<b>附录 马相伯生平大事年表 .....</b>	<b>(261)</b>
<b>主要参考文献 .....</b>	<b>(279)</b>
<b>后记 .....</b>	<b>(286)</b>



## 第

## 一

## 章

## 国难中的求学与教士生涯

马相伯,原名志德,学名斯臧。又名钦善、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或湘伯、芑伯。受洗取教名若瑟(Joseph),亦号若石,晚年号华封老人。1840年4月7日(清光绪二十年三月初六日)生<sup>①</sup>,

<sup>①</sup> 关于马相伯的生日,有1840年3月17日(阴历二月十四日)、3月20日(阴历二月十七日)、4月7日(阴历三月初六日)、4月17日(阴历三月十六日)、4月18日(阴历三月十七日)等说法。张若谷据拉丁文天主教耶稣会士同会录,判定4月17日“或可作为最正确之记录也”。(张若谷:《马相伯先生生日考》,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生年谱》附录4,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本,《民国丛书》第2编97,第290页)方豪先生则以《马氏族谱》及其中夹纸为据,断言马相伯生日为4月7日(阴历三月初六日)。(方豪:《马相伯先生生日考及其他》,原载1947年2月7日《天津民国日报》,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2015页)本书拟采用方豪先生的说法。



原籍丹阳，尝寄居丹徒<sup>①</sup>。他自幼接受宗教教育，“严母慈父”般的家庭教育和传统的私塾生活为马相伯的人格成长奠定了基础。12岁那年，马相伯独自来到梦想中的上海，先是进依纳爵公学（又称徐汇公学），后在徐家汇神学院深造，完成其漫长而独特的中西学系统训练，至31岁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很快成为令人尊敬的校长和教士。然而，饱

① 关于马相伯先生的籍贯和出生地，有丹阳和丹徒两说。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页称：“先生原籍丹阳，寄籍丹徒”；“诞生于江苏丹徒城”。但张先生在该《年谱》附录1《奋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又称：“江苏省丹阳县的马家村里，有一个小孩子出世了。这个新生的小孩子，就是后来享百年上寿的中国人瑞马相伯先生。”（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第235页）二说自相矛盾。由马相伯口述、徐景贤笔记的《一日一谈》则说：“我的祖籍原来是丹阳，而我自己却生在镇江（即丹徒）。”（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3页）带着疑问，我于2002年6月17日拜访并请教马相伯先生的孙女马玉章先生，她很肯定地对我说：“爷爷生于丹阳马家村，后赴丹徒考童生。”之后，她老人家亲自写下此数字，叫我保存。其实，由李青崖撰写、马玉章校补的《马相伯先生传略及其办学经过》一文已写明：“先生1840年生于丹阳，后寄居丹徒。”（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28~129页）尽管如此，我仍将信将疑，近读韩景琦《记马相伯先生两三事》，始有所释然。他解释说：“马老诞生在江苏丹阳县北乡马家村，但早年填写籍贯往往写丹徒，晚年才改写丹阳。我曾为此事问过他老人家，他讲了一段情节。原来在清代，他和胞弟眉叔（建忠）在丹阳应童子试，丹阳一伙头脑冬烘的读书人，为了他兄弟两人有些文名，怕占了生员名额，便拿他家信教作为攻击的把柄，反对他们应考。恰巧丹徒方面有人拉拢，他父亲又在丹徒行医，并开药店，这样就在丹徒县入泮，所以，后来有时写丹徒籍贯。”（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43页）另据《马氏族谱》记载，马相伯的祖父母乃“合葬丹阳北门外贡家村后”，也可作为马相伯籍贯的佐证。（方豪：《马相伯先生生日及其他》，见《方豪六十自定稿》下册，第2013页）由此看来，马相伯籍贯丹阳已无疑问，但其生于丹阳还是丹徒，尚有待学者进一步深入考证。



受侵略的国难忧思始终隐藏在他的心灵深处,青年人所特有的热血高昂的救国情怀使他无法继续过着平静的教士生活,最终做出抉择——“弃圣入俗”,从而开始其新的人生探索。

## 一、天主教家庭文化熏陶

马相伯的远祖,传说可上溯至宋末乐平人、官至宰相的马廷鸾,其子马端临乃煌煌巨著《文献通考》编纂者,即是马相伯的第20世祖。对马相伯成长产生实际影响则是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及信奉天主教的独特家庭背景。

马相伯的祖先何时从江西乐平迁至江苏丹阳已难确考,但丹阳作为文教圣地则很早就闻名于世。宋庆历年间,丹阳即依夫子庙建立县学,其后有识之士不断拓展,屡加增修,读书声绵延不绝。在地理上,丹阳“东通吴会,南接江湖,西连都邑,亦一都会也”<sup>①</sup>。它与邻县丹徒、金坛从宋政和三年起即同属镇江府,并显于天下。“唐宋以来,屹为重镇。皇元一统,适当南北冠盖之会。是以上下千数百年,名公巨卿,鸿儒硕彦,项背相望。”<sup>②</sup>

与这一浓郁的儒家人文精神相契合,丹阳、丹徒一带也是我国较早接受西方天主教地区之一,元代时就已成为信奉“也里可温教”——即元代天主教较为集中的区域。陈垣

<sup>①</sup> (元)俞希鲁编纂:《至顺镇江志》上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66页。

<sup>②</sup> (元)俞希鲁编纂:《至顺镇江志》下卷,第709页。





先生曾据元至顺《镇江志》中的“户口”类统计指出,当时镇江“侨寓户 3845,中有也里可温 23,是 167 户中,有也里可温 1 户也。口躯合计,13 530,其中也里可温 215,是 63 人中,有也里可温 1 人也”<sup>①</sup>。足见当时“也里可温教”在包括丹阳、丹徒等整个镇江地区已颇为流行。1599 年,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进发北京之前曾驻足于镇江一带<sup>②</sup>,从而进一步推动天主教在该地区的广泛传播。至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仅从无锡到扬子江边这一地区,就“有七八百名丹阳教友聚居在 4 所小堂周围;另有 300 名左右在城内或近郊,靠近东门有一座小小的但也还像样的公所,那就是神父的住所”<sup>③</sup>。马相伯的先祖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很自然地成为天主教信徒。马相伯在《一日一谈》中说:

我们家庭奉天主教由来很久,大约在利玛窦到中国来以后,我们的祖先便成为教徒。我的外公外婆也是奉天主教的。<sup>④</sup>

至于马相伯的父母亲,更是虔诚的天主教教徒。

马相伯的父亲马松岩,名岳熊,号锦华,是一个信奉天

① 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见《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第 8 页。

② [法国]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 年,第 253 页。

③ [法国]史式微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 1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第 253 页。

④ 马相伯口述,徐景贤笔记:《一日一谈》,“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35 页。



主教的中医兼商人。据马玉章先生介绍,曾祖父马松岩常借助独轮车在乡间既行医又经商,独轮车一旁置一药箱,另一旁则摆上布料等小商品,有时被戏称为“卖布郎中”<sup>①</sup>。最为乡人称赞的是,他行医全身心投入,有些则免费送诊,表现出十分高尚的医德。这一宽厚仁慈的精神品质对马相伯的人格成长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马相伯回忆说:

他的心非常慈善,对于贫穷人家,一律送诊,分文不取。遇有害疮疥痛疽等症的,亲手替他洗涤,缚药,包扎。我小时看见了便恶心,他却处之怡然,一点也不怕龌龊,其惜老怜贫如此!<sup>②</sup>

马相伯的母亲沈太夫人也是天主教教徒,贤淑达礼,持教严厉。与以慈祥见称的父教不同,沈太夫人对子女的学业品德乃至于一言一行均提出严格要求,人称“严母慈父”。马相伯回忆道:

我小时,母亲教导我极为严厉,对于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不肯忽视。譬如,同人说话,绝不许加人以恶声,世俗的爷娘看见自家的小儿会开口骂人,便欣欣喜色,我的母亲则不然,口出恶声,在所厉禁。在桌子上和大人一块吃饭时,坐位不得侵占人家的地方,检菜不许超过自己面前的菜蔬,若果要吃对面那一边的菜,一定要请大人代

① 2002年6月20日,作者第2次拜访马玉章先生时所言。

② 《一日一谈》,“我的幼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3页。



检。到了外婆家里，母亲必每日照常课我一定的功课，如读生书几页，熟书几卷，临若干字等，等功课完了之后，才准出去玩耍。若果有什么不是，母亲必定要加以督责。<sup>①</sup>

久而久之，马相伯着实有些畏惧母亲，但他颇能借助外婆的溺爱和父亲的慈爱来疏解情绪，而母亲的严厉终究给他意外的教益。他说：

我因母亲督教甚严，却养成一种严肃的克己观念，后来处世接物之不肯薄待人或对人无礼，皆在此时种下了因子。<sup>②</sup>

与和平时期的金色童年不同，马相伯在国难中生长，很早就感受到流离失所的难民滋味。他3岁那年（1842年），英国侵略者攻陷吴淞后，直取镇江。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相伯全家亦避难山中，备尝战火之苦。这对本来就体虚瘦弱的马相伯而言，更是致命的摧残。

有一次，马相伯病得奄奄一息，全家人万分焦急，比他大几岁的姐姐更是全天候悉心护理，才得以逐渐康复。此外，马相伯还有马建勋、马建忠两位兄弟。马建勋出任淮军粮道发迹后对全家多有照顾，马建忠则与马相伯同学于上海依纳爵公学，兄弟间颇能友爱相处，生活上彼此帮助，学业上你追我赶，慧声日起，遐迩闻名，引来众多羡慕的眼光。马

<sup>①②</sup> 《一日一谈》，“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5页，第1135页。



相伯后来能够无私地善待学生,博施济众,既与其信奉的天主教有关,更与其和睦融洽的家庭与充满爱心的家教有关。

## 二、私塾生活与个性成长

1844年,马相伯年仅5岁,父母亲即送其入塾读书。在私塾里,马相伯既阅读“教中经典”,又接受“四书”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sup>①</sup> 他的独特个性开始在学习生活磨练中逐渐显露,并不断地发荣滋长。

也许是因为私塾中经学教育方法过于死板,始终培养不出对经学的兴趣。他晚年回忆道:

我从小时候,有一位经学家时时为我讲解经书,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讲了两个钟头。他把从前各家对于这一个字的解释一句一句地背将出来,甚至连这些经学家的名字都说得一点不错,却是对于我一点也不发生好影响。他两钟头口讲指画地累得要死,我却不耐烦地告诉他:即使先生所背的这些经解都不错,究于我有什么益处呢?<sup>②</sup>

诚然,私塾中枯燥的经学教育并没有给童年的马相伯带来益处,但不可否认,经学教育中的文化精神不可避免地为其

<sup>①</sup> 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年谱》,见《中央日报》,1937年5月16日。

<sup>②</sup> 《一日一谈》,“经学与‘月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4页。



人生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且不说稍后即一度担任依纳爵公学的经学助理教师,他终身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较为理性的批判审视,也绝非与其早年的经学教育毫无关联。

除经学教育外,天主教家庭教育更对其人格成长产生重要影响。他说:

我因为受了家庭的影响,对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已能不受那时中国社会传统的见解和习染所拘束。中国人对于儿童总是灌输其鬼神观念:平时往往以鬼怪之说,恐吓儿童,又因他们无论吉凶祸福都要求神拜庙,不知不觉就把儿童小小的心灵弄成一种愚昧无知,盲从迷信的状态。我幸而没有受过这种摧残。所以,我对于当时士大夫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子,看得也很平常,我因宗教的启论,又知道天子也和我们一样,同为造物所造,同是有生有死,在上帝之前,同是平等,并没有什么神奇。至于黄金、玉带,我更看得平常。<sup>①</sup>

正是凭借“上帝之前,同是平等”的朴素信念,马相伯逐渐树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并开始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产生疑惑。有一次,私塾先生讲解一篇八股文,并说该文为嘉庆皇帝所赞赏,要求学生以此为范本。话音刚落,马相伯便禁不住问道:“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先生大骂道:

<sup>①</sup> 《一日一谈》,“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6页。



“胡说！皇帝无所不知，何况八股文？”<sup>①</sup> 但这样的骂教并不能使初具独立思考的马相伯心服，反而进一步锻造其怀疑精神。

事实上，传统私塾教育的庄严肃穆并不能束缚住一颗活泼可爱、好奇善问的童心。马相伯说：

我在儿童时代最喜欢仰观天象，并且喜欢追求天象的根源。当万里无云的天光之下，我总是喜欢观看月亮。我天天看月亮，竟看到发狂。有一次在月亮地下拼命地追赶它，但是终于徒劳。又有一次我登楼开窗，拿着一枝竹竿去敲月亮，但是终于落了空！<sup>②</sup>

两次独立研究月亮行动失败之后，马相伯心中陆续涌现出许多问题，需要请教长辈：“月亮是活的吗？月儿生在哪儿？到了月初三四或二十四五时，我又要问：为什么只有半个了呢？那半个上什么地方去了呢？”<sup>③</sup> 遗憾的是，长辈们不是粗暴地呵斥，就是随意地瞎说什么“半个月亮被老虎吃掉了”。对此，马相伯总是不能满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天真的幻想。他说：“后来我研究天文学的兴趣，便是从这儿这时代所发生的许多幻想发展出来的。”<sup>④</sup>

也正是有了这段儿时经验，马相伯对压制儿童好奇心

<sup>①</sup> 《一日一谈》，“说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3页。

<sup>②③④</sup> 《一日一谈》，“儿童时代的幻想与儿童教育”，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2页，第1122~1123页，第1123页。



和幻想力的专制主义教育格外痛恨,并对儿童教育提出忠告:

(一) 十分小心地培养儿童的幻想力,利用他们这种幻想力发展他们创造的天才。

(二) 对于儿童的发问绝对不可表示丝毫憎恨的态度,不可有丝毫憎恨的心情,应当小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甚至在成人为极无理由的问题,都要设法指导他们。

(三) 父母和教师对于儿童的说话一点不可造次,要处处诚实不欺,更不可用鬼神的话来恐吓他们。

(四) 不要用食物的赐与或禁止为赏罚儿童的工具,因为这么一来,便种下他们后来争名夺利的祸胎。<sup>①</sup>

这些忠告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值得我们认真记取。

与好奇心、好问心相契合,马相伯的好动心亦十分发达。在私塾里,他在十几个孩子中虽然年纪最小,但总是被推为“学童领袖”。“一来是因为我好出主意,二来是我本着我所受于家庭的严肃教育,律己律人,三来是大家皆服从我的指挥。我那时对同学的第一个戒律就是不许骂人,第二

<sup>①</sup> 《一日一谈》,“儿童时代的幻想与儿童教育”,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3页。



是不许打人。”<sup>①</sup>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好出主意”的马相伯逐渐生长出对学术文化和国家社会的独特见解，一步步地从“学童领袖”走向“学界领袖”。

### 三、上海依纳爵公学的中西学磨练

1851年，马相伯虚龄12岁，实足才11岁。也许出自对私塾生活的厌倦，抑或对未知世界的好奇，马相伯竟然瞒过父母亲，搭乘内河民船，走了10天，来到陌生的上海。经友人介绍，进入刚刚成立1年的徐家汇依纳爵公学读书。

依纳爵公学，又称徐汇公学，系于1850年在上海徐家汇设立的一所天主教学校，也是上海最早的一所西式学校。该校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故校名即是以耶稣会创始人西班牙贵族依纳爵·罗耀拉的名字命名，旨在秉承和弘扬耶稣会的人文主义教育传统，注重语言（含国文、拉丁文、法文等）、文学、哲学、圣学等方面的人文知识教育。据《八十年来之江南传教史》记载：“1849年6月间，大雨绵漫，江南与附近各省咸成泽国，秋收不登，冬乃大饥。主教（赵主教，法人，名 Maresca）于是督率教士，提倡赈济。上海中西绅商，闻风响应，而法领事孟的义（M. de Montigny）尤为踊跃，徐家汇之依纳爵公学，肇基于此时。”<sup>②</sup> 筹建时仅得学生12

<sup>①</sup> 《一日一谈》，“我的孩童时代与宇宙观与家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5页。

<sup>②</sup> 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上海书店1990年据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影印，《民国丛书》第2编97，第42页。



名。“1850年生徒增至31人,且均优秀可教,乃一变临时收容,而为有组织之教导,为国储才,以复兴国族,正式成立学校,取名徐汇公学;奉耶稣会依纳爵为主保,故亦称依纳爵公学。”<sup>①</sup>1851年,马相伯入学时学生增至40名,教员4名。

马相伯对私闯上海之举颇为自豪,但他没想到那时候的上海也那么荒凉,感觉不到它与乡村有多大区别,他所就读的学校规模也没他所想像的那么大。不过,依纳爵公学丰富多彩的中西杂糅之教学管理活动深深地吸引了他。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新知,奠定扎实的中西人文知识基础,而且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相应的社会生活阅历,更锻炼了自己的思维方法,初步学会如何观察和思考复杂的人生社会问题。

来沪之前,马相伯已具备一定的国学根底,而依纳爵公学注重中西方语言学习,更为其事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刚入学时,公学老师问他:“你每天能读几行书?”马相伯回答说:“12行。”老师就照此进度教学,结果发现他很快就能背诵。老师很惊讶,并将进度调整为日诵24行,后又增到六七十行,马相伯依然背得滚瓜烂熟。他不仅勤奋刻苦,而且对语言学习有特殊的感悟力,先后学习法文、拉丁文等外文基础知识,从而大大地拓展知识视域,为进一步学习哲学和神学夯实了基础。

<sup>①</sup> 《徐汇中学校史》,见李楚材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01页。



与此同时,马相伯并没有放弃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习和思考,十分注意中国文化课程的研究。曾长期担任公学校长的意大利籍耶稣会士晁德莅(Angelo Zottloi, 1826—1902)<sup>①</sup>热衷于中国文化精神挖掘,他所编撰的《中国文化教程》广泛涉猎《三字经》、《千字文》乃至“十三经”等儒家文化宝藏,很受学生欢迎。

当然,依纳爵公学对中国文化的重视不能仅仅理解为晁德莅校长个人爱好所致,其深层原因仍然是世俗科举考试的诱惑。这一点,即使是传教士,也不能不顾及当时中国社会仍然是传统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事实。为了能更好地与中国社会生活融为一体,早期依纳爵公学允许学生参加帝国科举考试。马相伯入学第2年,也就是1852年,他曾赴南京参加乡试,出榜时,“因洪杨之役,京中已经闹纷纷”<sup>②</sup>,他也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虽然乡试没有中式,但公学校长并不因此而怀疑他的国学根底,反而于次年(1853年)聘他为国文助教,请他教授国文。马相伯遂得以一面当学生,一面做先生,从而真正体会到“学然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个中滋味。教学相长,彼此推助,他自觉其学业“比从前更有进步,更加切实”<sup>③</sup>。

① 晁德莅,本是意大利那不勒斯耶稣会士,转入法国耶稣会后于1848年来华。1852—1874年,他“有15年是担任圣依纳爵公学的校长”,是该公学“真正创始人”。(参见阮仁泽、高振农主编:《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87页)

② 马相伯:《六十年来之上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38页。

③ 《一日一谈》,“我的幼年”,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4页。



事实上,早期依纳爵公学不仅允许学生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中国老式教学法。1874—1875年,一位《中国通讯》杂志编者记下依纳爵公学一天教学情况:

学生们用震耳的声音朗诵经典作品,每个学生反复大声读唱从未有人给他讲解过的课文。这里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背书时学生的头摇来摇去,甚至全身都左右摇摆起来。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上讲解课时,老师讲解学生们已背诵得滚瓜烂熟而几乎一句也不懂的渊博的古文。最后是作文课,学龄最高的学生在学作奇特的八股文章。有一位进士与两位举人替他们修改作业,学生们很关心老师们的评语。<sup>①</sup>

诚然,神父们深知“这种中国的老式教学法不太理想,太限制约束了学生们的智力”,但遗憾的是,他们想不出进行改进的“适当的方法”<sup>②</sup>,不可能也阻挡不了中国学生对科举考试的痴迷。

不管怎么说,依纳爵公学容纳和引进许多西学新知。据晁德莅校长1857年报告,当时有9名中国教师,“中文一个学科几乎占去了青年学生绝大部分时间;只有进步最快的学生才能加上其他学科,例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等

<sup>①②</sup> [法国]史式微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289—290页,第290页。



等”<sup>①</sup>。1859年,依纳爵公学开设拉丁文课。<sup>②</sup>这一课程结构虽然整体上保持相当程度的中国传统教育课程要素,但又不乏西方新式课程内容——法文、拉丁文、唱歌、音乐、图画、算术等,从而为马相伯打下宽厚的中西学知识基础和较为健全的人格素质基础。

除奠定中西方语言文化的厚实基础外,依纳爵公学带给马相伯的另一个收获就是开阔了眼界,拓展了生活空间和社会阅历。与封闭的私塾生活不同,依纳爵公学提倡开放式办学,教师们常组织学生走出校门去了解社会。有一次,马相伯兴致勃勃地随一“太老师”参观上海租界某洋行,当他们走到公书房门首前,忽见先生大嚷道:“反坯!反坯!国家的名器,好这样糟蹋的么?”马相伯听得一头雾水,定睛一看,“原来门上的旋手,是小小而圆圆的水晶做成,很像五品顶戴官儿帽上的顶球。……怪不得老先生大大地生气,一时联想到五品官儿的大礼帽上边去,竟认为有意侮辱国家体面了”<sup>③</sup>。马相伯深刻地体会到,儒家礼仪名器在当时文化人心目中仍然具有神圣价值。

又有一次,公学老师带领学生们参观停泊在上海的外国兵舰,令马相伯惊讶的是:“兵舰上的机械很简单,什么都没有,关于电的运用,那时完全没有。舰上的炮位既不能升降高低,也不能盘旋左右,更没有准头,和中国的土炮实在

①② [法国]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98页,第99页。

③ 陈乐素:《相老人八十年之经过谈》,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57页。



没有多大分别。”<sup>①</sup> 诚然，当时中国还没有兵舰，但这样的兵舰马相伯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相信通过努力，中国的军事科技一定能够蒸蒸日上。

最令马相伯难忘的，是依纳爵公学的治学方法和思维训练。在公学里，马相伯遇到一位令人尊敬的意大利教师晁德莅，他不仅学问渊博，编著有《真教自证》、《中国文化教程》等书，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现出十分友好的态度。他曾恳切地说：“人皆谓中国人寡情，余则以为中国人之感情，实较西洋人为丰厚也。”<sup>②</sup> 同时，他不客气地批评“中国人少思想，应该多用些心思”<sup>③</sup>。这一提醒对马相伯产生很大震动，迫使他去深入观察和思考复杂的中国社会问题。

有一次，马相伯有幸与一位拉丁文老师讨论人性问题。当先生谈及“人越怯懦其待人也越残酷”时，马相伯大为迷惑，并辩解道：“就常理说，残酷的人一定是暴戾恣睢的人，胆怯的人似乎不敢这样乱干吧？”接着，先生从人的深层心理角度比较了“大英雄”和“胆小鬼”之间的微妙差别，指出胆小的人“之所以胆小，十九因为做了许多‘人非鬼责’、‘天怒人怨’的勾当，他们在心田上时时刻刻有一种恐怖，前后左右仿佛都有人在暗算他，遂不得不严加防备。这么一来，便成了天荆地棘，甚至至亲好友皆变成他的嫌疑犯，所以，他捉到了他认为仇人的，或谋为不轨的，总是加之以严刑峻

<sup>①③</sup> 凌其翰：《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45页，第77页。

<sup>②</sup> 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见《中央日报》，1937年5月16日。



罚,大都要置之死地,并且要很残酷地结束人的性命”<sup>①</sup>。对这一说辞,马相伯听得津津有味,但仍有所疑,并未完全释然。故进一步追问道:“权奸大愆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诛戮异己呢?”先生耐心地分析道:“权奸大愆,我们就拿甘心媚外的人说吧。他们甘心拜倒在敌国异族的脚下,但对于本国人民又要以主人自居。就是说,他们做外国人的奴隶,便要叫本国人民做奴隶的奴隶,用中国古小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叫百姓做个‘与奴才为奴才的奴才’。若果老百姓不愿,那他们自然要以严刑峻罚随其后了!”<sup>②</sup>这一苏格拉底式对话教学颇能激发心智,不仅相当程度地洞察人性本质,而且有助于批判性思维能力养成。

经过依纳爵公学 10 年的正规训练,马相伯在学业上取得令人瞩目的优异成绩。其中,中国古典文献课程(4 年),优秀(with good results);拉丁文课程(2 年),特优(with very good results)。<sup>③</sup>

马相伯多次因学业优秀而获得“文科奖赏”和“圣学奖赏”殊荣。其中,“圣学奖赏”,指学习研究天主教教义而获得的奖赏。当时圣学所用课本即意大利天主教士利玛窦(M. Ricci, 1552—1612 年)所著《天主实义》。该书以“中士”与“西士”的对话问答形式机智地阐明天主教教义,书中攻佛老甚力,而颇注意附会儒家“六经中上帝之说”,广泛涉及

①② 《一日一谈》,“怯懦’与‘残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61 页,第 1162 页。

③ 《罗马档案:马相伯为何出走徐家汇》,见李天纲著:《心同东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第 187 页。



中国人直面异质文化——天主教教义所产生的种种惊诧和困惑,故很能引起学者的探究兴趣。马相伯终生服膺天主教,与其早年学习和钻研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不无关联。

#### 四、徐家汇神学院深造与神学博士学位

1862年5月29日<sup>①</sup>,耶稣会在徐家汇设立的神学院初学院正式开学,马相伯等11名学生有幸成为第1届修士。学院院长由马相伯素所敬佩的晁德莅先生担任。

与公学不同,初学院学制为2年。依据耶稣会会典规定,修士必须在2年期间通过6项考验:

- 一、接着圣依纳爵定的法则举行避神工,时间以1月左右为限。
- 二、往医院中去服侍病人,时间也以1月为限。
- 三、不带路费去朝拜圣堂。
- 四、在卑贱的职务上小心谨慎地操练自己。
- 五、给儿童并愚鲁人讲解要理。

---

<sup>①</sup> 关于初学院开学日,有1862年5月29日及5月19日两种说法。前一说,可参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85~86页;以及李天纲所提供的罗马档案中有关材料,参见其所著《心同东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7页。后一说,可参见[法国]史式徽著,天主教上海教区史料译写组译:《江南传教史》第2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97页。本书采用前说。



### 六、讲道理,实地习练传教工作。<sup>①</sup>

从这些规定,不难体会出耶稣会神学教育的苦行精神,这种苦行精神对合格的修士而言显然是十分必要的。1862年夏,马相伯奉命“前往苏州、太仓等处,救护难民,扶伤疗病”,但不幸染上伤寒重症,“偃伏60余日,几不起”<sup>②</sup>。

初学院两年期满后,马相伯照例发了初次圣愿——“贫穷、贞洁、听命”,并顺利进入徐家汇神学院大修院学习。兹后,他依次修读文学1年(1864年)、哲学2年(1865—1866年)、神学4年(1867—1870年),于1870年获得神学博士学位。

关于文学,马相伯在公学期间即有突出表现,进入大修院后集中精力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拉丁文学做专题研究,逐渐形成独特治学见解。他说:“予治中学,先明训诂,乃能读三代汉魏之文,亦如治泰西学术,先明希腊拉丁文,而后易通英法各国之文;语根本原,一览便知,如识训诂,乃能读古书也。”<sup>③</sup>词源学上的训诂固然重要,但过于繁琐的注疏反而束缚思想的表达与发挥,贻害无穷。他举证说:“我翻了一翻经学的注释,为了《诗经》的‘采采卷耳’4个字足足地写了3本书。他们这些注疏都是在书本上兜圈子,在字眼

<sup>①</sup> 徐保和:《耶稣会士》,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87页。

<sup>②</sup> 钱智修在《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岁年谱》记为1861年,李天纲先生据《江南传教史》改为1862年,参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附录二《信仰与传统》注释[38],第1275页。

<sup>③</sup> 刘成禺:《相伯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88页。



儿上打滚,不看还可以,看了,反把人弄得头昏眼花。”<sup>①</sup>更有甚者,大家都养成一种空虚的形式主义风气,从而衍生出两个毛病:“一个是冬烘头脑,一个是欺饰心理。”<sup>②</sup>

由于对中国古典文学下过一番苦功,马相伯颇能欣赏其中所蕴藏的精神价值和审美旨趣。以《左传》为例,马相伯评点道:“它的好处在什么样的体格都完备,什么样的美都有。有时候大气磅礴,真似长江大河;有时候细针密线,又似天衣无缝;有时挖苦人挖苦得刺人骨髓,有时同人辩驳又语妙天下。”<sup>③</sup>

关于《史记》,马相伯直视之为“《左传》的薪传”,指出它“不独记言记事,并且写有一种极悲愤的情绪,如他的《游侠列传》,竟说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话来,这已非左氏之文所能有”<sup>④</sup>。

至于李白、杜甫的诗,马相伯更叹其百读不厌。他赞扬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天马行空式诗才,但并不主张后生去效法,而更欣赏杜甫的人格魅力及其文学意境。他说:“杜工部的天才不亚于李白,而他的性格却与李白不同,他处处要积极救世救国,悲天悯人,而他的诗又字字句句用力,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诗也是无美不备。细腻处真是‘美人细意慰贴平,裁缝减尽针线迹’。意境高妙处,却又是‘想入非非’。”<sup>⑤</sup>

①② 《一日一谈》,“经学与‘月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4页,第1124页。

③④⑤ 《一日一谈》,“文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8页,第1088页,第1088-1089页。



另一方面,马相伯也不隐讳中国文学的弱点和短处。他批评说,中国小说家“一开始总是千篇一律地要从书中所叙的主要角色的‘三皇五帝’说起,弄得人莫明其妙。还有一种大毛病,就是小说家们到了书中的关节无法转变时,就如同打了结解不开时,便用神仙来救一下急,虽好的小说如《红楼》、《水浒》、《儒林外史》、《西厢记》等等,都不能免。”<sup>①</sup>同理,文字上的形式主义也十分盛行,“譬如苏东坡的《上皇帝疏》,王安石的《上皇帝疏》,都可算得有数的杰构,但它们都是有头无尾,述而不作,论而不断,弄得一篇煌煌大文,到末了只以寥寥数行颂圣的文字了事!”<sup>②</sup>何以中国文字甚至巨著名篇也会有这样的过错?在马相伯看来,“这不只是中国文人的过处,而是当时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之腐败的环境限制了它”<sup>③</sup>。

修完文学后,马相伯开始专攻哲学,并兼修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其实,马相伯对自然科学、哲学的兴趣由来已久。他自述道:

我在同学中间,天资还不算坏,晁教习很喜欢我,他教我各种自然科学。我非常有兴趣,而我对于数学更特别欢喜。到了我的自然科学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又教我致知学即世俗所谓哲学。……到了二十三岁时,我开始学习天文学,并且一方面研究西洋的数学,一面研究中国的数学,如开

①②③ 《一曰一谈》,“杂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7页,第1137页,第1137-1138页。



方、勾股，等等。<sup>①</sup>

以数学为例，马相伯一度发狂着迷，以至于晚上睡觉，常梦见帐顶上闪烁着数字。特别是，当他发现“中国的‘勾股’，就是西洋数学当中的微积分；而中国之所谓‘方程’，就是西方数学当中的比率”时，其心中的快乐真是难以言表。他深有感触地说：“把中西的数理融会贯通起来，也是我们研究西洋科学的一种乐趣！”<sup>②</sup>

应该肯定，马相伯是一个善于思考，并能够对东西方思想进行创造性学术融通的上进学者。他认为，西人所谓“Philosophy”，与其译为“哲学”，不如译为“致知”，“致知的工夫即是格物”。但遗憾的是，中国 2000 年以来并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格物，朱熹训“格，至也；物，犹事也”，并没有道着痛处；而王阳明“遇物便格，弄得头痛，更是不曾摸着‘格物’一词的边际”<sup>③</sup>。在马相伯看来，

所谓格物，第一步工夫就是把各种事物下一个 Definition。这个字，徐光启这个先生译做“界说”，真是恰当之至。所谓界说，就是“分析”，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种类别，使它有一定的界限。亚里士多德之所以为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其功也就在于“分类”，在于创定“界说”，给后人指出致知格物的门径。<sup>④</sup>

① 《一日一谈》，“我的童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84 页。

②③④ 《一日一谈》，“中西学术的谈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83 页，第 1082 页，第 1082 页。



反观中国,马相伯认为,中国人最缺少的就是不懂得什么叫“界说”,“孔子所言,皆是适应人生实际问题,他未尝对于一物一物下一确切的界说”<sup>①</sup>。与孔子相比,孟子开始注意思想逻辑性,而荀子《正名篇》更堪称逻辑的大本营,但归根结底,他们终究“没有力量给我们写出一部像亚理士多德的 *Orgawon* 那样有系统的方法论”<sup>②</sup>。

大修院最后4年,马相伯终日以研习神学为职志。他说:“神学为我们宗教徒必修的科学,而且为最高的学问。……神学的对象为第一原理,为造物主,其最终解答为不可知,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sup>③</sup>

通过对神学这一“众妙之门”的反复沉潜体悟,马相伯的学问和精神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1870年5月8日,马相伯终于以“特优”成绩通过十分严格的耶稣会士考试,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从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那个时代所公认的文化精英。

## 五、教士生活的尝试与受挫

31岁的马相伯获得神学博士学位的同时,即被祝圣为

① 《一日一谈》,“‘Being’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40页。

② 《一日一谈》,“孔子所给与社会的影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0页。

③ 《一日一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5页。



司铎,有权履行其教士职责。对此,马相伯深感荣耀,认为“西人学社名位可受,西国官爵富贵不可受”;司铎一职关系“宗教神学”,不仅可受,而且决心以此来报效国人。他说:

学问社会,世界人类所共有,不必分中西以立异也。出处行藏,私人对于国家民族所独有,不能稍事通融也。予立于泰西信仰社会,及各类学术社会,尽彼所长,转授国人。<sup>①</sup>

幸运的是,马相伯博士毕业后即荣任母校依纳爵公学校长(另一说为“学生督导”),并兼任教务。<sup>②</sup>1年后,他被派往南京的圣玛利住院,跟随兰廷玉(Francois Ravary)神父研究科学。不久,他返沪继续担任依纳爵公学校长(另一说同上)。在担任依纳爵公学校长期间,马相伯继承乃师晁德莅的精神学脉,“对于学生的中国经史子集之文的讲习,颇知注意”;不反对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甚至“亲自送考”。<sup>③</sup>有趣的是,这些学生多能获取。这本是好事,也是依纳爵公学的传统之一,却引起耶稣会特别是新来主教、会上们的警

<sup>①</sup> 刘成禹:《相伯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109页。

<sup>②</sup> 马相伯自称毕业后在母校依纳爵公学“任校长并兼任教务”。(《一口一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5页)但据罗马耶稣会档案有关马相伯的记载,则称他从1870—1871年以及1872—1874年曾在该公学当了几年“学生督导”(prefect of students)。(参见李天纲著:《心同东西》,华东师大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或许马相伯所说“校长”,特指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长。

<sup>③</sup> 《一口一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5页。



觉和不满。

众所周知,教士负有神圣的传教使命,这一点马相伯并不否认。但在如何传教问题上,马相伯与新来的会士们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西方传教士借助历次侵略战争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不断强化其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他们越来越远离其先辈的儒化传教策略。另一方面,屡战屡败的反侵略战争愈益激发起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感,如何以教士身份做一些有益于民族国家的事,始终萦绕马相伯的心灵,他任职校长期间特别注目中国文化,是有其良苦用心的。遗憾的是,教会对马相伯的行为并不欣赏,甚至担心他“把学生都变为异教徒(孔教)”,遂于1875年命他“专任研究天文的职务”<sup>①</sup>。

应该肯定,研究天文学本是马相伯的固有兴趣之一,但当时的徐家汇只有利玛窦从前用过的一架旧仪器,马相伯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遂转而专攻数学。即便如此,教会还是不放心,决定把他调到南京,专译数理诸书。对此,马相伯颇为不满,心想自己在徐家汇时已译著数理书百余卷,“多译多著何益?”<sup>②</sup>此外,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曾被命令由朝南房间搬往朝北房间,以便腾出来给来华的外国修士居住。同样是修士,何以中国人只能住朝北房间,后来的外国人反而可以住朝南房间?面对这一有伤中国民族自尊心的不公正待遇,血气方刚的马建忠当即愤然离校。马相伯虽

<sup>①②</sup> 《一且一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5页、第1085页。



然没有马上离校,但也是强忍怒火,逐渐认清了耶稣会的殖民主义意识和立场,深切体会到近代以来种种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精神损伤,甚至对自己已经誓愿的传教事业产生动摇。

更重要的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同治中兴”和日益兴旺的洋务自强运动在深深地吸引着他。与50年代咸丰年间的衰败相比,19世纪60年代同治时期的整个帝国仿佛出现某种复兴迹象,“满汉上层真正团结一致地集合在不久前已威信扫地的朝廷周围,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担任了政府的主要职务”<sup>①</sup>。其中,被誉为中兴杰出人物的李鸿章,更在“中兴结束后获得最高的声望和权力。……在中兴时期,他是位活跃而年轻的军事天才,曾氏(指曾国藩)对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他采纳了曾氏的思维方式,但是从最初起,他就擅长于处理对外事务及统率军队”<sup>②</sup>。李鸿章手下的“淮军粮道”马建勋此时正亨通于世,他不仅得到李鸿章重用,也善于经商理财,先后在江苏金坛、四泾置下地产1.3万亩。相形之下,马相伯未免显得寒碜。作为教士,马相伯并不羡慕这些财富,他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施展自己的学术才华。遗憾的是,当时教会非但不能善待他,使之有效地施展才华,且不断强化其文化殖民主义立场。是可忍,孰不可忍?马相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出会入世,参与现实政

<sup>①</sup> [美国]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sup>②</sup> [美国]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第96页。



治,相信“在那里会有远大前程,比耶稣会的事业更对中国直接有益”<sup>①</sup>。

正是有了如上深层原因,马相伯与耶稣会的冲突不断升级。从弟弟马建忠先行离会所造成的伤感,到指责教会负责人无故拆检其私人信件,乃至直接抱怨教会中的一个外国厨子所做的饭无法下咽,马相伯陷入极大的心理沮丧,并最终做出离会参政的人生抉择。

<sup>①</sup> 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46页。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第

二

章

## 人生转折：从宗教追求到政治参与

“离会参政”是马相伯个人生活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折射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不断高涨的历史事实。马相伯先是进入山东布政使余紫恒的幕府掌理文案，很快即担任山东潍县机械局总办之职。之后，他紧随李鸿章从事各种洋务活动：从出任日本的中国使馆参赞到赴朝鲜充当国王顾问，从受命调查轮船招商局账目到赴美国进行商战筹资，马相伯无不竭尽全力，其部分言行甚至溢出洋务派范域，体现某些维新思想的先兆。但遗憾的是，他所提出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许多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共鸣，更难得到采纳。当满腔的



参政改革热情遭际一次次冷遇时，马相伯开始更多地思考政治背后的人才培养问题，并最终选择“教育救国”道路。

## 一、赴山东参与洋务新政

1876年，马相伯通过乃兄马建勋推荐正式进入山东布政使余紫恒在济南的幕府，受命掌理文案。由于工作谨慎认真，且知识渊博，人品高尚，马相伯深得这位藩台大人的赏识和信赖，以至于亲自做媒为相伯娶了一位王姓媳妇。后来，余紫恒兼任山东巡抚时，干脆把藩司的牙章交给相伯，除极必要的公文要求请示外，一律由相伯代为画行。果然不负所托，马相伯不仅把日常文案处理得井然有序，还博得余府其他幕僚及山东官员的好感。在这些新朋友面前，马相伯俨然就是说书人，“东西南北，四海九州，上天下地，无所不谈”。遇到有国际问题发生，他们更要把马相伯围起来，追根问底。不过，马相伯深知这些“未出国门一步”的满汉官僚，“因谬于中国独尊之见，总是夜郎自大，与之谈瀛寰事，犹之乎同他们谈《西游记》‘华胥国’差不多，未尝置信也”<sup>①</sup>。

1877年，马相伯被余紫恒委任为山东潍县机械局总办。作为洋务新政之一，山东潍县机械局以制造军火为旨趣，机械局总办是“红候补道的美差”，可捞取大量钱财，令

<sup>①</sup> 《一H一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6页。



许多洋务幕僚垂涎欲滴。但出身“神学博士”的马相伯志向远大,一心要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自称“满心想做事业,并且极力要好”<sup>①</sup>。

上任伊始,马相伯着手对机械局进行全面调研,发现该机构组织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全局“有一二十位候补官员,工人有二三百人,还有 200 多名卫兵”,日常开支浩繁;说它的成绩却令人啼笑皆非,“10 天只出一支枪。它造子弹火药,也都用的是土法,每月出品自然有限”<sup>②</sup>。面对这样的烂摊子,血气方刚的马相伯很快提出改革对策,这就是摒弃土法,改用西法,以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过,这样一来,生产成本自然相应提高:火药每斤成本由 7 厘上升至 3 钱 5 分。马相伯如实向户部呈报改革方案,户部一看,成本贵了,也不管什么产品优劣,便予以驳回。马相伯疑惑不解,特写信询问其兄好友——户部郎中杨谷山,杨回信说:“这事容易,你把‘斤’字改做‘磅’字,重新呈报上来,我包你批准。”因为“磅”字正是满清官吏不甚了然的洋务,再次上报果真批了下来。对此,马相伯后来感慨地写道:“你看!前头 3 钱 5 分一斤(16 两)说是太贵了,不准;后来 3 钱 5 分一磅(12 两)倒准了。前清政府的官吏,尤其是旗人中的官吏之昏愤糊涂到如此地步,焉得而不亡!”<sup>③</sup>

马相伯在山东前后共计 3 年之久,“一心想做事业”的

<sup>①</sup> 《一日一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86 页。

<sup>②③</sup> 《一日一谈》,“杨谷山孝廉眼官秘诀”,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87 页,第 1087 页。



远大志向遭到种种现实困扰。他非但不能实现改革理想，反而在权力倾轧中丢掉了职位。其后，李鸿章派他调查山东矿务达半年之久，同样是壮志空怀，做不出什么成绩。这一切都使马相伯变得更加冷静，开始对清政府腐朽社会政治制度有了亲身的体悟和认识。

## 二、担任朝鲜国王顾问期间的改革建言

1881年，正当马相伯郁郁寡欢之时，传来二哥马建勋的好友黎庶昌出任驻日大使，并遴选他担任驻东京中国使馆参赞的消息，马相伯非常高兴，窃喜自己的满腹经纶或有施展之机，遂愉快赴任；后又改任神户中国领事。在日期间，马相伯十分注意考察社会政治变革和日本民间生活习俗，但遗憾的是，半年后即因二哥马建勋生病而回国探望。

回国期间，马相伯经友人怂恿在南京拜会仰慕已久的洋务巨头李鸿章。也许是由于投缘，抑或是欣赏马建忠而产生的爱屋及乌心理，李鸿章面见马相伯后即请他随船一同前往天津办事。令马相伯感动的是，李鸿章非但没有盛气凌人的大官架子，反而对下士冷暖体贴有加。此时已届深秋，当船头寒风袭来，李鸿章猛然间发现相伯独着薄衫，赶紧叫人开箱找衣服：“给马先生穿上！”<sup>①</sup>到天津后，适逢朝鲜政府请求中国派外交官襄助新政，本应由马建忠赴任，但由于李鸿章急需马建忠处理其他外交事务，遂派马相伯

<sup>①</sup> 《一日一谈》，“我与高丽”，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0页。



代劳,于1882年11月赴朝。从此,马相伯充当帝国藩属朝鲜国王的顾问。

与晚清帝国一样,藩属国朝鲜的封建等级制度亦十分腐朽:“全社会分三等:贵族,士大夫,民。平民不得与贵族士大夫齿,虽位至将相,见了贵族或士大夫还必定要磕头行礼。”<sup>①</sup> 逐渐强盛的东邻日本早就垂涎欲滴,欲乘其国虚而吞并之。在这种情况下,马相伯朝鲜之行势必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朝鲜作为中国的屏障,具有“拱卫上京”的战略地位。因此,凭着壮年人的勇气和锐气,马相伯决定在这一“放大的中国”小试牛刀,有所作为。

赴朝后不久,马相伯即被朝鲜高宗政府委任为正二品政府赞议,并兼任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协办。马相伯即“首请彼政府编练新军,改用西洋操法,请先以千人试办,不到1月,居然步法整齐,军容甚盛。次则整理他的外交,从来西方人士对待中韩政府外交官吏,傲然自大,一点礼貌也没有。余则先就学问知识方面折其气,并暗示彼等:君等勿傲然视中国人士;君等所能,吾亦能之;君等所知,吾亦知之。然后居之以礼貌,绳之以法律。不久,他们便彬彬有礼。”<sup>②</sup> 同时,马相伯经过对朝鲜社会民情的考察与调研,结合自己对世界新知的审视,撰成《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一系列改革建言。

<sup>①②</sup> 《一日一谈》,“我与高丽”,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0页,第1090页。



其一，省刑罚。要求“废肉刑为笞杖”，反对“残毁肢体”等专制主义严刑峻法；而笞杖亦需手下留情，“打膝下易伤筋骨，似可改为笞臀”。<sup>①</sup>

其二，定刑典。主张借鉴近代西方法律精神，对有违“通商时局”的朝鲜传统律法《大典会通》进行修订。指出：“凡为恶者，必有害于人，故令服老，而使有补。譬如犯斫封山之树者，罚令斫一植十，力不能植者，计其劳役，以相抵偿，如此则事不废，而刑自恤矣。其他刑典，可以类推。”<sup>②</sup>在马相伯看来，劳动改造贵在改过反省，以唤醒其“恻隐之心”，重新做人；“教之囹圄榜掠，疾痛哀呼，既无益于该犯，又无益于他人，徒令习闻其声，以尽丧其恻隐之心者，为何如耶？”<sup>③</sup>

其三，广取才。旨在打破一切等级身份束缚，做到“革浮躁，崇实学”；考试面前，“惟才是视”。强调“除本身系奴隶、舆台、娼夫、私子及受刑者，其余一切罪人子孙，宜加恩赦，准其自新，一体赴试”。<sup>④</sup>

其四，恤奴婢。反对“一国之中自相俘虏”的奴婢制，建议“凡卖身者，准以 10 年后官价收赎。凡世及者，无论公、私、贱，所产子孙，准自覃恩赦放之日始，皆得为良”。<sup>⑤</sup>

其五，求富庶。强调“有国者皆以生聚为本”，并依据朝鲜“生民不蕃”的现状，主张革除童婚，“男 18，女 16，不足限者，不准成婚”；允许“寡妇再醮”；至于不能赡养家室者，“听

①②③④⑤ 《上朝鲜国王条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3 页，第 3 页，第 3 页，第 3 页，第 3 页。



妻妾分居,该夫不得侵扰,则一国之入,庶几勤乎事而谋生矣”<sup>①</sup>。

其六,慎疾病。要求禁止“尸骸藁悬于树”而导致疫气伤人的陈规陋俗,主张疏通里巷沟渠,整顿城市布局,以期改善社会生活环境,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其七,兴工艺。主张致富之路不能单纯地“仰给于外国”,应该积极进取,“开厂制造,如金工、木工、织工,暨一切窑工之类,其精奥者则选生往他国学习。学有成,归授乡里,则游食之民,可以乐业矣”。<sup>②</sup>

其八,兴学校。强调各府县应大力“募建公学,令民间子弟,习谚汉文,一会计,一地理,一杂史,限以3年卒業”<sup>③</sup>。

其九,正经界。针对“经界不正,赋税不均”现状,要求政府派遣专家丈量田亩,声称“田亩定,赋税均,则饷有源,兵可足矣”<sup>④</sup>。

据上所述,马相伯提出的改革“条陈”涉及社会法律(其一、其二、其四)、经济建设(其五、其六、其七、其九)、人才培养(其三、其八)诸方面,内藏十分深刻的反专制主义色彩,体现了近代西方自由平等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就人才教育而言,马相伯明确提出要改革传统考试制度,声称“惟才是视”,强调即使犯人子孙也应允许其平等赴试;与之相应,他推崇实学,积极呼吁地方政府大力发展新式学校,并建议

①②③④ 《上朝鲜国王条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页,第5页,第5页,第5页。



派遣留学生“往他国学习”，以求新知于世界。刚刚从日本归来的马相伯对这些改革措施十分自信，声称“大抵日本国已行之矣，无须大举动，大更张，所以只见其利，未见其害，多有一纸文诰，可猝办者”<sup>①</sup>。但出乎意外的是，马相伯的建言献策犹如泥牛入海，一去不复还。

马相伯渐渐意识到“谋人家国事，自知其多嫌”<sup>②</sup>，但他并不就此罢休，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襄助朝鲜新政，使之变革维新。有一次，马相伯与亲华派首领闵妃作有关太子教育的长谈。闵妃问：怎样才能把太子教养成人，使之担任国家重任而不致为强邻所吞噬？马相伯回答道：

第一个条件就是到外国去留学，一来是因为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果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无疑。二来是19世纪下半期的东洋诸国已不复能闭关自守，若要对付四邻，必须有国际的眼光，丰富的知识，敏干的才能，这三者都非到欧美去锻炼一番不可。<sup>③</sup>

闵妃听罢，表面上非常赞成，但总是不见行动，太子照常和一班宦官宫妾“做许多极没道理的游戏，如斗鸡走马，养雀子，玩鸽儿等等”<sup>④</sup>。

几经观察审视，马相伯深知当时朝鲜宫廷暮气已深，因

<sup>①</sup> 《上朝鲜国王条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页。

<sup>②</sup> 《致朝鲜京畿道金宏集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页。

<sup>③④</sup> 《一日一谈》，“闵妃之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17页，第1117页。



循成性,无论你提什么建议,都答应得很好,但是一事不做,以“再商量”搪塞敷衍,逃避改革。数年后,日本侵略者一来,太子便束手就擒,闵妃被活活烧死,整个国家“如摧枯拉朽,风卷残雪,不旋踵而亡”。<sup>①</sup>

### 三、轮船招商局的调查与反思

1884年4月,马相伯回国后即向李鸿章汇报朝鲜的内外局势及其困境,希望及早予以有力的整顿和指导,抑或让其脱离宗主国成为独立国家。对此,李鸿章苦笑着回答:“话固然是不错,但要你自己去对总理衙门说去,我包你碰个大钉子。”<sup>②</sup>之后,李鸿章喃喃自语道:“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20年的寿命,何况高丽?”<sup>③</sup>从素所敬仰的中兴大臣李鸿章的无奈言谈和自己的多年官场经验,马相伯深深地体悟到“清政府的寿命已不得长久,旗人的脑满肠肥已万不足与有为”,于是他“决计摆脱宦场”<sup>④</sup>,重新过起书生生活。不过,“时势紧迫,终不能关起门来享清福”<sup>⑤</sup>。1884年,当李鸿章再次以诚相邀,马相伯则又一次为其洋务事业挺身而出,受命调查轮船招商局的来往账目。

轮船招商局创办于1873年,是“洋务运动从举办求强

① 《一日一谈》,“闵妃之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17页。

②④⑤ 《一日一谈》,“从高丽回国以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6页,第1096页,第1096页。

③ 《一日一谈》,“我与高丽”,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1页。



的军用工业到举办求富的民用工业企业过渡性的一着”<sup>①</sup>。它的本意在于与洋商争利,从实行的结果看,“资本从 1873 年 20—30 万两,增至 1875 年后几年的 100—200 万两,赢利达 30 余万两至 40—50 万两之多,不为不厚。……初步达到‘分商之利’的目的。”<sup>②</sup>但另一方面,作为第一个洋务民用企业的轮船招商局,它又时时面临强大的洋轮竞争对手,如何树立自己的特色经营理念和品牌意识,始终在探索之中;特别是,当周期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之际,这一官督商办的洋务民用企业便不得不面对生存危机。马相伯受命之际,正是轮船招商局发展低迷之时。为了弄清楚轮船招商局实际运行状况,马相伯不断穿梭于汉口、上海、烟台、厦门、广州等地,十分详细地明查暗访,最终形成《改革轮船招商局建议》。

从遗留下来的《改革轮船招商局建议》(残稿)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出该报告的敏锐性和深刻性。它不只揭露轮船招商局的具体账目流弊:

公私混乱,挪欠自如。唐总办欠六七万,徐欠两万余,各司董所欠不等。殊与初定章程,凡有挪欠者立即撤退之意相左,此特其净欠者耳。更有以烂贱股票,押取局银至 30 余万之多者。徐道名下,押有 15 万,其实并无抵物可以赎回,以致局无现银。……最可异者,各局契纸,不存总局,抽换、

①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92 页。

② 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第 192 页。



抵押、遗失之弊，所在俱有。<sup>①</sup>

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够直面轮船招商局实际管理缺陷，指出：“分局之弊，失之太纵”；“总局之弊，失之太浮，举措无当，全凭私臆”<sup>②</sup>。整个招商局呈现“经理不善”的颓废景象，而“用人之弊”更是其中的突出问题。马相伯写道：

各局船栈，人浮于世，视太(古)、怡(和)行不啻三倍，而得用者无多。甚至首领要缺，委之庖代。如北栈管总，广州局总，各船之“总”，皆不在其事，但挂名分肥而已。又局中司董，均无保单，故挂欠水脚，挪用银两，无从追缴。推其不用保单之故，因系总办亲友可靠，而不知舞弊则亲友更甚。“总”之缺，向归总办分派，非唐即徐，间用他姓，则须打通关节，与局中有力者分做，即暗地分财之谓也。此种人品，一得“总”，便引用亲朋，至二三十之多，以致船上好舱，半为占去，而趾高气扬，睥睨他乡过客，尤为可恶。闻南洋分局，香港、广州等又尾大不掉，难以节制。洋人言该处司董，以局船为己有，专装私货，无怪公局之亏折也。<sup>③</sup>

在这里，很容易感受到“任人惟亲”对轮船招商局这一新兴民用企业的严重桎梏。换言之，只有彻底地“改弦更张”，建立一套与新兴民用企业相匹配的现代管理理念，轮船招商

<sup>①②③</sup> 《改革轮船招商局建议》(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页，第10~11页，第10页。



局才有振刷复兴之望。

马相伯以务实态度参与调查轮船招商局，为时任招商局会办的马建忠提供重要帮助。这一点，马建忠在致盛宣怀的一封信中有所透露：“家兄相伯来，极道执事为弟剖白一切，弟铭感无地。”<sup>①</sup>事实上，马相伯在调查基础上精心构思的《改革轮船招商局建议》，确实触及洋务企业的核心问题——人才选用及素质。轮船招商局经理不善，因为用人“失之太滥”，以至于一般办事人员普遍缺乏现代企业的基本素质，而上层管理者也只是“挂名分肥而已”。

循此致思，马相伯在轮船招商局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发现洋务大员们自身的官僚习气。当调查途经香港时，马相伯立刻为香港的经济勃兴所吸引。为了与英国殖民者争利，发展民族经济，他觉察到香港对面的九龙半岛之地理优势，意欲建立一个与香港对峙的经贸特区，将其“辟为商埠，建筑市场，招引中外商人，到彼贸易，修一铁路直达广州”<sup>②</sup>。马相伯对这一建议自视甚高，以为极有功于洋务事业，特托人送给两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看后，口称“蛮好蛮好”，便把它“束之高阁”，再无下文。害得马相伯苦等3个月，最终带着对洋务官僚的不满和对洋务事业的遗憾，“汕汕地离开广东了”。<sup>③</sup>

离开广东后，马相伯决定乘怡和海轮北归交差。没想

<sup>①</sup> 《马建忠致盛宣怀函》，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轮船招商局——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sup>②③</sup> 《一日一谈》，“刘省三（铭传）与张香涛（之洞）”，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8页，第1098页。



到这只铁壳船竟中途触礁,马相伯险些丢了性命,并一度滞留厦门。之后,马相伯被首任台湾巡抚刘省三(铭传)电邀至台,因刘省三与马相伯的二哥马建勋同是淮军出身,马相伯又是学贯中西,学术人品早已声名远播,刘省三极力保举他,要他留台“帮忙”。但马相伯志存高远,看不惯刘省三“喜怒无常,又好自作聪敏”的做派,无意久留,他念念不忘的还是那“开辟九龙商埠”的宏伟构想。

回到天津后,马相伯即向李鸿章述职,并坦露开发九龙之心迹。李鸿章听罢,拍案叫好,表示“设法请总理衙门批准”,转念又顾虑重重地说:“必须张香涛(之洞)具奏,我不好出面。”<sup>①</sup>时势造就了马相伯,而马相伯的洋务建言却超越了时代,这就必然是胎死腹中。

## 四、滑稽的美国之行

从台湾回来,马相伯情绪低沉,但仍继续担任李鸿章的幕僚。一次偶然的的机会,马氏兄弟与李鸿章闲谈起洋务事业,不料竟惹起李鸿章的无限惆怅,并大发牢骚。李鸿章说:“军机处命我兴办海军,只给500万银子,怎样能办得好!”对此,马氏兄弟亦感慨系之。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借外资以兴洋务的主意,并建议李鸿章向美国富商借款,以解决长期困扰洋务事业发展的资金问题。令人高兴的是,李

<sup>①</sup> 《一日一谈》,“刘省三(铭传)与张香涛(之洞)”,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9页。



鸿章竟一口答应，并商定：“借款 2500 万两，先开设银行，银行作为经济支出的总枢，各项新政经费皆由此行出纳，总行设在天津、上海，各省得设分行。”<sup>①</sup>

1887 年 8 月，李鸿章派周馥、盛宣怀、马建忠同美国商人米建威(Minti Wig)等人，就开设合办银行一事会谈，双方商议将拟议中的银行定名为“华美银行”，并充分商议《华美银行简明章程》。<sup>②</sup>李鸿章本想让马建忠与米建威一起赴美筹资，但由于马建忠另有公务，一时脱不了身，便再次请马相伯代劳运行。

临行前，马氏兄弟建议李鸿章向朝廷奏明此事，李鸿章反而忸怩道：“难道我一个北洋大臣又兼总理通商大臣，连与外国人商订借款的权柄都没有了吗？你去好了，我打电报给美国大总统。”那时的李鸿章真是名不虚传，欧美人士均尊称其为“北洋李鸿章”，他的电报果然极有效力，马相伯得以享受贵宾级待遇，受到美国总统特派侍从武官及银行巨子们的盛情款待。他们还精心编排《马相伯的故事》，演剧以示欢迎。马相伯非常高兴，乘机与美国银行家拉近距离，适时商谈借款以开设“华美银行”事宜。一时间，竟然谈妥 5 亿两的借款数。马相伯深知借款数目过大，李鸿章不敢答应，但又不便直接回绝美国银行家的雅意，故同他们商量“以 5000 万为正式借款，以 3 万万为他们的存款，存款以

<sup>①</sup> 《一日一谈》，“借款”，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01 页。

<sup>②</sup> 参见薛玉琴，刘正伟著：《马相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156—157 页。



3厘起息,然后视中国对于财政需要之缓急以为因应”<sup>①</sup>。马相伯高兴地把这一意向电告李鸿章,很快得到李鸿章急电:“朝议大哗,舆论沸腾,万难照准。”<sup>②</sup>

原来,马相伯的借款电报传到朝廷之后,瞬间便招来一片责骂声,称“丧心病狂,要卖国了”<sup>③</sup>。甚至惊动了西太后,传说她也要追究李鸿章不事先请旨奏明的责任。李鸿章一时慌了阵脚,故急电马相伯停止一切借款事宜。马相伯哭笑不得,“弄得进退维谷,简直不能见人”,最后只能“溜之大吉”,结束这一滑稽的美国之行。<sup>④</sup>

## 五、欧洲考察与沉思

马相伯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渡海转道欧洲,做一次没有任何政治及外交使命的个性化漫游。在这片神奇的大地上,马相伯尽情地考察欧洲的著名大学、社会风尚以及政治精神传统,自由地进行东西方文化思考,从而为以后选择“教育救国”,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英国,马相伯从利物浦上岸后便直赴伦敦,参观著名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对它们注重大师级人才培养和古典文化教育留下深刻印象。马相伯说,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里,“有许多名人肄业该校时的座位依旧保留,作为胜

①②④ 《一曰一谈》,“借款”,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2页,第1102页,第1102页。

③ 徐景贤编:《马相伯国难言论集》,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170页。



迹。当时欧陆大学，尚很重视古文，拉丁文、希腊文都是必修科”<sup>①</sup>。

与之相应，中小学偏重古典人文知识传授，后来逐渐趋重科学教育。对此，马相伯有亲身体会。他回忆说：

60年前，在外国读书，从小学到中学，都要读拉丁、希腊等古文字，尤其是在中学，须以拉丁、希腊(文)为必修科。……1880年(实为1887年——引者注)，吾到英国，那时英国的学风，仍袭欧洲大陆的传统，英国人也要读拉丁、希腊文。其后，美国逐渐注重科学教育，学生加紧吸收科学知识，对于文艺的研究也逐渐偏废，拉丁和希腊等书也就不读了。直到现在，欧洲大陆的中小学还是教拉丁、希腊(文)，不过没有像以前那样注重。重实事而轻文艺，这一个学风的变换，完全受近代科学文明的影响。<sup>②</sup>

而同时代的中国，马相伯认为，仍处在“八股时代”，“读书人除了文艺以外，没有其他知识”<sup>③</sup>。

在法国，马相伯来到巴黎，兴致勃勃地参观一些著名商店、公司和工厂。其中，有一家“南京”公司，专营中国的紫花布，生意兴隆，风靡一时，连罗马教皇都以此面料做法衣。

<sup>①</sup> 徐景贤编：《马相伯国难言论集》，“乐善堂纪闻·五六十年前的世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25页。

<sup>②③</sup> 凌其翰编：《九三老人马相伯语录》，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173页，第173页。



马相伯猜想，“或许是利玛窦从中国南京带了这种布到罗马送给天主教会的。故遂以其出产地名之曰‘南京’，而经营此种商业的公司遂名曰‘南京’公司”<sup>①</sup>。马相伯还参观一家瓷器公司，该公司把瓷器直呼为“高岑”，高岑即中国江西盛产瓷器的一座山名，足见法国人对中国瓷器的厚爱。由此，马相伯想到中国民族工业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前景：

假使从那时我们就晓得讲求改良工业与对外贸易的方法，设法登广告，大事宣传。譬如，把我们的缎子和布匹，送一些给欧美国的最有名的女伶或今日的电影明星，她们做成了衣服，在演剧时穿在身上，藉广招徕，你想到有多少人要买中国的绸缎与布匹？……必可以向外取得一部分很有利的市场。可惜那时候政府与商民都见不及此！<sup>②</sup>

中国政府与商民何以缺少必要的对外开拓精神？近代中国何以远远落后于世界？马相伯苦苦地思索着，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追溯至中外最高统治者的学问素养和知识来源问题。马相伯说：

法王拿破仑第三后来兵败于德，身为俘虏，世人往往便因此把他的其它一些长处都忽略了。他曾经在军事上发明许多有用的兵器，如探海灯，火药，大炮上测算远近的表尺，都为现今兵器学上最

<sup>①②</sup> 《一日一谈》，“巴黎的金刚钻与‘南京’”，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3页，第1103页。



大的贡献，而他的关于军事学的等身著述更是自今以前各国军事学家所珍视的宝典。其他如美国前任总统威尔逊，英国前工党内阁总理麦克唐纳，以及苏联的开创者列宁，都是著作等身。他们在政治上，立场或许有大的不同，然而对于学问都有很大的研究与贡献，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sup>①</sup>

相比之下，中国历代帝王的知识学问真是可怜得很，“因为汉高祖本是一个大流氓，自然谈不上什么大学问；项羽是一个莽荡丈夫，说白些，就是一个粗卤汉子，更谈不上学术”<sup>②</sup>。其后，有个别像魏武帝（曹操）、武则天这样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者，多数帝王都是不学无术，没有真本领。马相伯甚至挖苦说，某些满清王公贵族的知识只是从戏台里得来的，因为他们只须“安坐而食，一点事不做，一点心不用的”<sup>③</sup>。

封建社会一代又一代生产着大批食利阶层，致使整个社会日益缺少生机和活力，并逐渐走向瓦解与崩溃，这在很大程度上和传统的儒家教育观念分不开。马相伯说：

儒家主张“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或许儒家这种说法，只是从当时的政治实际情形抽绎出来的伦理观念。但是这种不平等的结果，“治于人者”劳

<sup>①②③</sup> 《一日一谈》，“中西各国元首学问上的比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47页，第1148页，第1148页。



力,终身无休息;而“治人者”却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所以“脑满肠肥”,蠢如鹿豕!真正可怜可叹!①

欧洲之行是马相伯从政以来的一次精神放松和思想解放,亲历近代西方文明社会,体会到其背后的文化教育基础,并迫使他更理性地审视和反思中国社会落后的真正原因。

从欧洲回国之后,马相伯就去面见李鸿章,对功败垂成的借款之事颇为不满。李鸿章一时语塞,只是无奈地摇头道:“政府不想好,有什么办法呢!”② 此时的马相伯早已对满清政府失去信心,想到自己十几年来从政的无数次努力,以及“奇功乃复遭蜚语”(王韬语)的结局,他不禁黯然神伤。其后数年,马相伯主动退出政坛。发妻于1893年回娘家探亲时,因船沉与幼子不幸亡故,不久母亲离世,马相伯悲痛欲绝,一度过着隐居般的生活。

① 《一日一谈》,“中西各国元首学问上的比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48页。

② 《一日一谈》,“蔡子民先生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5页。



第

三

章

## 艰难跋涉：教育救国与政治信念

出自对清政府腐朽政治的厌恶和不满，马相伯 1887 年底从欧洲回国之后曾一度淡出政坛，回到书斋从事学术文化活动，静心反思强国之路，并逐渐形成其教育救国思想。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思考，而是在办学过程中不时返回政坛，不断探索教育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综合治理。

### 一、强国之路的反思与 教育救国思想形成

国难中成长的马相伯从小养成强烈的爱国



救国思想。早在依纳爵公学期间,法国领事馆得知马相伯法文特别优秀,很想聘请他为领事馆秘书,马相伯则因当时法文通史课本中无端讽刺“我们这种民族,是无功来呼吸天地间的空气”,而愤然峻拒之,并声称:“我学习法语,是为中国用的。”<sup>①</sup>当经过系统的西学训练并最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时,马相伯即萌生强烈的报国思想,立志要将西方最新的学术文化思想,“尽彼所长,转授国人”<sup>②</sup>。但遗憾的是,由法国传教士控制的天主教耶稣会不能容许他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信念,马相伯通过多年的教士生活体验,也深知神父角色难于实现救国理想。

离开教会之后,马相伯参与了洋务新政,尝试走实业救国之路。在他看来,“盖不饥不寒,然后能教,教然后不近于禽兽,不为人屠割”<sup>③</sup>。然而,追随李鸿章的十几年洋务实践,他非但没有看到任何使中国摆脱饥寒走向富强的曙光,反而见识了许多官场黑幕以及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在山东,他的“洋法代土法”之军工改革得来的是出局走人;受命朝鲜国王顾问的改革建言,逃脱不了石沉大海的命运;风尘仆仆的招商局账目之南北调研无果而终;精心策划的美国借款更是功败垂成,甚至招来“卖国”之讥。作为入世的堂堂神学博士,马相伯着实领略了晚清社会发展的种种困境;

<sup>①</sup> 《乐善堂纪闻》,“在国家忧患中生长着”,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45页。

<sup>②</sup> 刘成禺:《相伯老人九十八年闻见口授录》,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109页。

<sup>③</sup> 《务农会条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页。



而短暂的欧美之行，则使他深信西方工商业繁荣背后的文教渊源。凡此种种，都迫使他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及其动因做更加深沉的理性思考。

19世纪的最后10年是中国社会灾难深重的岁月，甲午战争惨败给所有中国人的心灵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而对于马相伯及其家族而言，更是雪上加霜。1893年，马相伯的妻子携幼儿乘船回山东探亲，不幸途中遇难双亡。两年后，母亲撒手人寰，临终前仍对两儿子离开耶稣会之事耿耿于怀。马建忠则由于跟随李鸿章参与甲午战败后《马关条约》谈判，而一度被诬为“汉奸”。面对国破家亡，马相伯身心交瘁：一方面，他开始认真反省自己与教会及上帝的关系，决定重返教会以净化自己的灵性生活；另一方面，他仍孜孜不倦地进行学术研究与思考，并努力反思强国之路。

平日里，马相伯常与同样赋闲在家的马建忠商讨学术问题。有一次，马建忠兴致勃勃地提及中国文法问题：

中国文法，尽在五七言律诗，9种字类，丝毫不乱，如：“鸿雁不堪愁里听，云山况是客中过”。鸿雁、云山为名物字，不堪、况是为况谓字，愁、客为名物字，里、中为定位字，听、过为活动字之类，更为简要。成禹请益曰：“中国骈体文对映，皆文法井然。”

对此，马相伯很有同感地回答：“是。”<sup>①</sup> 不过，马相伯并非

<sup>①</sup> 刘成禺：《相伯老人九十八年见闻口授录》，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200页。



全部赞同弟弟马建忠的学术见解。当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初稿完成后,马相伯先睹为快,但他嫌其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时间与脑力”,亲手删去2/3。<sup>①</sup>与马氏兄弟来往密切的学界新秀梁启超则更加激进,认为已经删过的本子仍有再删必要。马相伯乐其勇猛,却不敢苟同其见解,强调作为中国第一部语法著作,“举例过少,学者将要由征信而狐疑”<sup>②</sup>。学术研究,问教之乐,老少无间,马相伯看到了中国青年学界新秀的锐气和力量,从而催发其新教育理想的追求。

近代以来,有识之士较多注目于洋务实业,对工商经济发展乐此不疲,但很少考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整体协调发展。特别是对仍然占据重要地位的农业经济而言,如何使小农经济迈向现代化,如何在重商前提下不忘农业基础,如何加强农业实业教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此,马相伯深刻指出:

世见西人之来者多服贾,遂谓西人立国以商

<sup>①</sup> 关于《马氏文通》的作者,学术界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实际作者是马相伯(朱星:《〈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谁》,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另一种则强调“作者仍应作马建忠,而马相伯只是助其弟著作而已”(邬国义:《〈马氏文通〉的作者究竟是马相伯吗?》,见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中华书局,1987年,第225页),断言:“马建忠是《马氏文通》的作者无可怀疑,但不排斥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其兄马相伯的帮助。”(吕叔湘等:《〈马氏文通〉评述》,见张万起编:《马氏文通研究资料》,第301页)。依据当时马氏兄弟同时赋闲家居研究学问、相互讨论的事实,以及马相伯自述所做的删改修订之功,本书赞同后一种说法。

<sup>②</sup> 《一日一谈》,“关于马盾叔先生”,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9页。



务为本，抑知无农人出之，商将何所懋迁化居哉？而西商之狡者，利吾之重之也，遂日出其农工之余力，以易吾难致金银，岁数千万。上自武备船械，下至服用玩好，无不仰给于外洋。一若不外洋，不足以居世。舍己耘人，莫此为甚。<sup>①</sup>

为了尽快发展近代农业经济，以便为工商业繁荣奠定必要的基础，马相伯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包括后来他所提倡的“设立农业改良社”。马相伯认为，农业发展的关键在于“讲农法，开民智”<sup>②</sup>。具体而言，可分两个层次展开：

其一，通过办报译书，普及农业科学知识。马相伯说：“开民智莫善于日报，日报不能降为旬报，旬报不能降为月报。假令国中农事报无可报，则又莫善于以译书为报。”<sup>③</sup>但书籍与报刊相比较而言，“书繁重而译之者见功迟，迟则难以猛进。报则篇幅短，阅之者易而阅者多，其利普”<sup>④</sup>。书籍译介虽“见功迟”，但对于中国农业发展同样具有长远意义。因此，马相伯曾饶有兴致地介绍《农业全书》、《农学通论》等23种国外农学著作。<sup>⑤</sup>

其二，通过设立学堂，培养农业科技人才。马相伯秉承“古人教稼明农，教必有教之方与教之地”的遗意，参照“外国农政书院”，主张“设一学堂，购备书籍若干，农具小样若干，土质小样若干，化学器具若干，听人来学。……教习由会（指务农会——引者注）聘请，束修不须另送，所读悉与外

<sup>①②③④⑤</sup> 《务农会条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页，第15页，第15页，第15页，第15~16页。



洋书院无异。限5年毕业。大考获隽者,由本会给以票据,即可受人延聘,亦可在会分掌各种要务。”<sup>①</sup>

诚然,马相伯后来并没有去办一所农业科技大学,但从其颇具“大知识大愿力”<sup>②</sup>的构想中,不难看出他的教育救国思想已渐趋成熟。20世纪初,当有弟子请他出山办学时,马相伯便不假思索地做出选择。他深有感触地说:

慨自清廷外交凌替,一不知公法,二不习制造,入手工夫则文字尚无。但欧美国际文字,多用法文,故设震旦。生等且请加拉丁,姑亦从其愿焉,而于算学尤斤斤,无他,为科学等根本故。<sup>③</sup>

毫无疑问,马相伯最终选择教育事业,和近代许多教育家一样,完全是为了救国,是其曲折人生感悟之后的理性选择。其后,虽然不时回到政坛,但始终确信:“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非如革命仅一时之事,而不可一日或多。”<sup>④</sup>也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导下,马相伯毅然捐献几乎所有家产,以期待办出自己心目中的大学(详见后述)。此外,他还常拿出相当部分薪金用来资助上海的启明中学和北京的培根中学。如:1916年,马相伯在《致英华》信中写道:“请语三妹,于月

① 《务农会条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8页。

② 《务农会条议》附,“汤螯仙书马君条议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9页。

③ 《兴学笔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7页。

④ 《教育培根社募捐小引》(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98页。



薪依旧取 50 元为培(即培根中学——引者注)。”<sup>①</sup> 同年,他在《致英贞淑》中写道:“除照例培根扣 50 元外,径由东方行汇志尧可也。静宜甚窘,代助 300 元为盼!”<sup>②</sup> 字里行间,不难体会马相伯对其“不可一日或无”之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真挚情感。

## 二、政治民主化的不懈探索

马相伯虽然较长时间淡出政坛,但不等于漠视中国社会政治变革。相反,他热衷于政治民主化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从支持“维新”,拥护“立宪”,到赞成“民主”和“共和”,鲜明地表现出与时俱进的政治品格。

马相伯没有直接参与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变法运动,对维新志士的教育改革事业则给予同情和理解。康有为曾向马相伯讨教:如何更快地吸收欧洲文化?马相伯回答说:

以经验言,凡派遣欧洲之留学生,谨习彼邦文字,至少亦须 1 年以上;而留学日本者,仅 4 月,或半载,即能诵习讲义,且经费亦较留学欧洲者为省。<sup>③</sup>

①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293 页。

② 《致英贞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295 页。

③ 泽村幸夫:《马良(相伯)先生印象记》,《国难言论集》附编 2,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61~1062 页。



其后,康有为力倡留学日本,并为清廷采纳。1898年,梁启超请马相伯主持拟设立于北京的译学馆,马相伯乐其善举,但建议“将是馆设于上海,并延耶稣会士襄理馆务”<sup>①</sup>。由于戊戌变法失败,译学馆筹备之事终止。

从戊戌变法,马相伯更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全面腐朽。特别是,中国随后遭遇八国联军的毁灭性打击,与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整个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马相伯沉痛地昭示国人:各国列强正

虎狼眈眈,嗥于卧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今世界大势,譬则洪水也。我中国,譬则挪亚之舟也。此舟经3000年来,飘荡于浩淼重洋中,雨打风吹,天穷人厄,樯折帆裂,棹失舵坏,直至今日,而3000年间未闻之巨颶,复从而乘之。所经线路,礁石棋布,全舟死生,间不容发。而舟中之人,栩栩然卧而酣梦者居其泰半。其他一部分则嘈嘈切切焉,或自理其行楫,惧其沉落,或自整其衾褥,惧其浸湿。其稍进者,则欲接一二断绳,补一二漏隙,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亦有一部分,狂若瘦狗,指天骂日,谓当刃船主,屠同舟,裂舟以同归于尽。<sup>②</sup>

面对此摇摇欲覆的“挪亚方舟”,最需要就是如何同舟

<sup>①</sup> 《震旦大学一览校史》,转引自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198页。

<sup>②</sup> 《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74页。



共济,想方设法达于彼岸。然国人则“非鼾睡则自顾,非自顾则痛跃。其有一二知其不可者,亦嘿嘿不发一言,束手以待毙”<sup>①</sup>。这不能不令马相伯心急如焚。

诚然,封建统治集团从1901年就被迫实行所谓“新政”,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则进一步要求“君主立宪”,主张在“保皇”前提下使中国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梁启超还特别强调,中国民智未开,立宪政体须至“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中国最速亦须10年或15年,始可以语于此”<sup>②</sup>。与之不同,凭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神学观念,马相伯对专制主义封建统治发起猛烈批判,指斥专制主义政治为“绝对的恶政治”,宣称“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惟一之义务”<sup>③</sup>。

作为天主教徒,马相伯不可能认识到通过暴力革命去推翻专制统治;但他也并不认为,立宪一定要等到民智达到某一成熟程度才能进行。马相伯说:

惟训练可以造程度,宪法亦能造国民。……  
若必程度既到而后立宪,则西史所载,大都民不及待而先事要求;要求而不继之以争且乱者,盖不多见。我而效之,强邻肯坐收渔人之利乎?然则犹幸程度未到,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宪法之能造国民,惟此时尤易。<sup>④</sup>

①③ 《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75页,第74页。

② 《立宪法议》,见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3页。

④ 《(也是集)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8页。



诚然,知识是民治的基础,老百姓受教育程度提高必然有助于民主政治实行,但这并不等于说,受教育程度不够就不能去争取民主权利。早在1920年,英国学者詹姆斯·布赖斯就曾指出:“60年前,那些英国的老百姓许多是不识字的;但是,他们一味凭天生的智慧,坚固的思想和果敢的决断,也很能够执行他们的选举权,和现在他们的子孙们会读书看报的比较,也不见得差得许多。”<sup>①</sup>在马相伯看来,立宪政治无须坐等民智达至某一程度方才实行,十分鲜明地表达了“立宪”宜早不宜迟、宜实不宜虚的激进思想。在他看来,只有“立宪”,才能予民以权利;也只有具备了权利意识,才能更好地使人民履行国难中的一己之责。他说:“且使民无权利,不将举国奴隶,俱亡耻,俱苟安,而人主将谁与守此国土?”<sup>②</sup>

马相伯赞赏“立宪政治”,但清廷一再拖延,令马相伯对中国专制主义封建统治的顽固性有了新的认识,促使他同情乃至认同革命。他说:

至破坏专制君主,所破坏者一独夫而已耳,正  
革命者所从事也,谓之为有罪得乎?<sup>③</sup>

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马相伯便义无反顾地与江浙立宪派

① [英国]詹姆斯·布赖斯著,张慰慈等译:《现代民治政体》(上),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3页。

② 《〈也是集〉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8页。

③ 《问谋叛专制与谋叛共和其罪孰大》(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89页。



一起投入革命的洪流中去。江苏巡抚程德全见清朝气数已尽，投奔民国，成立江苏都督府。马相伯即被江苏都督府委任为南京府尹。

江苏都督府虽然成立了，但 100 多位革命军人为了谋求新政府的职位，互相争功，直闹到都督府大堂，甚至要以老拳相见。程德全一时无以为计，转而请马相伯说话。马相伯先是肯定他们“都是革命党人，都是为革命而志愿牺牲的革命军人”，之后讲了一个故事，说：

一个老妈子看护小主人，日夜吃辛苦，须得要报酬；但是，皇太后抚养皇帝，皇后抚育太子，虽然她们是在抚养一国的君主，功劳比老妈子看护小主人要大得不可比较，然而皇太后、皇后却不曾要报酬，要工钱。诸位！你们都是我们中华民国的皇太后、皇后，而不是我们中华民国雇来的老妈子。你们的功劳辛苦虽大，却都是理所当然。<sup>①</sup>

这一席恭维中寓藏讽刺的话，果然镇住来势汹汹的“鸡毛帚儿”，颇能深刻启迪他们去认真反省革命的真正意义。

民国成立后，马相伯受命担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并短期代理江苏都督。其后，他北上担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并兼任参议院参议、平政院平政等职。

需要指出的是，马相伯虽然一度担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等职务，但他并不赞成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是认同孙中山

<sup>①</sup> 《一廿一谈》，“和几百个鸡毛帚周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93 页。



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制定《临时约法》，强调要以法律武器全面否定专制主义封建统治，并牢固树立平等、自由的民主政治理念。在马相伯看来，“专制之君，可以领土为私有；专制之官，可以所辖为私有”；民国则不同，各级行政长官只是“大众之公仆，只有为大众保存公产之权”。<sup>①</sup>

同理，广大民众在专制主义社会里实不知平等、自由为何物。“百姓之贱，命曰蚁命，相习成风，数千年历史，罔知平等，无可讳言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强迫盲从，何殊器械？器械又乌识自由乎？”<sup>②</sup>与之相反，民国则视平等、自由为国宝。马相伯说：“约法与专制最相抵触者，非此人民平等与自由欤？”<sup>③</sup>他声称：“苟无平等，即非共和”；“自由者，听民自主，不加以干涉之谓也。”<sup>④</sup>强调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的一切身家财产，皆须听其自主；一切言论及动作行为，只要不触犯法律，危害国家人民利益，亦应听其自由，神圣不可侵犯。

毋庸置疑，马相伯所崇奉的政治民主化理念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野心有着根本冲突。当袁世凯欲奉“孔教”为“国教”，马相伯被深深激怒了，这倒不是因为他是天主教教徒的缘故，而是从“捍卫民主政治和信仰自由的角度”出发，极力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公开“批评袁世凯以国家元首身份主持祭孔大典”。<sup>⑤</sup>马相伯指出：

① 《劝勿为盗布告》，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页。

②③④ 《〈约法上〉上信教自由解》，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78页，第278页，第279-280页。

⑤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96页。



欧美现今之谈政治者，必予人民以信心自由、信教自由(La liberte de conscience et la liberte de culte)。信心自由者，谓得自信其良心也，不以一教之习惯，责望于人民，矧可责望于元首乎？信教自由者，谓各相安于所信之教，而不受政府之横加干涉也，则不受他教之横加干涉也，更可知矣。此欧美之元首所由以身作则，无论何祭，皆不兼主之歟？<sup>①</sup>

但遗憾的是，马相伯的批评并不能改变时局，甚至袁世凯之后的军阀政府仍然变本加厉地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写入“天坛宪法”，从而引发马相伯持续不断的尖锐抨击。

马相伯本冀望袁世凯政府能对其“函夏考文苑”的学术独立追求有所帮助，但愈演愈烈的帝制复辟及其后的军阀混战，使马相伯一度十分热心向往的崇高理想化为乌有。他曾愤恨地说：

国家理想，共和根本，以及旧日之文明物质，俱破坏无余者，谁之罪歟？按孟子论失位，谓非袁皇帝之罪，百喙难辞矣！<sup>②</sup>

马相伯是否化装成“卖菜老人，带一竹篮，逃出北平”<sup>③</sup>，

① 《一国之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5页。

② 《民国民照心镜》，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17～318页。

③ 方豪：《马相伯先生的生平及其思想》（五），载《民主评论》第6卷第13期，1944年。



已无法确证；但可以看出，马相伯重新点燃的政治热情再一次遭受严重打击。此后，他虽然没有停止对政治民主化的思考和探索，但很少直接参政了。

### 三、教育的政治理想与社会综合治理

马相伯在 20 世纪初年确立“教育救国”理念之后，除热心创办各种学校，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外（详见后述），仍不时返回政坛，致力于政治民主化的实践探索，其中个中原因，即在于他认识到：教育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相应的社会政治进步，而社会政治进步离不开教育的有力推动，“善教”与“善政”常常是彼此互助推动着社会历史的整体跃进。他说：

立国之道，有土地，有人民，而无须善教善政，  
得民心与财力，整齐而驰骋之，如威廉二世之为  
也。其可乎？其可乎？<sup>①</sup>

与政治民主化追求相契合，马相伯认为，国民的主权意识和独立精神已成为 20 世纪不可抗拒的社会进步潮流。他说：“际此 20 世纪，国民主权已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造成万国之潮流也乎！百复辟，百自亡，可断言也。”<sup>②</sup>但由于专制主义长期的闭关政治，致使国民严重缺乏国家思想和社会意识。马相伯痛心指出：

<sup>①</sup> 《答客问一九一五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67 页。

<sup>②</sup> 《民国民照心镜》，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311 页。



为什么中国人处处不及外国人？为什么外国强，中国弱？吾终于想像期间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原因。原来中国和西洋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是闭关政治，西洋的政治是殖民政治。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闭关政治，所以，皇帝不许人民有一些儿国家思想，直到现在连党政府不许人民干涉政治。因为中国是闭关政治，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巴结一个皇帝，其他一切都一概不问。直至现在，一般政客还是充满着皇帝思想，只知道争无上的权柄。中国的文臣是不知有文章的，他们对皇帝的奏章，都是一番恭维得非常肉麻的话头。直到现在，还是要拿一个人的意见当做天经地义来压服人家。<sup>①</sup>

封建时代一般读书人并不关心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普遍以做官食禄为人生理想，“人人爱做官，怕做事”，其结果必然是“官场愈富，社会愈穷”<sup>②</sup>。

与之不同，民国关注的是国家社会的全面进步，而国家社会进步离不开全体国民的自治、自立和自由精神之培育。马相伯说：

须知民国之民，其自身贵自治，贵自立，贵自由。惟自治而后能自立，惟自立而后能享用其七

① 《六十年来之上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41～542页。

② 《民国民照心镜》，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13页。



### 大自由权。<sup>①</sup>

马相伯把“自治”视为民国政治建设的基础，而国民自治能力养成则离不开包括教育在内的诸要素之耦合互助。他明确指出：

自治要亦无难，即孟子所谓“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使民皆欲耕于野，藏于其市，出于其途”之道耳，亦即今人所谓教育、体育、卫生、实业、交通等事耳。人欲相生相养，阙一不可。<sup>②</sup>

他还特别要求“商界、学界、农、工等界，毋自标榜，互相疑贰，各因现有机关，每府公举议员一人二人，顺和平正轨，使中华民族亦得自决前途，庶地方自治得实现矣！不然，民国亦不能实现。譬则一家数房，由慈父母支配日用，同与不同，子息断不能房房满意，或则有田数顷，共种与分种，试问孰勤？知此，则知地方税不用为地方费，民治永无实现之期”<sup>③</sup>。显然，马相伯十分赞赏民治精神，肯定了教育的政治理想，指出教育在人民自治和国家发展中的应有作用，并要求与其他社会职能部门密切配合。在这里，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近代另一著名教育家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他说：

所谓乡村建设，事项虽多，要可类归为3大方

<sup>①②③</sup> 《民国民照心镜》，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32页，第333页，第327页。



面；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一面。虽分三面，实际不出乡村生活的一回事；故建设从何方入手，均可达于其他两面。例如从政治方面入手，先组成乡村自治体；由自治体去办教育，去谋经济上一切改进，亦未尝不很顺的。或从教育入手，由教育去促成政治组织，去指导农业改良等经济一面的事，亦可以行。<sup>①</sup>

即是说，“乡村建设”是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或文化 3 方面密切配合的建设，并非特指某一方面的孤立行动。这一点，与马相伯对理想中地方自治的理解可谓不谋而合。

所不同的是，梁漱溟似乎更突出进而夸大教育的作用。他说：“中国社会是乡村社会，在社会上做一件事情，不往前做则已，要往前做，必有一种方向或路线的探求，有此探求，则不容不归到乡村，办教育的往前进，天然地要转到农村。我们正面解决社会问题的乡村建设者，由于方法的探索，也一定要归到教育。”<sup>②</sup> 强调中国问题即乡村问题，而乡村建设的核心动力是教育。与之异趣，马相伯并不认为，教育的功能发挥可以超乎相应的物质经济基础而不受其制约。他说：“人穷则志气短，实业不兴，又何以有精神耶？”<sup>③</sup> 又说：“过激心皆生于贫困，为势所驱，识时务者其预防之！”<sup>④</sup> 甚

①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见《梁漱溟全集》第 5 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227 页。

② 《社会教育与乡村建设之合流》，见《梁漱溟全集》第 5 卷，第 431 页。

③④ 《民国民照心镜》，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328 页，第 331 页。



至就教育系统内在结构而言,马相伯主张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强调工科实业教育为社会所急需,必须予以大力发展。他说:

人以生物为心,民以生财为道,是人与民,道无二致。不生则无以自食,而为人不力,则无以相生相养而为国。为此,或劳力,或劳心,首贵自食其力,此犹太大学,希腊及罗马所以重视工科为必要也。<sup>①</sup>

就整体而言,除注重实业科学教育外,马相伯并不偏废人文精神教育,而是强调实业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教育的辩证统一,这在其不同阶段办学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概言之,马相伯肯定了教育在个人自立、社会自治和国家自强中的应有作用,强调要依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建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三级学制,使人人有机会受到真正平等民主的教育。他充满信心地写道:

及至疆理既竣,然后兴教育,所谓即富而后教之,不致造成不足以应社会所需之教育。(各县、各郡皆可就所无、所需、所应改良者,遣送学生实地练习,学成以供社会之用。)凡满千户之区,设初等小学,县设高等小学,郡设中学,合数郡然后乃设大学。不如此,教育之才与力终虑不充。……

<sup>①</sup> 《民国民照心镜》,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30页。



民智既开，自不难清理泉源，修洁家室，以力讲卫生。<sup>①</sup>

马相伯主张教育必须与实业、卫生等社会要素一起，共同承担整个社会发展的综合治理，并由此推动社会历史不断进步。

<sup>①</sup> 《跋〈造花园新法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82-383页。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第

四

章

## 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上)

经过长期的人生体验和思想积累,马相伯于1902年底创建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又在震旦学院的基础上于1905年建立复旦公学,发凡起例,筚路蓝缕,奠定了复旦大学辉煌业绩的坚实基础。重温马相伯“毁家兴学”的感人事迹,感受其办学理念的博大精深,体悟其教学实践的高超艺术,追忆其办学过程的艰难曲折,总结其治校管理的智慧创新,我们不能不致以深深的敬意。



## 一、毁家兴学与创办震旦学院

戊戌变法失败了,但维新志士们所提倡的以“开民智”、“新国民”为旨趣的教育救国思想深入人心。20世纪初,许多有识之士认同盛宣怀关于兴学价值的深刻见解:“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况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1年,则人才迟起1年。”<sup>①</sup>问题是,办什么样的学堂以及如何办学?始终萦绕在欧游回国的马相伯心中。

就理想而言,马相伯迫切希望能够办一所“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的中国新式大学<sup>②</sup>,但仅凭一己之力创办大学,“势不能久”。因此,马相伯把期望寄予教会团体,希望教会在师资、教学等方面给予鼎力支持。拿定主意后,马相伯遂于1900年8月25日将自己的几乎所有家产——松江、青浦田产3000亩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理想大学——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sup>③</sup>:

立献据人谨承先志,愿将名下分得遗产,悉数

① 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附章程、功课),见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第138页。

② 《国难言论集·乐善堂纪闻》,“想当年创办震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44页。

③ 上海高教局历史档案,第599卷,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献于江南司教日后所开中西大学堂收管,专为资助英俊子弟资斧所不及,并望为西满安德助献祭,祈求永承罔替,中外善堂概由输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且系先人所遗名下私产,故族中一切人等,毋得过问。其系教中者,自无敢有违善举;其系教外者,则非先父先兄之嗣也,更无得过问。特此书献存档。时天主降生后 1900 年秋分后一日,即光绪庚子又八月一日。

立献据人:江苏镇江府若瑟马良

计开青娄田亩契据有绝有押,一并献存。外清册 1 通,油坊 1 所。

又近上海等处地亩数方,其契据俱一并在内,左译文另有添注,合并声明总之。

(1900 年 8 月 25 日)

马相伯本希望天主教会在收到捐献之后,能够创办一所他理想中的“中西大学堂”。不料,教会只对捐赠感兴趣,无意办学。对此,马相伯无可奈何,但办学决心已下,正待机而动。

与教会保守势力相反,社会上的求知热情异常高涨,学界新秀蔡元培就是一个典型。他主动拜师马相伯,要求马先生教授拉丁文,而此时马相伯正在寻找办学机会,故而很爽快地答应请求,乐意将自己所学贡献出来,与他分享。蔡元培当时任教于南洋公学,教务繁忙,须利用清晨时间学习,常于早上 5 点钟就来马相伯寓所敲门。马先生乐其上进,不厌其烦,但考虑到拉丁文学习需要较长时间,故建议



蔡元培不如选派些学生来,进行系统的教学训练,或许更加切实有益。于是,蔡元培派胡敦复、贝季同等 24 名学生前来学习,他们一致要求马先生教拉丁文。

拉丁文在西洋都已成为古董,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在背后笑话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对此,马相伯自有办法。除精心编写《拉丁文通》讲义外,他主张直接选读拉丁文经典名著,“大胆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季宰六(Cicero,今译西塞罗——引者注)的演讲”。果然,经过 4 个月的集中训练,他们不仅“写得出来”,而且“说得出来”,令从前笑话他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sup>①</sup>此外,马相伯还教他们法文、数学和哲学。课外时间,马相伯常和学生们滚打在一起,“有时一块儿会食,有时一会儿旅行”,并善于抓住一切机会与学生“很亲切地恳谈”。<sup>②</sup>结果,这些学生不仅学业大进,人格也得到升华。于是,声名鹊起,远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有志之士皆前来就学,“这些来学的当中,有 8 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sup>③</sup>。

与学生们一样,马相伯非常高兴,但他又深感教育责任重大,“觉得有把组织扩大之必要”。此时,马相伯自然地想到天主教耶稣会,想藉其师资优势,创办一所“具有西欧

<sup>①</sup> 《一日一谈》,“蔡子民先生与 24 个学生学拉丁文”,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06 页。

<sup>②</sup> 《国难言论集·乐善堂纪闻》,“想当年创办震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45 页。

<sup>③</sup>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06 页。



Akedemiede 的性质”的大学。<sup>①</sup> 耶稣会收了马相伯的 3000 亩田产,本应用于兴学,今见马相伯办起学校,不如顺势支持,既不十分费力,又可讨到说法。由于双方达成默契,马相伯遂于 1902 年底正式成立“震旦学院”。<sup>②</sup> 马相伯自任监院(即校长),项微坐任总干事,郑子渔任会计,其他干事由学生民主推选。教师由耶稣会数名教士担任,校舍则借耶稣会的徐家汇老天文台若干余屋。

震旦,乃梵文“中国”之谓,内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西文取名“AURORA”。马相伯深切地希望,这一“Akedemiede”式全新大学,能够一扫中国传统相沿成袭的“奴隶之学”,真正把“学问”当做“世界所最尊贵者”,“开宗明义,力求自主”,办出现代意义的新型大学。<sup>③</sup> 震旦学院开学之初,虽然各方面条件十分困难,但马相伯在开学庆典上勉励大家,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而要以“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满怀信心地投身到新大学建设之中,

<sup>①</sup>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6页。

<sup>②</sup> 关于震旦学院建立时间,有 1903 年及 1902 年两种说法。诚然,1903 年 2 月 27 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一日),为震旦学院正式开学日(参见《震旦学院开学记》,载《苏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二日《学界风潮》栏);但有学者列出 5 条证据,其中包括《震旦学院章程》在 1902 年 12 月 30 日已正式对外发表(载《翻译世界》第 2 期,十二月初一日)。学院章程的正式发表实为学校创办宣言书,而不必拘泥于具体开办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本书拟采用后者说法。参阅《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注释①考订,见《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33 页。

<sup>③</sup> 《震旦学院开学记》,载《苏报》,1903 年 2 月 28 日,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第 40~41 页。



声称：

今日我震旦学院，虽一小小学院。然恢张宏远，前程何限，如一芥之微，撮之艺之，可以通地，我震旦其奚异哉！<sup>①</sup>

震旦学院成立，很快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曾跟随马相伯学拉丁文的梁启超更是喜不自胜。他在日本著文祝贺，称：

教育议兴，即已两年。而至今无一稍完备之私立学校，不得不谓国民之耻也。……吾闻上海有震旦学院之设，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喜欲狂。该学院总教习为谁，则马相伯先生，最精希腊、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sup>②</sup>

梁启超认为，“我青年诸君，今后固不能不广求新知于世界，非游学欧洲，殆不足以占优胜也”；而马相伯这一完备的私立学校，恰恰可以为青年来日游学欧美打好坚实基础。特别是，精通多国语言的马相伯强调“院中肄业之例，以本国文学优长者为及格”，令梁启超赞赏不已，以为“我国学界，今渐滔滔然有蔑视国文之恶风，得此庶可规正之”<sup>③</sup>。

<sup>①</sup> 《震旦学院开学记》，载《苏报》，1903年2月28日，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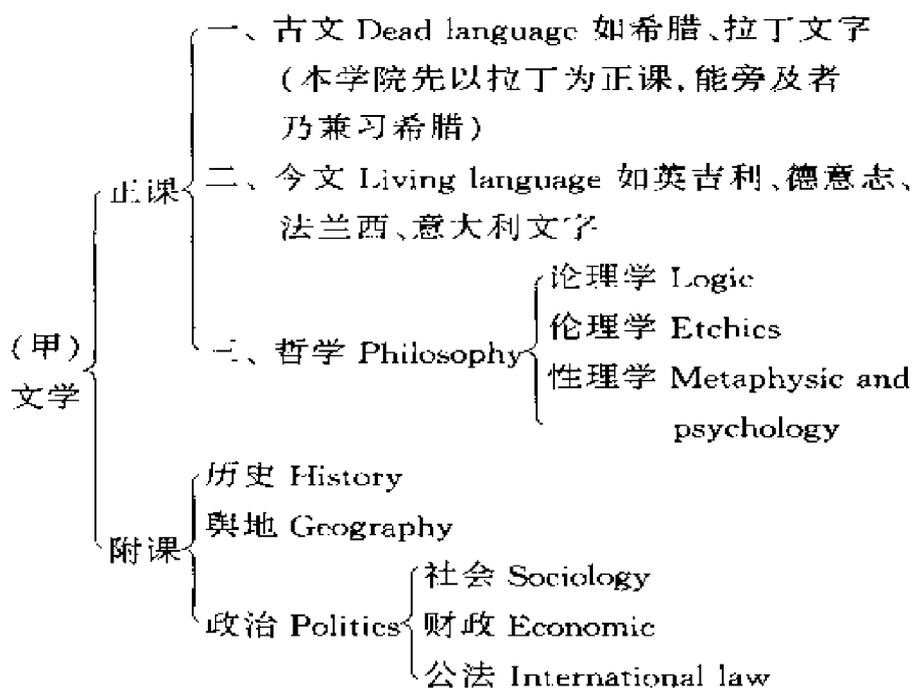
<sup>②③</sup> 梁启超：《祝震旦学院之前途》，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46—47页，第47页。



## 二、震旦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实践

震旦学院是马相伯长期酝酿、精心筹划的结果，它一经面世，即以其独特的办学理念深深地吸引着四方有识之士。这就是以“培养译才”为宗旨，以“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为信条。<sup>①</sup>

根据这一办学宗旨与信条，马相伯将学院课程分为文学(Literature)、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 Science)两科。具体内容<sup>②</sup>：



① 《一曰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07 页。

② 《震旦学院章程》(1902 年订)，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42 页。



马相伯所说“文学”并非狭义的文学,而是泛指人文科学,正课要求学习古文(如:希腊文、拉丁文)、今文(如: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等文字)及哲学(含论理学、伦理学、性理学),附课则须学习历史、地理、政治(含社会、财经、公法)。“质学”以广义的自然科学为主体,正课要求学习物理学、化学和象数学[含算学、几何、代数、八线(三角)、图授(立体几何)、重学(力学)、天文学],附课须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簿记学、图绘、乐歌、体操。这一近代意义的课程分类摒弃传统经学课程体系,体现“泰西国学功令”的新学精神。马相伯还特别强调,本院“治泰西



士大夫之学，其肄业之书，非名家著（Classical auther）不授”<sup>①</sup>。

为了吸引更多青年才俊前来就学，马相伯别出心裁地把“入院办法肄业者分为普通、特别两科”。普通科至少需交银百两方可入学；特别科则是面向那些“无力而有学者”，“可以其著作介绍，一通人代递，并明言其精于何种学科，入院试读1月，其学行经本院干事3人认可，即得免送捐金住院肄业”。<sup>②</sup>显然，马相伯把教育当做人类社会的崇高事业，注重真才实学，旨在为民族国家造就栋梁之才。

由于注重真才实学，马相伯对“四方思想不同的有志青年”均兼收并蓄。与纯粹的革命学校——爱国学社不同，震旦学院注重学术研究，强调要在革命之前，须先打好科学与文学的基础。马相伯说：

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其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sup>③</sup>

震旦学院并不排斥革命青年，爱国学社因《苏报》案牵连而被迫解散，多数学生便转入震旦学院，为马相伯所欢迎。特别是，当陕西青年于右任因作诗讥讽慈禧太后卖国行径，为当局所通缉，亡命上海时，马相伯从报上知其事后，便嘱托

<sup>①②</sup> 《震旦学院章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1页，第43页。

<sup>③</sup>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29页。



弟子雷祝三——也是陕西人,去找于右任。于右任久闻先生大名,得知先生想见他,十分高兴,但不免忐忑起来,没想到见面后,先生视之如家人子弟一样亲切。先生说:

国祸日亟,少年人忧时感事,以文字买祸,贤者不免。然而列强并峙,人之所以国富民康,战胜攻取,而使我相形见绌者,弥不由于政教之修明,学术之精进。吾子文人积习,但以空言抒愤,于世界大势懵无所知,即使他日得行其志,亦于世何裨?①

于右任听罢,大受感动。马先生不仅没有指责他的意思,反而引导他认识到求知问学的救国意义,“告以救国必先科学,而欲研究科学,深造有得,必自娴习西文入手”②。不久,马相伯便免其学费,让他著籍入学。此时,正值《苏报》案发,文网苛密,于右任担心连累先生安危和学院发展,马相伯却坦然地笑谓:“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了做东道主矣。”③

马相伯不仅平时引导学生“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以为日后革命救国之准备,而且身体力行,将这一信条贯彻到课程教学之中,深受学生欢迎。据弟子高平子回忆,当时物理及几何两门功课由马先生亲授,“物理马师称之为‘形

①② 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91—92页,第92页。

③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30页。



宪’，几何则从徐光启之旧译。当时几何或译作‘形学’。我初以为几何是一种计算长短大小的方法而已，乃开讲之初，只是从几条公理(Axiom)及几则界说(Definition)讲起，一支垂线即有如何界定之理，而绝不及数字。这使我于思想方法上顿悟有新境界而发生甚大之兴趣。此二门功课皆有油印讲义。”<sup>①</sup>此外，马相伯在震旦学院还亲授文艺方面课程。另一位弟子陈传德回忆说：

文法与名人格言两书，由先生亲自教授，语多启发，能使学生举一反三，并常应用我国典籍成语，以解释课中文字句。其博通今古，融贯中西，迥非时流所能望其项背，而学生得其陶冶，进步神速，即驽钝如传德，习法文未足3学期，已能与法籍教授直接谈话矣。余如象数学、格物学、致知学各科，亦但开示门径，启学者自由研究之风。<sup>②</sup>

以“致知学”为例，马相伯为配合教学，编写哲学教材《致知浅说》，分《原言》、《原有》、《原行》，所惜仅存《原言》上卷。该书虽名《致知浅说》，对西文的“Philosophia”却有独特理解。他赞赏儒家经典《大学》“致知”说，称朱熹所注“致，推致也；知，犹识也；推及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即“西庠所谓 Philosophia”；认为日本人译为“‘哲学’，似泛。

<sup>①</sup> 高平子：《马相伯先生印象片段》，见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复旦校长忆母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sup>②</sup> 陈传德：《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33页。



不如《大学》曰‘致知’，兼含为学工夫——与希文更切，名义尤醒”。<sup>①</sup> 全书旨在介绍西方哲学，但不乏自己的学术见解。马相伯说：“编中间不因众寡贵贱之信从，辞章之优美而成立也。理论自由，能今斯今，自大师驾马，已择别于前贤往训而惟道是视，本编亦奉此以周旋而已矣。”<sup>②</sup>

一方面，为了能够确切地发掘西方哲学原义，马相伯在书中所引西文，“只用拉丁”。他解释说：“一以拉丁非流行语，不至随流俗以变更，语义反确定故；二以欧语凡胎息拉丁，若英、法、意等者，皆可通故；三以学问名词，国语多浮泛，注以拉丁，则本编新译，有不恰当者，海内及后之君子可正之。”<sup>③</sup>

另一方面，马相伯十分重视西学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会通。除前述“Philosophia”译为“致知”外，还有许多西学概念译词都极具本土文化色彩。如译“abstractae”为“玄攤”，他分析道：“玄攤者，谓不案切客观实有之现呈，乃脱离性体而取其表识也。殆即《太玄经》所谓‘幽攤万类而不见形’者欤？其表识或关禀赋，或关依附，皆可。”<sup>④</sup>

显然，马相伯编写教材十分严谨，深得西方近代学术自由的内在旨趣。

马相伯所标示的“不谈教理”体现在《震旦学院章程》中，一般教会学校常设“圣经”、“教会史”等课程均荡然无

①②③ 《致知浅说·小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36页，第641页，第636页。

④ 《致知浅说》卷之一，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49页。



存。据弟子陈传德回忆,当时“院章规定,教授上课,不谈宗教,故遇孔子圣诞、耶稣圣诞,均不举行仪式,且仍照常上课”<sup>①</sup>。虽然偶有耶稣会教师谈及有神论观点,但一般会遭到学生的拒绝和反对。学生陆章甫说,有一次上哲学课时,神父李问渔“讲到天主创造人类、天主创造世界等问题时,学生纷纷起立,引征达尔文学说加以反驳,使李面红耳赤,无法解答”<sup>②</sup>。显然,震旦学生普遍认可“不谈教理”信条。

### 三、民主自治制与震旦风潮

马相伯一手缔造的震旦学院,其管理办法十分简约而精干,这就是院长领导下的民主自治制。学院仅设总干事和会计干事两名专职人员,“其余干事,于学期开始,由学生互推分别担任,其职务至学期之终为止,只执掌权限,悉遵学生自治规程”<sup>③</sup>。所聘耶稣会士教师只须专心教学工作,无须费心具体管理事宜。这一“民主自治制”,自学院成立后一直被学生们视为珍宝,严格执行。

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以学生为主体管理制度运行得有声有色,而面向所有“思想不同派别不同”有教无类之办学

<sup>①③</sup> 陈传德:《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33页,第232-233页。

<sup>②</sup> 陆章甫:《记震旦学院几件事》,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146页。



方针,更容纳了于右任、邵力子等一批革命志士。学校学术气氛浓厚,不谈教理,革命精神又十分高涨,而这一切均不是耶稣会所期望的景象。于是,他们开始怪罪,乃至公开干涉马相伯的办学方针及管理措施。马相伯说:

他们(指耶稣会士教师——引者注)当我创办震旦时,都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则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sup>①</sup>

因此,马相伯与耶稣会之间的矛盾潜滋暗长,且愈演愈烈。

耶稣会在道理上说服不了马相伯,暗中从安徽教区调来法籍传教士南从周,阴谋取代马相伯,夺取学院领导权。南从周到校后,尽改学院旧章,越权要求教授收缴并呈验新生学费,同时随意“将头二班英文裁去”,以突出法文教学,声称“如不愿者听之”,并让马相伯“无病而入病院”,以便独揽大权。南从周的所作所为严重违反学院的民主自治传统,极大地伤害全体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精神,也严重背离中国社会发展对英文的实际需要。显然,“马相伯那相当进步的面向学生的高等教育方法,同耶稣会高度

<sup>①</sup> 《一且一谈》,“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10页。



集权的方法间不可调和的分歧”，直接“酿成了一场‘学潮’”<sup>①</sup>。为了捍卫得之不易的民主自治，学生们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商讨对策。学生代表沈步洲登台演说：

现在震旦学堂，已变为教会。如昔日学科，皆英、法并重，今则专用法文。且各科亦以法文教授，厥证昭著。且吾辈所以入学院者，以马君在院。马君为华人，且热心教育，今马君无病而入病院，不啻教会逐马君而夺全校之权也。处今之时局，若使马君设法与教会争，则彼亦一教会中人，必不能直与教会争执。故今日惟有退学之一法，如诸君赞成退学，即乞签名；不愿退学者，亦听。<sup>②</sup>

沈步洲的精彩演说，既表达了对教会专制的愤懑，伸张了民族正气，又深切地体察到热心教育的马相伯“无病而入病院”的无奈处境。话虽简短，却掷地有声，催人泪下。学生听罢，个个争相签名，签名者多达 130 人，不签名者仅 2 人。

学生们把签名簿呈交马先生，“马君对学生饮泣，以为己身为教会所制，不能自由，并将学生所缴学费退还”<sup>③</sup>。望着心爱的学生一个个离去的背影，马相伯强忍悲痛，“凄惨之情，不可言喻”<sup>④</sup>。

① [加拿大]许美德：《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法国同中国教育交流的二律背反》，见[加拿大]许美德、[法国]巴斯蒂等著：《中外比较教育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6页。

②③④ 《震旦学院学生退学始末记》，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47—48页，第48页，第48页。



然而,学生并没有远走,而是相约以团体为重,决不离散。部分学生还摘下校牌,并带走教具与图书,以为他日复校的准备。走到张园,他们拍了一张小照,作为反教会专制斗争纪念。数日后,学生约请马相伯出席沪学会,并公推马相伯为会长,还推选出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叔、沈步洲、张轶欧等人为干事,筹办复校事宜。

需要指出的是,马相伯虽然再次和教会发生激烈冲突,而且不亚于当年他“离会出走”的程度,但作为天主教徒,马相伯并没有动摇其宗教信仰。他只是不赞同当时由法国传教士控制的上海耶稣会脱离中国国情的殖民主义办学倾向,如肆意取消英文课而突出法文课,践踏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学生自治精神等。

马相伯对教会较为严格的学术教学传统始终表示敬意,这也是他借助教会师资的重要原因。因此,马相伯被迫辞职后,出自对教育事业的关心,仍对由教会续办的震旦学院表示极大的关注。1908年,震旦学院在法租界新建校舍,马相伯又“捐现洋4万元”及“英法两租界地8处,当时价值10余万”<sup>①</sup>。

为了震旦学院,马相伯捐献其所有家产,自己及家人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其后不久,大儿子马君远中年夭折,一家人生活更陷入困境。韩希愈先生曾无限感慨地写道:“他这种一心为振兴教育,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彻底的无私

<sup>①</sup> 《家产立典记》,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04页。



奉献的精神,可谓古今一人。”<sup>①</sup>

## 四、复旦公学的诞生

震旦学院,这一令梁启超喜欲发狂的“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不足3年就被迫解散,个中原因不能不令人做深刻反省。该学院从初建时的二三十人,到1905年的百四五十人,可谓蒸蒸日上,何以会盛极而衰呢?

诚然,马相伯所奠定的“民主自治制”遭到专制教会的破坏是学院解散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对此,严复说:

所不幸者,以经费师资之絀乏,而借地借才;  
以借地借才,而教育之权界不清;以教育之权界不  
清,遂终于相激而解散。<sup>②</sup>

这一分析确实道出震旦学院解体的深层经济基础。虽然马相伯此前已捐赠3000亩田产,可视为震旦学院的基本建设基金,但既属捐赠,“教育之权界”便不易说清。

复旦公学筹建之初,同样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果全部经费“出于官场,而必予官场以干涉之路”,且将失去办学者的“独立之精神”。因此,激进者主张效法南洋公学退

<sup>①</sup> 韩希愈:《马相伯的办学治校》,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10页。

<sup>②</sup> 严复等:《复旦公学募捐公启》,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2页。



学学生自立“爱国学社”的做法,不以官力为援手,强调“有百余学生,有热心教师,无形之学校已成”,藉收缴学费,“草创伊始,无妨初就”。<sup>①</sup>这一建议虽有合理之处,但显然过于理想化,无法操作。较为可行的办法是,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同时不拒绝官方资助,这种形式的办学在当时被归为公立学校性质,以别于纯粹的官立和私立,复旦公学最后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

马相伯此时已66岁。为了寻找合适的办学地点,他和学生们一起四处奔走,总算看中较为理想的校址。马相伯说:

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衙门,地方很宽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sup>②</sup>

于是,马相伯立刻打电报给两江总督周玉山(馥),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周玉山念及与马相伯哥哥马建勋同是淮军的关系,很爽快地将吴淞镇台的旧提督衙门拨给马相伯办学<sup>③</sup>,同时寄来2万两银子作为办学经费。<sup>④</sup>

① 吼:《忠告震旦学生》,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49页。

②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7页。

③ 关于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情况已罕为人知,喻衡先生曾依据多种史料重绘《复旦公学吴淞时期校舍复原图》,形象地再现当年面貌。参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卷前图。

④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7页。另有一说,则谓周玉山(馥)“拨给开办费万元”。参阅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5页。



与此同时,马相伯的挚友严复深为马相伯的办学热情所感染,他组织包括袁希涛、萨镇冰、熊希龄、张謇等多达28人的复旦公学董事会,向社会发出《复旦公学募捐公启》。称:

以中国处今日时势,有所谓生死问题者,其惟兴学乎。……今者复旦募捐,确资兴学,其为社会利益,影响垂百千年,遍各行省,关系本图尤远且大。是以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周尚书知之,当震旦解散之始,即毅然以维持规复为己任,首拨巨金,为海内倡。又蒙江南提督杨军门假以吴淞行辕,暂充校舍,栖止生徒。苏松太道袁观察禀拨吴淞官地若干亩,为建筑新校之用。惟是造端宏大,需款犹多,必资众擎,而后克举。用敢据实布启于海内外诸公。上自公卿,下逮士庶,倘蒙慨助,请列台衔,邮兑法马路洋行街德发洋行曾少卿处掣取收条,登报鸣谢。此外,中外日报馆、时报馆二处亦可代收转交。至落成开学以后,所有用费,以及每年出款功效,容随时造册,胪列报端,庶使热心教育者,晓然于款不虚糜,事有实济。总之,此举关系国家公益,亦非区区发起者所敢居其成功也,诸公鉴之。<sup>①</sup>

这份《公启》把兴学育才与中国生死存亡联系起来,视为“国

<sup>①</sup> 严复等:《复旦公学募捐公启》,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1—53页。



家公益”事业,情真意切,感人肺腑。但遗憾的是,《公启》发出后,并没有筹募到多少捐款。不过,《公启》的意义已超越了募捐本身,既强化了兴学在当时中国的救国意义,也表达了复旦公学同仁们的公心、诚心和决心。正是依靠这样的公心、诚心和决心,复旦公学在此后办学过程中才得以不断克服经济困难,办出特色和品牌。

正当马相伯、严复等人积极筹备复校的时候,法国教士控制的耶稣会却先声夺人,盗用“震旦学院”名称,在《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登出广告,谎称:

震旦学院前因学生误会意旨解散。而本堂及各教员于中国教育之前途,热心未解,即院中书籍、标本等,亦一切无恙。现拟延请中国清望素著,讲求教育之人,为本学院名誉赞助员,商订学课规则,定期招考学生,于七八月开办,先此广告。<sup>①</sup>

该广告刊示前,《时报》负责人狄葆贤将此事告知马相伯,马相伯与学生们商量后,决定与该广告同日登出《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公白》,以正视听。《公白》说:

震旦解散后,除添建之校舍移赠教会作为酬谢外,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毫无轶轳。现暂借吴淞提辕,定7月下旬开学,更名复旦公学。旧时院名,久已消灭,此后倘有就旧基重

<sup>①</sup> 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0页。



行建设者,无论袭用旧名与否,与旧时震旦丝毫无关,特此敬白。<sup>①</sup>

《公白》中所说“凡公备一应器具暨书籍标本早经迁出”,与教会《广告》所谎称“院中书籍、标本等,亦一切无恙”,可谓针锋相对,指责了教会“袭用旧名”的偷盗行为。更为重要的是,《公白》明确表示“更名复旦公学”。

复旦,出自清代沈德潜选编《古诗源》中的《卿云歌》:“卿云烂兮,虹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sup>②</sup> 内藏恢复震旦、复兴中华的双重旨趣,寓意深远。为了发扬复旦公学的反帝爱国精神,该校徽章特“拟用金制黄玫瑰,以明黄人爱国之义”<sup>③</sup>。

《公白》刊出后不久,复旦公学先后刊登两则广告,讲明暂定学额 160 人,除前震旦学生报到者 120 人外,还须招收 40 人;由马相伯、严复亲自主持入学考试,学程“定预科 4 年(一为实业专门之预备(期),一为政法专门之预备期,可直接大学),专科 2 年”<sup>④</sup>。出人意外的是,报考人数竟多达 400 名。马相伯决定增加招生额,共招新生 50 名。<sup>⑤</sup>

1905 年 9 月 14 日,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

① 见《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第 49~50 页。

② 《卿云歌》,见沈德潜选编:《古诗源》卷 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

③ 《复旦公学章程》(1905 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51 页。

④ 《复旦公学广告》(二),原载《时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十八日,见《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第 51 页。

⑤ 1905 年《复旦公学考取新生全案》列举详细名单,参见《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第 78 页。



被师生共推为首任校长。马校长聘李登辉为教务长,叶仲裕、于右任、邵力子诸君分掌行政,请“张汝楫昆季暨王培元先生等多人分任教席”。学校将学生分为英文班及法文班两种,除国学外,“法文班各科学,均用法文讲授,英文班亦然”。为了节省开支,年迈的马先生亲自讲授法文班各课程。“当其兀坐讲台时,搁铜框巨目镜于鼻端,终日口讲指画,不以为苦。”<sup>①</sup> 为了复旦公学的发展,马相伯又以昂扬的精神开始了新的办学征程。

## 五、经世致用与复旦公学的价值取向

与私立震旦学院不同,复旦公学建立于中国近代第一个实行了的学制——“癸卯学制”之后的1905年。依据《高等学堂章程》关于京师设立大学堂,省城与府州县设立高等学堂与中学堂的规定,以及官私共助性质,复旦公学相当于高于中学堂而又低于大学堂的公立高等学堂或大学预备学校。公立不同于官立,但与纯粹私立显然也不一样。

如果说,震旦学院旨在培养重量级“译才”,是沿着马相伯最初设计的“中西大学堂”理想运行的话,那么,复旦公学的创办则不能不考虑到“癸卯学制”颁行后的社会需要。这无论从其办学宗旨,还是学科课程,均表现得十分明显。

从办学宗旨看,复旦公学强调培养具有近代国民资格

<sup>①</sup> 复旦大学同学会:《相伯夫子与复旦》,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4页。



的经世致用型人才。该校章程明确指出：

本公学之设，不别官私，不分省界，要旨乃于南北适中之地，设一完全学校，俾吾国有志之士，得以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由浅入深，行远自迩，内之以修立国民之资格，外之以裁成有用之才。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宗旨正鹄，固如是已。<sup>①</sup>

这一宗旨显然已溢出震旦学院的“译才”范畴，强调具有国民资格的“有用之才”；同时，又保持注重西文教学的震旦传统。《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规定，“除备斋本国历史、舆地、数学诸科，须用汉文外，余皆用西文教授”<sup>②</sup>。

复旦公学何以特别注重西文教学呢？《章程》指出，这不仅是因为西方历史、舆地诸名目译成汉文，“叶音聱牙，不便记忆”，更重要的是，在“世界竞争日亟”的20世纪初，“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未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劣败之忧，甚为可惧”<sup>③</sup>。显然，马相伯仍是从民族国家自强复兴高度来阐发办学宗旨与纲要。他丝毫没有贬低国学的意思。《章程》写明，若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摒斥”<sup>④</sup>。规定“讲授国文时间，不能过多”，为了更充分地吸收西学新知，以切实提高我学界的学术水平。马相伯补充说：“所冀他日吾国学界，智术完全，则一切校塾，自可用国文传习。”<sup>⑤</sup>

<sup>①②③④⑤</sup>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0页，第50页，第50~51页，第53页，第51页。



关于学科课程,《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除依据《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外,特声明“略参东西名校通行章程规定”。公学分正斋3年(含两类学科:政治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及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备斋2年(程度不足入正斋者),专斋2年(正斋毕业后有意留校继续肄业者,拟设政法、实业两类)。其中,正斋第一部(政法科、文科、商科大学之预备),设有科目:伦理学、国文、英文、法文、德文、历史、地理、数学、论理、心理、理财、法学、簿记学、体操、音乐、拉丁文;正斋第二部(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设有科目:伦理学、国文、英文、法文、德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矿物、动物、植物、测量、图书、体操、音乐、拉丁文。不难发现,西方语言文字(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与中国语言文字(国文)受到同等重视,折射出复旦公学对震旦学院教学传统与学术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在具体的规范化管理方面,复旦公学校之震旦学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除列专章阐明公学纲要及宗旨、分斋及学级、学科程度外,还对入学程度、课堂规则、自修室规则、宿舍规则、体操场规则、演说规则等作了详细的严格规定。

以“入学程度”为例,《章程》规定:“投考者年龄,以15岁以上、23岁以下,为最合格。其年稍长,而中西学术确有门径,精力能赴所定课程者,临时由校长酌定。”<sup>①</sup>

又如:“演说规则”,《章程》规定,每星期日或星期六下

<sup>①</sup>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4页。



午举行演说会,强调演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行将行立宪,此后中央政府、地方自治,皆有聚集会议之事。其聚散之仪文,辩论之学术,诸生允宜亟讲”<sup>①</sup>。

在这里,我们很容易看出,马相伯对教育的经世致用之价值认同。至于其他各项规则的制定,也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复旦公学教学管理工作的改革与探索。

## 六、复旦公学的办学成绩与曲折发展

作为反教会专制斗争的产物,复旦公学从建立之初就面临马相伯当年创办震旦学院时所遇到的同样问题——经费与师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于右任说:“及复旦公学成立,经费师资,两皆匮乏,环境困难,较震旦时代且倍蓰过之。”<sup>②</sup> 经过马相伯、严复、李登辉等校长及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复旦公学“虽屡经波折,率能延续其生命”<sup>③</sup>,并办出骄人的成绩。

马相伯以一种“不懈益励之精神”<sup>④</sup>,全身心地投入到复旦公学的创办之中。从院址选择、经费筹措、师资聘请、章程制定、课程设计、教学实践,马相伯无不殚精竭虑,为复旦公学乃至后来的复旦大学的发展奠定了根基。在清朝末期创办这样一所学校,其艰难程度确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sup>①</sup>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0页。

<sup>②③④</sup>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7页,第57页,第57页。



复旦公学成立不久,受马相伯校长(后改称“监督”)委托,行政干事叶景莱“冒着炎热到南京、扬州、淮阴等地奔走累月,募得一笔款项,才使复旦能够继续维持,度过困境”<sup>①</sup>。

1906年,马相伯辞职,东渡日本,严复继任为监督。在严复担任监督期间,学校财政仍十分困难,为了维持最低限度日常费用,“财政局每月筹拨银1400两,作正开销”;至于改善校舍,更是“力有未逮”<sup>②</sup>。1907年,严复辞职,由夏敬观、高风谦先后担任监督。1910年,马相伯再次担任监督。数年间,虽然五易监督(即校长),但他们都是因故辞职。任职期间,都是全力以赴,“先后聘请李登辉、袁观澜、周贻春、赵国材等担任教学或主持教务工作,教学要求严格,效果较好”<sup>③</sup>。

由于有名师掌校,复旦公学吸引了不少四方才俊之士。这些学生既有震旦学院的老学生,又有从全国各地慕名前来投考者。其中,早期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陈寅恪、竺可桢、张大椿、曹惠群、李谦、李兆瀛、郑蕃等。复旦公学早期学生往往未及毕业就出国深造,也有中途转入他校者。据《复旦公学章程》(1917年)统计,1908—1911年,复旦公学高等正科毕业生共有56名,具体情况如下<sup>④</sup>:

① 胡国枢:《复旦最早的学生会主席叶景莱》,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0页。

② 《筹拨复旦公学经费折》,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79页。

③ 《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9页。

④ 《复旦公学章程》(1917年),见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11—712页。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光緒三十四年(1908)第1次高等正科毕业

姓名	籍贯	离校后情况
杨 黎	贵州铜仁	已故
王仁弼	江苏昆山	北大教员
蒋思鎬	江苏太仓	吴淞水产学堂教员
郑 传	江苏吴江	苏州省立工业专门学校教员
吴泽民	广东潮阳	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许士达	浙江钱塘	教育部视员
徐仁鎔	江苏宜兴	北大教员
郭 翔	广东潮阳	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宣統元年(1909)第2次高等正科毕业

姓名	籍贯	离校后情况
张晏孙	浙江钱塘	本校教员
叶秉孚	浙江慈溪	本校教员
邵闻豫	浙江绍兴	本校教员
董锡麟	浙江永嘉	安徽省立农业学校教员
张 彝	江苏高邮	湖北沙市甲种商业学校教员
顾祎麟	江苏上海	上海南洋中学教员
毛经学	江苏加宝	江苏省立第四中学教员
章锡和	江苏江阴	交通部
陆曾沂	浙江崇明	编译书报
滕士麟	浙江绍县	留美
陈 朴	湖南长沙	留美
李进隆	湖南湘乡	前太仓中学教员
茅征吉	江苏海门	
蒋恩镇	江苏太仓	
李益深	江苏吴县	
周水年	江苏余姚	本校教员



## 宣统二年(1910)第3次高等正科毕业

姓名	籍贯	离校后情况
杨维贞	四川新津	留美
俞肇熙	浙江平湖	平湖县立东湖学校教员
金向泗	浙江秀水	毕业北洋大学, 任职外交部
金向珠	浙江秀水	毕业北洋大学, 中华书局编辑
徐鼎	江苏吴县	外交部
张宗翰	浙江平湖	北京英文学报主笔
毕治安	江苏金山	本校教员
吴兆桓	浙江杭县	外交部
孙祖烈	浙江杭县	驻美公使馆随员
郑孝允	广东潮阳	已故
陈承斌	福建闽侯	留美
朱澄	浙江杭县	商务印书馆编辑
廖其望	四川巴县	
伍崇德	江苏江宁	前奉天督署科员
吴霞	江苏武进	参谋部
金振	浙江杭县	已故
牟启中	浙江玉环	浙江省立第七中学
郭云衢	浙江玉环	毕业于北洋大学
郑达宸	江苏江阴	留美
苞劼	浙江慈溪	宁波效实中学教员
陆守经	江苏青浦	司法部

## 宣统三年(1911)第4次高等正科毕业

姓名	籍贯	离校后情况
钱智修	浙江嵊县	商务印书馆编辑
夏传洙	江苏丹徒	已故
高丙炎	江苏丹徒	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教员



续上表

姓名	籍贯	离校后情况
陆懋功	浙江平湖	办理本乡学务
金绕海	安徽婺县	经商
任传鹤	江苏吴江	
任传薪	江苏吴江	同里丽则女校校长
朱景宽	浙江平湖	浙江处州中学教员
万培基	江苏宜兴	已故
张饰城	安徽天长	天长县立师范传习所天长高小教员
李守棠	江苏武进	

上表所列举的复旦公学高等正科毕业生去向情况,显示了他们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除个别情况不明外,从事学校教育工作者占了近半数,共 23 名,出洋深造或驻外从事外交工作者 6 名,担任报社主笔或编辑 5 名,参与政府工作者 7 名,经商者 2 名。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复旦公学所在地吴淞校舍一度为光复军士兵所占用,学校被迫辍课。承无锡乡绅借惠山李汉章公祠及昭忠祠,马相伯决定将复旦公学暂移此地继续办学。同时,由于帝制覆灭,原来意义上的官助自然瓦解。革命带来机遇,复旦公学面临着由公立向私立的体制转轨。此时,马相伯又一次升腾起中西合璧的大学理想,拟将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学院,并向社会推出“复旦学院”广告,称:

同人等拟仿鹿洞、白鹤之遗轨,推而广之,为哲理、文学、政法、象数、理化各科大学,旁及制造、



驾驶等门。惟兹事体大，端赖先达扶翼，同志应求。凡海内高材，愿来讲学者，与之探讨，窃欣慕焉。……马相伯、胡敦复同启。<sup>①</sup>

经过马相伯及其同仁多方努力，特别是临时政府交通次长于右任出面，向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政府主管部门汇报复旦公学的处境及其设想，很快得到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鼎力支持。这不仅因为蔡元培也是马相伯的弟子，更重要的是，复旦公学本身就是反教会专制斗争的产物，是一所具有浓厚学术底蕴且又潜藏革命力量的新式学校，与共和民主精神颇相契合。因此，临时政府教育部在经济困难情况下，特拨款1万元资助复旦办学；同意马相伯请求——批准照大学办理立案，并指示有关部门协助解决校舍问题。

马相伯重提校舍问题，因为暂借的无锡李汉章公祠及昭忠祠，“接近花市，箫鼓画船，不宜建设学校的缘故”<sup>②</sup>。周围环境条件确实不便办一所像样的大学。马相伯回忆说：

和二三友在茶馆吃了几次茶。说来也很奇怪！无锡那时的茶馆，楼上楼下都是满座，但楼上从楼板缝里看楼下看得逼清，楼上人一行动，楼下的茶桌上便灰尘遍处，然而大家都安之若素，一点

<sup>①</sup> “复旦学院”（广告），原载《民立报》，1912年12月4日、5日、6日，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5页。

<sup>②</sup> 《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原载《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7页。



也不觉得难过。我那时看了这种情形,便万分不耐,于是感慨万端。<sup>①</sup>

马相伯写了一封信给江苏都督庄蕴宽,希望将上海的李文忠公祠拨给复旦做校址,很快就批下来了。此事却让李文忠公的儿子李伯琴不高兴,说无端强占其父祠堂。马相伯辩解道:“不是我强占它,而是庄氏批准的。”同时表示,“凡于纪念李文忠的碑记、塑像、牌位,皆丝毫不动,一律保存”。<sup>②</sup> 复旦公学确实信守马先生的承诺,并办出了相当的成绩和影响。马相伯自豪地说:“复旦在中国的教育上,总算尽了相当的作用。用李文忠祠堂来做它的校址,不但不辱没李文忠,实在是看得起他老先生。”<sup>③</sup>

复旦公学虽然被教育部批准按大学办理,但根据实际情况,马相伯与“复旦筹办事务所”主要成员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叶藻庭等人商议,决定仍按3年制大学预科办理,分文、理两大门类,附设中学部;主张待条件成熟后,再改名大学。因此,对外“招生广告”不再称“复旦学院”,而仍称“复旦公学”:

本公学经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学科,先办中学及补习科,俟经费充裕再开大学专科。教员已延请欧美专科毕业诸子胡敦复、沈步洲、陈警康、郑桐生、朱炎之等分科教授,务求各项

<sup>①②③</sup> 《一日一谈》,“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10页,第1110~1111页,第1111页。



科目咸臻完善。<sup>①</sup>

在民国初期经费、师资等困难的情况下,这一决定是明智的,也是符合办学规律的。

除为新校址终日奔波外,马相伯十分关注经济支撑问题。教育部所拨1万元资助,只能解决部分困难,学校的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建立较为稳定完善的经费保障体制。为此,马相伯、胡敦复等决定成立校董事会,聘请孙中山、王宠惠、陈其美、于右任、沈缙云等为董事。其中,沈缙云为上海信成银行协理,在金融界享有盛誉,与马相伯交往甚密。为了复旦的远大前程,马相伯与于右任、胡敦复联名致书沈先生,请求他出任校董<sup>②</sup>:

缙云先生执事:

緬維复旦創自乙巳,几经艰辛,始克成立,贤士大夫实宏其赐。乃成材未百,世乱繁兴,旧有胶庠,化为壁垒,公帑既绝,度支以穷,300青年一时星散。继复卜室惠山,略图完聚,终以竭蹶,未能久支,言之痛矣。迨者国是大定,作育是谋,复旦为东南巨校,坐视沦替,情所不安。良等用是奋兴,力谋振董,今已禀准教育部立案,并乞苏督指

① 《复旦公学招生广告》,原载《民立报》,1912年4月20日、21日、22日、23日、24日、26日、27日、28日、29日,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6页。

② 沈云荪:《马相伯与沈缙云的交往》,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85~286页。



拨李公祠改作黉舍，兴复不易，亟待扶持。伏以先生学林泰斗，薄海倾心，敢为吾徒，乞赐栽植。倘荷不鄙，许为复旦校董，时时督教，以所（疑为“匡”）不及，不胜大愿。敬谨陈白，伫候德音。春寒为道，自卫不宣。

马 良(马相伯) 于右任 胡敦复  
邵闻泰(邵力子) 叶永鋈 钱智修  
郑 允拜启

聘请书言辞恳切，字字珠玑，其忧国之心，重教之情，发自肺腑，跃然纸上，令人感动。

1912年4月，马相伯与“复旦筹办事务所”诸同仁在复旦公学由无锡迁回上海之前，先行在上海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借得民房一所为校舍，接受报名并录取学生约百人。5月10日下午，复旦公学举行“开校礼”，马相伯精神饱满地登台演讲，极言“民国建立之急须趋重教育”的种种理由，称：

复旦开办已10载，初由震旦更名，即有希望光复之意，今幸达目的，益当名副其实，以为吾民国光华。<sup>①</sup>

座下掌声雷动，学生备受鼓舞。稍后，代理教务长沈步洲向学生们解释何以不急于改名为复旦大学的原因。他说，复

<sup>①</sup> 《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原载《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7页。



且“取人才教育主义,但现在仍不更名大学者,因大学2字,国内尚无比较之准绳,必与外国之大学相比较。复旦学期原定6年毕业,一切授课程序,必期毕业后可直接至欧洲各大学听讲,他时课业日进完全为大学之课程,然后改为复旦大学,亦未为迟也。若以近日社会一般好高之心理,急急易以名称,谓足以歆来学者之意思,则非本校所敢出此也。”<sup>①</sup>最后,教师代表汪汝舟真诚地勉励学生说:“革命未成,为学生者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又欲关心国事,故恒不能专一。革命既成,则专为造就建设人才,为学生者,亦得一心一志向业。”<sup>②</sup>

1912年9月,复旦公学正式迁入徐家汇李鸿章公祠内。8日下午,举行“开学礼”。遗憾的是,马相伯此时已远赴北京,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等职。复旦公学暂时由教务长胡敦复、庶务长叶藻庭负责。由于经费异常困难,校具设备简陋,管理工作差强人意,致使学生把矛头指向庶务长叶藻庭,并于是年底引发罢课风潮。

## 七、薪火相传与复旦大学崛起

“因旷课而时光虚度,存愤懑而学识难增。”<sup>③</sup> 复旦学

<sup>①②</sup> 《复旦公学始业式志盛》,原载《民立报》,1912年5月11日,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7页,第87—88页。

<sup>③</sup> 《复旦公学风潮记》,原载《时报》,1913年1月17日,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91页。



生的罢课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也促进学校管理者进一步反思复旦公学的办学成效及存在问题。1913年初,经讨论研究,学校行政一致认为:“复旦公学创办10年,成绩昭著”,去年年底小有风潮,以至校务涣散、学生罢课,实由于“董事会未经成立之故”。为此,学校正式成立董事会,推举孙中山、陈英士、于右任、王宠惠等为校董,并以王宠惠为董事会长。

鉴于马相伯已辞职并在北京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董事会决定聘请马相伯十分欣赏的复旦公学老教务长李登辉出任校长。从此,李登辉校长便以过人的毅力继承马相伯校长的优良办学传统,并能够结合时代需要不断创新,不仅使复旦公学得到继续发展<sup>①</sup>,而且实现了从复旦公学到复旦大学的转型,成为私立复旦大学首任校长(1917—1937年)。1920年冬至1922年春,李校长在江湾购买的70余亩土地陆续建成教学楼1座(名简公堂)、办公楼1座(名奕柱堂)、第一学生宿舍1座、教师宿舍1幢等,随即大学部便迁至江湾新址(中学部仍留徐家汇李公祠)。其后,复旦大学的发展便如虎添翼,渐入佳境,“1922年大学部学生第1学期为316人,1925年增为790人,1930年增至1215人,1935年更增至1550人”<sup>②</sup>。

有学者认为,复旦公学后来发展“越来越远离他(指马

<sup>①</sup> 据学者统计,“从1912年至1916年,共培养大学预科毕业生15人,中学毕业生150人”。《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63页。

<sup>②</sup> 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108页。



相伯——引者注)的理想”<sup>①</sup>。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尽然。李登辉所主持的复旦公学乃至后来的复旦大学,与马相伯担任校长期间的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固然有不同之处,马相伯充满法国人文主义气质,李登辉则具有更多的美国实利主义精神,但就接受近代科学文化洗礼的教徒身份而言,他们的办学精神仍有许多相近乃至相通之处。

从办学宗旨看,马相伯创建复旦公学时已将培养“译才”的宗旨转换成更加社会化的“有用之人才”;与之相应,李登辉1913年修订的《复旦公学章程》及1920年再次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指出,本校以“造就专科人才”为宗旨。<sup>②</sup>二者具体内涵虽然有程度上的区别,但都是以培养面向社会生活实践的经世致用人才为目的。当然,这种经世致用人才都是以新时代的民主独立意识为前提的。马相伯所极力反对封建主义“奴隶之学”,提倡民主主义“自主之学”,与李登辉主张培养学生的“独立”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李登辉反复强调,“独立”是“教育的一种主要目的”,指出:

我们要养成学生的独立,应明了独立不是一种单纯的德性,其中包含的心理分子很多。学生如要有独立的能力,他必须有一往直前的决心,吃苦耐劳的毅力,挨受谩骂的勇敢,百折不回的志气。<sup>③</sup>

<sup>①</sup> 陆永玲:《站在两个世界之间——马相伯的教育思想与实践》,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99页。

<sup>②</sup> 参阅《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93、118页。

<sup>③</sup> 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载《复旦周刊》第24期,1929年11月4日,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263页。



在他看来,“独立”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在学校里的独立,就是在社会里独立的基础。社会里的分子能够独立,才能成进步的社会;国家里的公民,能够独立,才能有进步的国家。凡是一种教师,能够引导学生为独立的思想、独立的劳动者,他真可称为造福于社会了”<sup>①</sup>。李登辉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的校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sup>②</sup>,显示了李登辉与马相伯办学旨趣的内在一致性。

从管理体制看,马相伯从震旦学院开始即实行院长领导下的民主自治制,行政组织精干而高效,学生可依“学生自治规程”参与学校部分管理工作。复旦公学继承这一传统,一部分震旦学院的老学生于右任、沈步洲等还直接参与复旦公学创办,公学下设校长1人,教务长1人,庶务长1人,监学2人,学科教师由校长聘任,另有董事会负责募款,但不干预学校行政。李登辉主持复旦公学以及复旦大学期间,更注重董事会建设,王宠惠、唐绍仪曾先后担任董事长,孙中山、于右任、邵力子、萨镇冰、陈嘉庚、余日章等均担任过董事,不仅董事会人数增加,功能也得到加强。由于学校规模不断发展,学校行政组织自然地得以扩充。不过,李登辉始终重视弘扬民主自治传统,奉行民主管理作风。1919年五四运动后,学校曾一度取消监学,由学生自治会负责。1920年重订《复旦大学章程》即设有“学校自治”条款,称:

<sup>①</sup> 李登辉:《我们所最需要的教育》,载《复旦周刊》第24期,1929年11月4日,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263页。

<sup>②</sup> 参阅《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111页。



本校为令学生遵守校规起见,特设法尽力鼓励自治,使全校学生共受其益。每级由学生中推一级长,每宿舍推一舍长,期于校中秩序、同学品行、宿舍整洁等事,得互相监察劝勉之益,每星期六开讨论会一次。又立学生评议部,由学生公推评议员若干人,随时就商庶务部,整理校务。<sup>①</sup>

1924年,学校设立行政管理机构——行政院(后改为“校务会议”)。该机构由校长、教务主任、各科系主任、中学部主任以及大学教授会、中学教员会代表组成,注意吸收广大教师参与学校重大决策。1927年,一度拟设立“师生联席会议”,共谋学校发展,后因政府干涉未能实行。李登辉民主治校的作风赢得了师生的尊敬和爱戴。他常说的一句话:“大家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sup>②</sup>充分体现他虚怀若谷的精神风貌,也表现出马相伯的民主治校遗风。

此外,在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乃至某些管理细则等方面,李登辉与马相伯的具体做法固然不可能完全相同,但在精神上是彼此相通的。

1912年夏,马相伯离开复旦公学,仍然非常关心复旦公学和复旦大学的发展。他曾以十分赞赏的口吻谈及李登辉:

我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把李登辉先生荐给

<sup>①</sup> 参阅《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134页。

<sup>②</sup> 余楠秋:《我所崇拜的李登辉博士》,转引自《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257页。



我，他本是华侨，在美国读书的。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来我辞了校长的职务，李先生便继任校长，一直到今，还是他在那儿维持。<sup>①</sup>

1935年12月，听说李登辉因学潮等原因准备辞职，马相伯特致信复旦大学学生：

日来诸君为国难而驰驱，餐风宿露，不遑宁处，余闻而大慰。唯李校长登辉因而辞职，余为彷徨不安。然李校长劝君不必往南京，实为真的名言。……唯国家柱石，端在人民，今日亡国现象，其根源在人民之懦弱。试看其他文明国家，有如此等情况否？请诸君深长想之。为诸君计，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sup>②</sup>

1939年4月6日，马相伯以百岁高龄勉励内迁的复旦大学全体学生，在任何艰难困苦条件下都务必养成“浩然正气，勿馁勿蹶。论今日吾校之校舍，或稍逊于沪上，以比昔年新闸路之三室则过之；吾校之经费，或稍逊于他校，以比昔年叶君辛苦募集之际，又远过之。惟宜拳拳于国家民族为己任责，砥砺得行，阐扬学艺，建殊勋于朝右，树师表于人

<sup>①</sup>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7页。

<sup>②</sup> 马相伯：《告复旦同学书》，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177页。



伦,则今日远入三峡之复旦,安见不复显于三吴耶!”<sup>①</sup> 其殷殷期望之情,溢于言表。

## 八、治校经验与管理创新

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马相伯在长期办学实践中形成独具特色的治校经验。现综述如下:

### (一) 无私纯爱 有教无类

作为天主教徒,马相伯以上帝为信仰,并怀抱“上帝之爱”平等爱人,爱生活中每一个人。有一次,他“赴苏州救护难民,染重疾,几不起”<sup>②</sup>,虽然险些送了性命,但并不以此为悔。作为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他则将学生奉为上帝,无论该学生来自何方,有何信仰,更不论其长幼贵贱,一律投以真挚无私的纯爱。声称:“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sup>③</sup>

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固然与时代推助及个人经历密不可分,与蔡元培等人的诚心拜师问学也有相当关系。当时,蔡元培还在南洋公学任职,执意跟马相伯学习西方各国的母言——拉丁文,并准时在每天早上5点钟敲门。马相伯有时候还没起床,便被从梦中叫醒。对此,马相伯并不介

① 马相伯:《民国二十八年复旦大学春节毕业同学训词》,原载《中央日报》,1939年4月6日,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179页。

② 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第2编97,第84页。

③ 《一日一谈》,“关于震旦与复旦种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10页。



意,反而为蔡元培的好学精神所感动,主动建议蔡元培选择一些优秀学生一起来学。故而有所谓“24个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佳话。起初,连徐家汇天主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话,但经过马相伯的精心教学,4个月之后,这些学生不仅能够写出来,而且能够说出来。笑话中国人学不好拉丁文的外国传教士不得不表示钦佩。由于办学初见成效,声名远播,致使全国各地有识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8个少壮的翰林,20几个孝廉公”<sup>①</sup>。显然,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最大限度地容纳了不同地区、不同派别的有志青年,学校规模也由之不断扩充。从创办之初的二三十人,1年多以后便增至百余人。

需要指出的是,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院属私立性质,其后建立的复旦公学虽称公立,得到一些公款资助,亦十分有限。因此,学校要求学生交纳一定数量的学费,以维持学校正常运转,亦属天经地义。如:《震旦学院章程》(1902年)要求普通科学生捐银100两,分两次交清。《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则规定,学生“每年学费,住宿者120元,膳费、梳栉洗衣费及床帐桌椅一切器用费在内。通学生仅在校午膳者,年70元”<sup>②</sup>。

尽管如此,马相伯并没有束缚其对学生的满腔热情和

<sup>①</sup> 《一曰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6页。

<sup>②</sup>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5页。



一片爱心。弟子于右任系陕西三原人,有感于清廷腐败政治,吟诗言志,作《半哭半笑楼诗草》,其中不乏对时政的讥讽。其咏古诗中有:“误国谁长窃窈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sup>①</sup>另一首诗《辘中狗》写道:“辘中黎尔当何用?分噬吾民脂与膏。愧死书生无勇甚,空言侠骨爱卢骚(今译卢梭——引者注)。”<sup>②</sup>更隐藏着暴力革命之寓意。由是触怒清廷,通缉告示,四处追捕。马相伯从报上得知,则视之为进步青年,不顾个人得失安危而招其入学,不仅“免其学费”,且谓之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做东道主矣。”<sup>③</sup>马相伯对学生的爱实际上已融入整个近代中国民族解放事业的洪流中,是弥足珍贵的。

## (二) 民主作风 自治精神

与有教无类办学方针相呼应,马相伯在学校行政改革方面进行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其中,民主办学作风和学生自治颇引人注目。

马相伯深知,办好一所大学的关键在于优秀的教师队伍和精干的管理人才。然而困难的是,震旦学院创办之初,既无校舍师资,更乏管理人才。对于前者,马相伯凭借其徐家汇天主教会的深厚关系以及不久前的巨额私产捐献,借到徐家汇天文台余屋为院舍,并聘请若干外籍教士为教

① 转引自许有成等著:《于右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

② 转引自许有成等著:《于右任传》,第35~36页。

③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6页。



授。至于后者,他不能不另谋良策。经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马相伯决定汲取中国书院简约化管理精神,自任监院(即院长)及导师,同时借鉴西方大学自治传统,实行“学生自治”。弟子陈传德回忆道,当时先生自任监院,“院内各项事物,在先生监督下,悉归学生管理”;除总干事和会计干事为固定职务外,“其余干事,于学期开始,由学生互推分别担任,其职务至学期之终为止,执掌权限,悉遵学生自治规程”<sup>①</sup>。马相伯除总揽学校教务外,常兀坐讲堂亲自授课,并乐于与学生同吃同住,日夜滚打在一起。而学生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里如鱼得水,自由民主意识空前高涨,进步革命精神潜滋暗长。面对震旦学子们的勃勃生机,徐家汇天主教会十分恐惧,他们生怕学院背离法国教士的根本利益,要求增加法语课程,并企图改变管理模式和办学宗旨。然而,已经觉醒的中国学生决不愿意再蹈专制教育之辙,终因“学费缴纳”管理权限冲突,导致几乎全校学生(仅缺2名)罢课退学,宣布另立复旦公学。

作为反专制斗争的杰出成果,复旦公学从创立之初即高举震旦公学民主自治传统,并努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一方面,马相伯极力邀集当代名师硕儒共谋复旦盛事。组织严复、熊希龄、萨镇冰、张謇等28人阵容强大的校董会,除得到两江总督周玉山的鼎力支持外,更公开向社会募捐兴学;同时延请留美归来的李登辉出任教务长,并聘

<sup>①</sup> 陈传德:《马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32~233页。



用张汝楫先生昆季暨王培元先生等多人分任教席。一时间人才济济,勃然复兴。另一方面,马相伯坚持让学生参与各种形式的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特别是公学草创之际,百废待兴,于右任、邹仲裕等弟子日夜操劳,功不可没。对此,马相伯深有感触。他说:

当受事之际,予年既 66 矣。赞其成者,刘君学裕(即今监察院长于右任,时以革命避清吏,权易姓名)、邹君仲裕、项君微骧若干人。仲裕慷慨奋发,在斯时为本校筹 2 万元,资以开创,其功绩有不可忘者。<sup>①</sup>

新学甫成,马相伯又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学校食堂等管理,设立“校内民主法庭”以解决同学间的纠纷,殷切期待学生能够历练自治精神,养成民主健全人格。

### (三) 正业居学 乐而有仪

人才的成长不仅与学校行政体制有关,更与课程教学及课外活动密切相关。制定包括课程教学在内的学校日常规范,做到有张有弛,乐且有仪,是校长的神圣职责。

作为 20 世纪初年的开明校长,马相伯固然注重民主自由精神,但自由不等于放任。在他看来,学校的基本规范建设乃是该学校能否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1902 年,他手订《震旦学院章程》虽然整体上比较简略,对课程教学则有较

<sup>①</sup> 马相伯:《民国二十八年复旦大学春节毕业同学训词》,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 178 页。



详细的规定。主张依据西方大学理念,将课程分为文学(Literature)和质学(日本名之曰科学, Science)。其中,文学实指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正课(古文、今文和哲学)和附课(历史、舆地和政治);而质学则主要指自然科学,亦包括正课(物理学、化学、象数学)和附课(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卫生学、簿记学、图绘、乐歌、体操)。这一超越传统的近代课程分类,我们今天不一定会完全赞同,但其中所体现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结构互补精神,对当代大学课程教学改革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与《震旦学院章程》相比,马相伯于1905年手订《复旦公学章程》则更为周详细密。整个章程共分19章:

- 第一章 纲领及宗旨
- 第二章 分斋及学级
- 第三章 学科程度
- 第四章 学期、休假
- 第五章 入学程度
- 第六章 保证书及保证人
- 第七章 学额、入学应交费
- 第八章 考试、升班及毕业
- 第九章 告假
- 第十章 惩戒、退学、除名
- 第十一章 课堂规则
- 第十二章 自修室规则
- 第十三章 宿舍规则
- 第十四章 膳厅规则



## 第十五章 体操场规则

## 第十六章 演说规则

## 第十七章 游息规则

## 第十八章 杂诫

## 第十九章 余则

从这些章程细目中,不难体会马相伯对学校日常规范的高度重视。就课堂正业而言,章程不仅规定分斋课程,厘定学科程度,而且详细列举包括“上下课堂鸣钟为号,先教员入,后教员出,须有秩序”;“教员就座离座,均起立表敬意”<sup>①</sup>。关于课外活动,马相伯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周末演说会及正常的文体游戏。<sup>②</sup>至于因病请假须校医允单,每晨6时鸣铃即起等生活规范,都做出具体规定,兹不一一细述。

与严格的学校日常规范相耦合,马相伯在生活中则是一个风趣幽默、和蔼可亲的智慧长者。弟子赵云浦说:“先生与诸同学,课余有时促膝深谈,有时随肩且步且言,是所谓循循善诱者欤。”<sup>③</sup>上课期间,则不容许学生有丝毫懈怠。有一次,马相伯请人教学生击剑,“间有一同学汗沉露背少休,先生遂振铃集诸生,厉声训曰:诸生之亲学也,皆抱宏志而来,为学成救国,或为马志尼,或为俾斯麦,今如此苟且颓惰,岂有若是茸之马志尼、俾斯麦乎!聆者都为汗颜”<sup>④</sup>。

①② 马相伯:《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7页,第60页。

③④ 赵云浦:《马相伯师百龄寿言》,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84页,第84页。



抗日战争期间,马相伯更以百岁高龄勉励复旦学子“宜拳拳于国家民族为己责,砥砺德行,阐扬学艺,建殊勋于朝右,树师表于人伦”;并引《诗经·菁菁者莪》中的“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表达其殷切期望之情。<sup>①</sup>

#### (四) 兼容并包 自主研讨

谈到“兼容并包”,很容易想到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思想。其实,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都充分体现这一思想的学术旨趣。

一方面,马相伯对西方大学体制赞赏和认可。他公开表示其所办学校“实具有西欧 Akademin 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公学’”<sup>②</sup>;并在《震旦学院章程》中明确指出:“课程遵泰西国学功令。”<sup>③</sup>其后,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进而把“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列入办学宗旨,置西文(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及西方各国语言文字)以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声称:“世界竞争日亟,求自存必以知彼为先,知彼者必通其语言文字。”<sup>④</sup>否则,其新知日进,我尚懵然如故,“劣败之忧,甚为可惧”<sup>⑤</sup>。

① 马相伯:《民国二十八年复旦大学春节毕业同学训词》,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178~179页。

②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7页。

③ 马相伯:《震旦学院章程》(1902年订),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1页。

④⑤ 马相伯:《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0页,第51页。



另一方面,马相伯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特别是书院办学管理思想的吸收和借鉴。他在《复旦公学章程》中赫然告示:

凡投考者,以中西文俱优,为最合格。……惟中文差者,须自任于毕业限内,能加意补习为合格。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摒弃。<sup>①</sup>

1911年12月4~6日,马相伯与胡敦复在《民立报》为复旦学院所做的广告中写道:“同人等拟仿鹿洞、白鹅之遗轨,推而广之,为哲理、文学、政法、象数、理化各科大学,旁及制造、驾驶等门。惟兹事体大,端赖先达扶翼,同志应求。”<sup>②</sup>马相伯不仅向往中国书院的自由讲学精神,而且对书院远离城市独居名山胜水的院址选择也情有独钟。复旦公学最初选择吴淞,即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心理。

事实上,马相伯的“兼容并包”不只是停留在中西方学校管理思想的兼收并蓄上,更体现为对学生、对同胞的真诚爱护,其实质乃是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对此,弟子邵力子深有体会地说:“先生对同胞,不以思想,不以地位,不以阶级而别,在救国大前提下,对四万万五千万同胞是一例的,这与先生的‘有容’精神有关,这与先生的学问有关。先生精神学问的最高目标在救国。”<sup>③</sup>

<sup>①</sup> 马相伯:《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3页。

<sup>②</sup> 《复旦学院》(广告),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85页。

<sup>③</sup> 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95页。



也正是从为学救国的高度,马相伯极力提倡自主研讨的真学问,反对失去自我的奴隶之学,猛烈批评中国传统教育的负面影响。他说:

学问之道,有人己之别也。我国自秦汉以降,皆为人之学也。曰策论则策论矣,曰诗赋则诗赋矣,曰经义则经义矣,降而至于八股则八股矣。我不解奴隶性质之何以若是之深入而难移也。<sup>①</sup>

与之相反,马相伯强调做学问乃思想上的独立自主和学术上的自由研究。他说:“今兹所讲,为格物穷理之学,求之一己,而无与人者也。故开宗明义,力求自主,夫自主与自由异。自由者,今日欲左则左之,明日欲右则右之。而自主则不然,有坚忍不拔之气,强立不返之志,且而矢之,则万变不离。所谓三军之帅可夺,而匹夫之志难移,此鄙人所欲与诸君子共勉者也。”<sup>②</sup>

以震旦学院为例,其学制仅限2年,对学院章程所列课程,马相伯并不主张做过细的讲授,而是着眼于治学门径的指导和开悟。正如弟子于右任所说,当时“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的自由研究之风”<sup>③</sup>。

### (五) 博学雄辩 求真务活

马相伯从小好学深思,博览群书,且善于观察生活,体

<sup>①②</sup> 《震旦学院开学记》引马相伯语,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40页,第41页。

<sup>③</sup>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6页。



悟人生,故其言谈辩说,每每语惊四座,有“中国第一大演说家”之誉。这一个性魅力为学校管理和学风建设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依西方教育家亚里士多德之见,人乃政治动物;而有效的政治参与,不能不以博学雄辩的才能为基础。这是西方古希腊罗马以来的重要教育传统之一,也是教育家昆体良热衷于《雄辩术原理》,并把“精于雄辩的人”视为教育根本目标的缘由。从深层原因分析,西方教育家重视演说才能,乃是其源远流长的民主政治体制所决定。与之相反,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教育虽然也是以入世参政为目的,但专制主义政治需要的是臣民恭听圣旨,而不是过多地发出声音。然而,进入近代以后,特别是维新政治改革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民治之声从无到有,自治之音此起彼伏,老百姓的发言欲望越来越强烈,干政议政意识亦日益浓厚。

有鉴于中国专制统治向民主政治的急剧转型,马相伯颇能把握住社会转型期的时代精神,及时将演说术教育纳入学校的整体管理战略,并利用星期天休息日予以贯彻执行。在震旦学院时,马相伯就经常在学院八角厅演说。弟子高平子回忆说:

马师常在八角厅中演讲哲学之类的问题。马师设座中坐,诸生环之听讲。师出生丹徒,故语带镇江口音。我初离乡,不习他乡语,故颇不易听懂。然听其抑扬顿挫之节,观其从容顾盼之姿,不期神往。其后每逢马师公开演说,得参末座,常觉



其析理、辩证、取譬、解嘲、举手、瞻视、疾徐、俯仰，或引经史，或涉俗谚，莫不自然中节。近人常推胡适之先生演说第一，然胡先生以纵横论，而马师以自然胜。以书法为喻，则胡先生可比苏黄，而马先生则几乎羲之也。<sup>①</sup>

至创办复旦公学时，马相伯更是乐此不疲。他说：

当我创办复旦公学时，我曾立下规则：凡星期日上午，学生均不准外出，由我拣定许多演说题目，轮流命诸生练习演说，并把演说必需的方法，如分段，如开始怎样能抓住听众，结论怎样能使人对他的演说获得具体的了解，一班学生都很感兴趣。<sup>②</sup>

事实上，马相伯不仅在学校里讲述演说术原理，在社会公共场所也乐于登台演说，庄谐杂出，感人至深。有一次，马相伯应两江总督邀请，在南京大操场演说两个多小时，“演辞通俗而又系统，把世界民主和君主国家的政治弊病及立宪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听众没有一个不满意，无异上了一堂宪法课”<sup>③</sup>。另有一次，马相伯应邀在上海张园安凯

① 高平子：《马相伯先生印象片断》，见彭裕文、许有成主编：《台湾复旦校友忆母亲》，第9~10页。

② 《一日一谈》，“中国人的演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1页。

③ 韩景琦：《记马相伯先生两三事》，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41~142页。



第举行的中美法联欢会上,与伍廷芳一起“分别用法语和英语即席发表演说,也是议论风生,言惊四座”<sup>①</sup>。

在马相伯的言传身教下,震旦学院和复旦公学学生的演说才能十分突出,这对于提高其社会政治参与度产生直接影响。对此,弟子于右任颇多感触,他说:“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震旦一特点也。”<sup>②</sup>

马相伯的演说感人肺腑,固然由于其厚实的生活经历和博大的知识基础,更重要的是为人率真和学问通活。他一生最反对欺饰说谎、没有主见的伪君子,而伪君子之泛滥成灾则与孔教束缚密不可分。他说:

中国社会上受了孔子形式主义的毒太深了,结果必然要随时随地去说说,在朝廷则欺罔君上,在闾阎则欺罔小民,在家庭则父子相欺,夫妻相欺,不说谎便不能过日子。<sup>③</sup>

马相伯进一步指出,孔子在封建专制时代乃定于一尊,神圣不可侵犯;而他终日宣扬的“正名定分”,实际上“都只是替

<sup>①</sup> 韩景琦:《记马相伯先生两三事》,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42页。

<sup>②</sup>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7页。

<sup>③</sup> 《一日一谈》,“说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2页。



治人者设下愚民欺众的弥天大谎”<sup>①</sup>。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便不能不以说谎过日子。

马相伯强调做人应诚实率真，顶天立地；读书做学问则要独立自主，强调“要活读才免做蠢虫”<sup>②</sup>。在他看来，一个成功的演说既是才能的外在表现，更是人品的自然流露，是人品与才能的高度融合。他说：“演说只是人类在社会中发表自己的意思的一种工具，演说最好的人不见得就是好人；而真正有非常之才与德的人，其演说必有可观。所谓‘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必有德。’”<sup>③</sup>

#### (六) 身心并重 和谐发展

与儒家“德上艺下”的畸形教育传统不同，马相伯十分重视受教育者的身心和谐发展。在他看来，通过儒家严格经学教育而导致的最终结果，常常是人格分裂或片面的病态发展。他说：“我不解中国奴隶之学，何以若是之盛哉。故无论落第之士，牢骚抑郁，或掩涕一室，长嘘空山，做种种丑态之可笑可怜也。即彼大魁天下，置身通显，峨冠博带，焜耀耳目者，试叩其所学，即抑复嗤鼻。”<sup>④</sup> 与传统的奴隶

① 《一日一谈》，“孔教所给与社会的影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1页。

② 韩景琦：《记马相伯先生两事》，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四），第141页。

③ 马相伯：《一日一谈》，“中国人的演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1页。

④ 《震旦学院开学记》引马相伯语，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40~41页。



之学不同,马相伯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新教育应该努力追求意气奋发、身心和谐发展的健全人格。

由于儒家长期偏重德育,弱化智育,消灭体育,致使维新教育改革家严复一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西方三育论倡行海内,风行学林。在健身强体问题上,马相伯与严复颇相契合,主张在学校全面推行兵式体操,从而构成震旦学院又一个管理特色。弟子于右任写道:“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行打靶,形式整齐。是有以此媒孽先生于当道,当道与先生有旧交,勿置议,然而先生之用心,则深远矣。”<sup>①</sup>

继震旦学院之后,马相伯在复旦公学更加留心学生的身心和谐发展。《复旦公学章程》专门列有“体操场规则”,明确规定:“每日体操,皆由教员统记分数,不得无端旷操”,“患病得免操,必缴验校医凭单于本队人(猝病由舍长验明报告)”<sup>②</sup>。平日里,马相伯十分重视学生的课业学习,勉励学生努力刻苦,但这种刻苦应以不影响身心健康成长为度。他在《复旦公学章程》中特意提醒学生:“我国学子,往往多攻苦而不知卫生。以后,膳毕即伏案,乃深夜勤读习,各宜互戒,务剂其平。”<sup>③</sup>

正是在这些日常学习生活的细微处,不难体会马相伯对学生人格健全发展的全面关爱。诚如于右任所言:“先生

<sup>①</sup>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7页。

<sup>②③</sup> 马相伯:《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页,第61页。



以 70 之年，勤劬密勿，为国家储才养士，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以自开教育独立之风气。故其人格之感化，深入人心，至震旦学院散而诸生仍相弗去。”<sup>①</sup> 马相伯之所以受到学生如此爱戴，在很大程度上因为不是简单地以外在的规章管理学生，更以其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学生同甘苦、共患难。

---

<sup>①</sup>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第 57 页。



第  
五  
章

近代大学精神的不懈追求(下)

1912年9月8日,新迁入徐家汇李鸿章公祠的复旦公学举行“开学礼”时,马相伯已远赴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等职。尽管已是73岁高龄,马相伯仍然十分关心社会政治与教育改革,始终没有放弃对理想大学的不懈追求。他先是短期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辞职后一度醉心于建立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还积极参与发起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创建。虽然马相伯的种种努力并非都能如愿以偿,但他对近代中国大学精神的探索确实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智慧启迪,直接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一、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 与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

马相伯何以要离开正在办理的上海复旦公学而远赴北京？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的邀请，也有大总统袁世凯的旧谊。当然，更重要的是，马相伯以国家社稷为重，想去亲身感受新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并力所能及地尽一些“排难解纷”的国民义务。他在一封家书中写道：“月前京电延余到京备顾问，为社会计，劝余去者众，并劝冒暑速往，容可排难解纷也，但余精力恐不济也。”<sup>①</sup>马相伯虽感到精力不济，最终还是北上赴任。

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是从原京师大学堂脱胎而来，1912年5月改称现名。严复为原京师大学堂监督及改名后的首任校长。在学术上，严复早就因引进赫胥黎的《天演论》，特别是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国人所赞誉。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严复特请蔡元培来校演说新的教育理念，蔡元培特别指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sup>②</sup>严复在任期间，对学科教学和行政管理进行了必要的改良。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严重的经济困难，不仅教员的薪金难以兑现，必要的办公经费常无从落实。严复只

① 《家书选辑》，18，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13页。

② 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48页。



好向银行借债度日。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拟议解散北京大学。消息传来,全校哗然。后经严复力争,方才留住。1912年10月,严复辞职离校。

1912年10月,教育部任命章士钊担任北大校长,章士钊借故未到任,特决定暂由马相伯代理。马相伯上任后,面对北大经济困难也无计可施,拟“向比国银行商借款40万法郎,约定以学校地产作抵押”。学生们听到这一消息,马上以“盗卖校产”罪名,迫使马相伯辞职。<sup>①</sup>1912年12月27日,马相伯辞职。

辞职之后,马相伯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并兼任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议员、平政院平政等职。起初,马相伯对袁世凯还存有一念之望,希望其能够恪守民主共和精神,践履主权在民的自由平等意识,但很快发现,袁世凯的心事并不在民主共和,而是军人专政。在一封家书中,马相伯写道:

明日约法开成立会,会所即在前参议院。政费待借款,停支已2月矣!惟兵费则万不可停,故精神全注于此。惜乎流大于源,一日节流,而时势颇不易节,奈何!此军人政治所以(下残)……<sup>②</sup>

在另一封家书中,马相伯无奈地慨叹:“名曰共和,不共不和,如何是好?”<sup>③</sup>

<sup>①</sup> 萧超然等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sup>②</sup> 《家书选辑》,54,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26页。

<sup>③</sup> 《家书选辑》,35,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19页。



为了加紧复辟帝制,袁世凯及部分政府官员常劝诫百姓要“顾全大局”。马相伯揭露说:

(他们)每每以“顾全大局”或“大局”“火局”昭告于人,若似乎他们自己都是公忠体国,或民胞物与的心胸,实则一察其行为,无不和他们所言的相反。曾记得袁世凯也是常常对人说“大局”的,有一个人故做不知地问他:“大橘(局与橘音同)究竟有多大?”袁氏瞠目不能对。这位先生徐徐地自问自答,并且用双手合拢做碗口大的圆形以为譬道:“我想,‘大橘’有这么大!”袁氏很诧异道:“你怎样知道?”某氏说道:“他们的眼中只有金钱,胸中只有饭碗,吾是以一般人之所谓‘大局’,其范围绝不能超过饭碗,故云!”袁氏听了,嗒然若丧!呜呼,今之所谓“大局”即若而人者饭碗之世界也!①

其实,袁世凯所说的“大局”,归根到底就是要复辟帝制秩序。有一次,为了探听马相伯的态度,袁世凯故作委屈地说:“人民不知敬事长上,国家何以安?天下何以治?”马相伯不无讽刺地漫应道:“君所指者,殆即磕头请安之谓乎?果尔,便足以安邦定国平治天下,则予愿自今以往,朝叩一头,暮参一拜,日日勿懈,为天下倡!”②

马相伯出使朝鲜担任国王顾问时,就对袁世凯的小人

① 《一日一谈》,“谈屑·大局”,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0页。

② 《一日一谈》,“谈屑·磕头请安”,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5页。



之心有所洞察,但没想到他做了大总统还想做皇帝,“其头脑终不出封建帝王思想,其视民国也本如无物,故对于总统丝毫不感兴趣”<sup>①</sup>。袁世凯身边的一些鸡鸣狗盗之徒,也都急于要借袁皇帝而“攀龙附凤”、“封妻荫子”。不久,袁世凯即命长子袁克定征询意见。马相伯正告曰:

项城果称帝,国民对之是否帖然,姑且不问;  
外交方面,必有强邻藉此百端要挟,以遂其大欲  
者。<sup>②</sup>

果不其然,日本表示赞同,暗地却“觑破袁氏心肝,乘虚而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21条”要求。而袁世凯既然想做皇帝,就必然要“结欢强邻,以为镇压国民反抗的奥援,其不能不惟日本之命是从,势也”<sup>③</sup>。

马相伯虽然身居虎口,但他确实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有所遏制。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期间,他多次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全力以赴,甚至带病工作。有一则家书这样写道:“余本拟阴历年前回沪,无如恃血懒动;且宪法起草在即,南而复北,不胜奔驰,故只得国会开后再南矣。”<sup>④</sup>

但遗憾的是,马相伯的金玉良言和忘我工作均无法改变时局逆转。因此,他只能有意地回避一些诸如“筹安会”之类的政治活动,而更多地关注其酝酿已久的中国最高学

<sup>①②③</sup> 《一曰一谈》,“袁世凯之为人”,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76页,第1076页,第1076页。

<sup>④</sup> 《家书选辑》,19,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13-614页。



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

## 二、构建理想中的中国科学院——函夏考文苑

所谓“考文苑”，乃马相伯对“Academie”（阿伽代米）的翻译。马相伯解释说，“Academie”本是古希腊园主之名，“以希腊致知家柏拉图（Platon）等，尝就其苑讲致知学故耳。致知学者，致极其知，以推穷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也。由是足以包罗一切，牟卢一切。凡学问有原理之纲宗，横言之科则，由科则而科条，咸有一贯之统系者，始得名为科学。其研求之所与人，始得名为阿伽代米”<sup>①</sup>。这一最早由柏拉图藉以讲授致知学（即哲学）的阿伽代米，后来遂演变成一个国家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马相伯所用“考文”，出自儒家经典《中庸》“非天子，不议论，不制度，不考文”；强调只有贵为天子才能考论的文章典籍，可引申为高深的学术著作。故特以“考文苑”对译“Academie”。函夏，典出《汉书·杨雄传》：“以函夏大汉兮。”比喻大汉帝国疆域之广袤，足以包容诸夏，特指称全中国。另据方豪考证，“函夏”出自《晋书》卷31《左贵嫔传》，指整个华夏，有全国的意义。<sup>②</sup> 因此，“函夏考文苑”即指中国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

马相伯所设计的“函夏考文苑”，以法国阿伽代米

<sup>①</sup> 《函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4页。

<sup>②</sup> 方豪：《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见《方豪六十自订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998页。



(l'Academie Francaise)为参照对象。他介绍说:

法王路易十四时,文学与文化方兴。二三名士虑其清杂也,乃因名设此考文苑,志在正字画,正名词。名词不雅驯者革除之,关于新学者楷定之,古书之难释者(时方原本辣丁文创造国文,正之以免各原其原,各造其造。如考卷耳一物,虽数万言仍不能定,何如就地考证,姑定一物)择善以注之,讹误者校正之。为发刊通行字典,以统一言文,而岁岁有所增补焉。<sup>①</sup>

由于研究工作出色,“法文之得裨继拉丁,而风行欧土者,斯苑之功为最”<sup>②</sup>。与一般学术机构不同,该苑“上不属于政府,下不属于地方,岿然独立,惟以文教为己任”<sup>③</sup>。苑士定额40名,非病故不补缺,“缺出时,则由阖苑自行投票,遍求通国中著作之林,文与学清洁纯正,名与实大段无间者,而公举之”;其身价之高,无与伦比。其后,又附之以科学苑(兼数理化3科)、金石词翰苑、政学道学苑、美术苑,“凡4苑,各有定额,而主体则共拥考文苑”<sup>④</sup>。因此,法国考文苑也可以说是一个以文学为主体、多学科协同发展的高级学术研究机构。

马相伯进一步介绍说:“致知学为一切理义学(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引者注)之根源,度数学为一切形质学

<sup>①</sup>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4页。

<sup>②③④</sup> 《两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4页,第124页,第125页。



(相当于自然科学——引者注)之根源,故首重哲学,次算学。而一切耳目二官之美术,关于民智文明者,皆附有专家。”<sup>①</sup> 为了推动高层次学术研究以及社会道德文化进步,法国考文苑建立一套颇具特色的学术研究及道德风化奖励基金。马相伯说:

考文苑嗣因输助基本金者日盛,故得用为奖励金者颇巨。其奖文学也,岁无问世之作,不加考察,果雅驯有法度,可增民智而无亏风化,则不独以褒予为华衮,品题代加冕而已。凡所著(疑为著)已成者,又准其功,颁苑金以犒之。未成与未著(疑为著)者,若关民智与时局,所应研求,则悬巨金以待之。虽国外之史乘、民族、政教、文学、风俗、物产、陶冶、渔畝、畜牧、蜂蚕、商工、农虞、财用生计之方,无一遗焉。虽华人所译,不为其文,而为其有补于辘轩也,亦往往犒奖之。惟然,故不惟文学是重,其宏奖有德,抚恤始终忠信者甚厚。如累世忠仆,忘己身辅主家之类,有关社会之观感,人道之扩充者至深且切,故赠予之也,不厌其优。<sup>②</sup>

不难看出,法国阿伽代米的宗旨、办法与体制自成系统。马相伯说,他国虽有类似学术研究机构,但“俱不如法国之矜严周备”<sup>③</sup>。

<sup>①③</sup>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4页,第135页。

<sup>②</sup> 《函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5页。



返视中国,马相伯则对民国初年的学术与道德现状表现出极大的不满。他说:

今言庞行僻,公私道德,吐弃无遗,家国治权,消亡殆尽,至欲均贫富,公妻孥,而公之均之,意在唯我。凡欧美巷议,穷滥野心,无不登高以呼,教猱升术,猛兽洪水,杨墨盛行(盖为我之至,将肆情纵欲为自由;兼爱之至,将废兵废刑为政体),不驯至国华无以保存,邦族无以保聚不止。<sup>①</sup>

为了保存国华,振兴邦族,提升国人的学术文化素养和社会道德水平,马相伯强调效法法国考文苑而提倡一种新学风。这一新学风,依马相伯之见,就是包括学术研究和道德风化两个领域相关方面的重建。

关于学术研究领域,可分为“作新旧学”和“厘正新词”两个方面。

所谓“作新旧学”,就是对以文学、道学为主要内容、以经、史、子为基本范围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创新性学术研究,既要“变其奥涩”,以“便于今学”,又须“使有统系”,且“近于科学”。以文学为例,要求通过正字、断句等基础性工作,使之“便于今学”;同时,要求从文法和文体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分类研究,文法大要在起、承、收三段论,文体则重在“言事言理”,其目的都是为了梳理传统文学发展脉络,以期“近于科学”。同理,道学研究,也应该在“疏通其义”的基础

<sup>①</sup> 《函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5页。



上,并依据现代学术标准开展“离经分类”和“依类合经”两方面的工作。具体而言,

一谓类别关于德性者,问学者,及社会政治暨农与工者,自为篇段,不按原经也。二谓就所类别者而综合之,譬之同一事理,而比兴可万不同焉,然于事理无与也,类而言之,但可为文学之助。至事理之为劝为戒,必有可劝可戒之所以然,能各依类而推穷之,斯有统系矣。<sup>①</sup>

事实上,马相伯这一“作新旧学”,可视做后来胡适倡导以科学态度去“整理国故”之先声。胡适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sup>②</sup> 马相伯与胡适各自所主张整理国故的具体方法并非完全一样,但有极其相近乃至相同的研究旨趣。马相伯声称,必须“使有统系”,且“近于科学”;胡适则主张,“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二者何其相似乃尔!同时,“作新旧学”说充分反映了马相伯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正确态度。他后来进一步阐述道:“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

<sup>①</sup> 《两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7页。

<sup>②</sup>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葛懋春等编辑:《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32页。



扬它!……如果一律都要数典忘祖,老夫认为很可痛哭!”<sup>①</sup>

所谓“厘正新词”,即指对外来文化思想学术概念进行理性的审订与规范。这是因为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外来文化思想蜂拥而至,学术新词层出不穷。对于这些学术新词,国人既有自译,也有相当部分是从日本转译。如:西文“Philosophy”,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译为“哲学”<sup>②</sup>;有些国人则译为“智学”<sup>③</sup>;马相伯则主张译为“致知”<sup>④</sup>。又如:西文“Education”,日本人译为“教育”,确实“创造了汉语‘教育’的近现代用法”<sup>⑤</sup>。如何更好地使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相融共进,无疑是转型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马相伯说:

新词有关于哲学、数理、政治、理论、星躔、地埶、矿石、动植、重力、机械等,有旧有者,旧译者。其旧译者,以晋唐所译梵书为最古;次则明季与清初;又次则日本维新之始译者,汉文尚审正不讹。其后译者,未免杂以和文矣。<sup>⑥</sup>

①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6页。

② 实藤惠秀著,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第283页。

③ 转引自实藤惠秀著,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285页。

④ 《致知浅说·小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36页。

⑤ 黄向阳:《“教育”一词的由来、用法和含义》,见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5页。

⑥ 《函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7页。



由于译词不一,人言人殊,必然影响人们对外来文化思想学术的正确理解,而阻碍该学术的理论发展及其中国化推进。为此,马相伯特建议延请海内专家“校订旧译”,同时“编纂新译”<sup>①</sup>。

关于道德风化问题,也可以分为“奖励著作”和“奖诱凡民”两个方面。“奖励著作”,旨在“有补风化民智”;“奖诱凡民”,则是指奖励凡民中之有道义而艰贞者,以利于人民文化道德素养的提升。

所谓“奖励著作”,其一,指关涉“风化”,主要指与时俱进的新道德建设。马相伯建议,私德“应不自欺,不惮改下手。事事须本良知,有宗旨,心口交诚,不妄动,不虚生,光阴是宝,财色非宝”。而公德则“应从报恩始。孝之为义,报恩也;忠于社会,亦报恩也。不损人,不害人,权利不侵,义务必尽”。在他看来,道德建设不能拘于一隅,而应该胸怀世界,博通古今。他说,“古道德即国魂也”,强调通过弘扬民族传统优秀道德以纠正时弊,力求做到“收放心”、“化野心”的作用。<sup>②</sup>与此同时,马相伯认为,对于外来优秀道德文化也不宜忽视,声称:“凡中外史乘所载,关于前项事实,有步武可绳者,及比喻之足为当前指导者,或编或撰皆可。”<sup>③</sup>其二,指关涉民智,主要指与民主共和精神相适的人民自治自养能力之建设。马相伯说:“凡关于借物以自养

<sup>①③</sup> 《函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7页,第128页。

<sup>②</sup> 《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9页。



者”，“凡关于通国之自治者”，“凡关于人之常识者”，皆须予以深入研究。强调对于“著作已成者”，要“准功以犒之”；对于“在所应研者”，则须“悬金以待之”。<sup>①</sup>

所谓“奖诱凡民”，马相伯说：“凡民者，侧陋之齐民也，居通国十之九。”这些占全国90%的凡民与士大夫不是处于同一“位望”，士大夫奇行“不足以动之”。他断言，要真正实现民主共和，“欲养成美社会，非奉凡民为矜式，则奏效迟且难”。职是之故，马相伯强调，“凡民有道义者”及“道义之艰贞者”，都应予以特别奖诱。具体而言，“道义云者，必权利于让之无过者，加让也；必义务于应尽之外者，加尽也”；“艰贞者，必困衡空乏之备尝也，必历久弥坚而不渝也”。<sup>②</sup>显然，马相伯“奖诱凡民”之举，为了提倡和弘扬新的道德风尚。

为了实现如上宏大的学术文化与道德建设理想，马相伯主张，将本苑设在首府北京。设想“苑宇须大，以便附设他苑”；“苑中须有藏书楼”；“苑中制度，悉仿法国，人员定额亦40名，由发起人推举三之一，余由三之一，通信公举”。<sup>③</sup>作为发起人，马相伯参与草拟和厘定如下“苑士名单”：

### 考文苑名单

马良(湘伯)	章炳麟(太炎)	严复(几道)	梁启超(卓如)
沈家本(子敢)	(法)	杨守敬(惺吾)	(金石地理)

①②③ 《函复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8页，第128页，第128页。



王闿运(壬秋)	(文辞)	黄侃(季刚)	(小学文辞)
钱夏(季中)	(小学)	刘师培(申叔)	(群经)
陈汉章(倬云)	(群经史)	陈庆年(善余)	(礼)
华蘅芳(若汀)	(算)	屠奇(敬山)	(史)
孙毓筠(少侯)	(佛)	王露(心葵)	(音乐)
陈三立(伯严)	(文辞)	李瑞清(梅庵)	(美术)
沈曾植(子培)	(目录)		

(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对于壬秋亦不取其经说。)

方豪先生指出,“马先生删去了3人”的事实,说明“至少这一名单不是马先生一人的意见”<sup>①</sup>。从如上名单可以看出,诸苑士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显然偏重于人文社会科学,但毕竟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部类。虽然自然科学家仅华蘅芳1名,但尚不能妄断未列名的苑士名单的学科分布情况,或许马相伯认为自然科学家的苑士名单主要应由“通信公举”。

从马相伯在《函夏考文苑议》谈到“厘正新词”所涉及的学科,当包括“哲学、数理、政治、理化、星躔、地埴、矿石、动植、重力、机械”等,内中自然科学不在少数。方豪先生曾饶有兴趣地将马相伯“厘正新词”的工作设想还原成类似台湾中央研究院国立编译馆下的诸研究部门<sup>②</sup>,包括:

<sup>①②</sup> 方豪:《马相伯先生筹设函夏考文苑始末》,见《方豪六十自订稿》下册,第2002页,第1997页。



- 哲学研究所
- 数学研究所
- 物理学研究所
- 艺术研究所
- 考古学研究所
- 动物学研究所
- 植物学研究所
- 中国大字典与专门字典编纂所
- 名词统一委员会
- 古物保管委员会
- 古籍刊行委员会
- 中国语文改进委员会
- 奖恤委员会

概言之,马相伯所设计的函夏考文苑可谓高瞻远瞩,内藏十分深刻的学术文化精神和民族历史使命。当梁启超得知马相伯的精心构想并将他列为苑上时,他说:“考文苑系神州宏举,震烁古今,匡翊之责,谊不敢让。”<sup>①</sup>当马相伯将此设想付诸行动时,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惑和阻力。

马相伯理想中的函夏考文苑应具有“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的学术独立性,筹办之初则急需政府的经济支持。马相伯说:“基本金可先请领官荒,俟有捐款,自行开垦为妙。”<sup>②</sup>显然,函夏考文苑付诸行动的第一步就是

<sup>①</sup> 《函夏考文苑十种》附《梁启超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7页。

<sup>②</sup> 《函夏考文苑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8页。



要筹集到相当数目的研究经费及必要的工作场所。马相伯在给袁总统的条呈中坦称：“基本金非筹官荒千顷，似不足用”；“苑址须大，以日后须设附苑故也。苑屋须不太陋，以外人研汉学者，必来就访故也。”<sup>①</sup>令人高兴的是，袁世凯出于笼络羈縻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竟很快口头表示同意。对此，马相伯喜不自胜，称：“函夏考文苑，前蒙大总统允准在案，中外宣传，叹为盛事。”<sup>②</sup>

然而，当马相伯要求政府具体落实函夏考文苑的苑址场所时，悄然发生戏剧性逆转。经实地勘察，马相伯看中的苑址场所有遵化州之东陵、天津军粮城南之排地以及山海关迤南海滨沙滩一带，后来又发现“北海鹭琼岛之西北隅，有阅古楼、漪澜堂两所，颇合用”<sup>③</sup>。特别是山海关迤南海滨沙滩一带久为外国戍兵所占，马相伯很希望借助西方学者对函夏考文苑深致同情之机，由政府出面与外人交涉；若能收回，不仅“每年可得租金一二千元”，还解决了主权问题。马相伯甚至认为，“租金事小，主权事大”<sup>④</sup>，充分体现了其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起初，国务院已明确指实“将关外海滩沙地，拨归函夏考文苑，事属可行”，称已“知会内务部发给执业凭照”，批示

① 《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9～130页。

② 《致总统府秘书厅》，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0页。

③ 《致某某先生》，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3页。

④ 《致赵总理》，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1页。



“一俟执照办出,随即送交马先生”。<sup>①</sup>但内务部有不同意见,因此国务院曾示意马相伯直接与内务部商量。马相伯《致国务院》信中透露这一讯息:“昨承贵院秘书函教,考文苑字及官荒,可径与内务部筹商,以归简捷。”<sup>②</sup>于是,马相伯又开始与内务部商讨此事。遗憾的是,商讨了半年,最终传来财部的“批驳之说”。对此,马相伯百思不得其解:何以国务院已批示同意,内务部可以迟迟不颁发执照,而财部干脆予以反对?“得毋国务院自相驳耶?奇文!奇文!”<sup>③</sup>

其实,马相伯的“函夏考文苑”流产乃是势所必然。在政局动荡的民初岁月里,袁世凯虽口头答应,但他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政局稳定和军事强化,对于文化教育事业并没有真心给予支持。正是在这样时态下,袁世凯政府各部才得以相互推诿,共同扼杀之。作为主要发起人,马相伯全力以赴,另外两位发起人章太炎、梁启超“各以事牵,不遑兼顾矣”<sup>④</sup>。特别是章太炎,因拥戴黎元洪与袁世凯对抗,1913年即被袁氏软禁。袁世凯虽有笼络知识分子的雅兴,但对苑士们的政治倾向不能不予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函夏考文苑的解散与发起人的政治信仰存在一定的相关度。此外,由于民初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马相伯函夏考文苑的深层学术文化意义,确实值得怀疑。

① 《致总统府秘书厅》,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1页。

② 《致国务院》,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2页。

③ 《致李孟鲁》,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3页。

④ 《致赵总理》,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1页。



### 三、发起筹建辅仁大学

民国初年，马相伯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并积极筹划函夏考文苑，没有忘记他的天主教徒身份。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进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事业？如何提高传教士素质并扩大天主教的社会影响？始终萦绕于心。

马相伯早在创办震旦学院时就明确表示“不谈教理”，以适应“信仰自由”、“政教分离”的世界性国民教育潮流。他说：

若夫国民教育，则既为国民，万不能有超国之思想。今日欧洲各国，若法、若奥、若意、若德等国，纷纷逐出学校中之耶教，置诸学校之外，即为此故也。<sup>①</sup>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信仰和教理存在。相反，马相伯始终拥护信仰自由，相信天主教是人生的支柱，是道德的基础。他赞赏明末利玛窦的“学术传教”，关注宗教与社会日常生活的结合。然而，当时天主教外国传教士的素质之低下，天主教与社会实际生活脱离之严重，从而导致天主教社会影响力的不断削弱，令虔诚教徒马相伯戚戚以为忧。而另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英敛之，则对马相伯的忧虑深致同情。因此，为了培养出色的天主教传教人才，并适应中国社

<sup>①</sup> 《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49页。



会发展需要,马相伯与英敛之一起于1912年联名上书罗马教宗,强烈要求在北京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公教大学。

马相伯与英敛之敏锐地意识到,民国政体的“信仰自由”政策为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各种宗教提供了平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称:

适吾政体改造,约定信教自由,一切礼文,对于生者死者,均免跪拜,所有以前阻碍奉教之条,删去已为不少。经言顽石可成亚巴朗子,此其时乎?①

然而,由“顽石”而成信徒,非直陈的宗教灌输所能达到,它需要阐述宗教信仰与世俗学问、圣学与科学的内在一致性,而这方面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马相伯写道:

明末之传布福音,奔走先后,专藉学问,此固无上圣智,对于我华特别之作用,既无大圣如方济各沙勿略者,以圣迹为开教之先声,则仿利、艾、汤、南,用学问为诱掖之具,断不可无。况圣学与科学,俱根于天主物理之有伦有脊,在在证明惟一真原,因与教旨不相刺谬也。②

但遗憾的是,由明末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

①②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页,第115页。



开创的“学术传教”传统并没有为 19 世纪相继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所重视,各国新教传教士却能够有效地利用这一传统,致力于领袖人才培养。如 1890 年召开的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声称:

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士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任何一个精通西方科学,同时又熟谙中国文化的人,在中国任何一个阶层都将成为有影响的人。<sup>①</sup>

就教会大学而言,清末兴建的有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浸会大学、文华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震旦学院等 8 所。其中,震旦学院乃马相伯于 1902 年底创建,3 年后由天主教耶稣会续办,另外 7 所均为各国新教教会所设立。为此,马相伯十分痛心指出:

乃在我华,提倡学问,而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论,我圣教不独无大学也,无中

<sup>①</sup>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见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页。



学也,并高等小学而无之。只有一法文小学,学费之巨,只可招教外人求学而已,学成之后,只可依法国人谋生而已。<sup>①</sup>

何以中国天主教教育事业在各教竞争的晚清社会里会走向衰弱?马相伯认为,这与天主教外国传教士的眼光和素质大有关系。他追问道:“来华传教士喜用学问诱掖者有几?只观在会与不在会之修道生,其肯前往罗马攻书者有几?”<sup>②</sup>

在他看来,放弃“学问诱掖”与“学术传教”,实际上就是背弃天主教传教士先辈的优良传统,“自居淘汰之数”。马相伯对比说:

利、南等固竭当时欧学,上自天文,下至水龙溉地,而实行输入我华者也。无怪明末清初,人才辈出。今也何如?教中所养成者,椎鲁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时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若晨星。致令我国虽改为民主,而教中能备选国会议员者无人,府县议事会员者无人,一乡一市之议员者亦无多人。岂非放弃利权,自居淘汰之数乎?不与圣座谕令竞争国会与地方议事会权之用意,背道而驰乎?<sup>③</sup>

<sup>①②③</sup>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页,第116页,第116页。



为了挽狂澜于既倒,马相伯和英敛之都深切地希望,罗马教宗能在民初百废待兴之际,即速创办一所能够兼收教内外通国子弟的天主教大学。他们在《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中说:

方今我国政治之不良,科学之不明,实业之不精,土地之荒芜,工艺之疏窳,学堂之浅陋,随处皆然。其求助欧西之文化,不啻云霓,而稍明时局者,亦渐知民德归厚,舍宗教无由。以故诚得我至圣父师大发慈悯,多遣教中明达热切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创一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通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①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呈上后,没有得到罗马教宗及时批复。马相伯、英敛之没有坐观其成,他们决定在北京先办一所中等性质的天主教学校。1913年,马相伯在致英敛之的一封信中写道:“近仁前在河间府耶稣会修道院读书,故其开通较胜一筹。为此我教友在京,必须设一中学也。”②

随后,英敛之即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创办一所名为“辅仁社”的学校。法国学者沙百里曾机智地解释道:“‘辅仁’这一称谓本身,便是一种纲领,即培养‘仁’这样一种杰出的儒

①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6页。

②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9页。



家道德——在人际关系中奉行人道和和睦。”<sup>①</sup> 该社始招 40 余名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天主教在华传教史研究的青年学子,研究题目诸如:太古中西同源考,唐景教碑考,元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辈著述辨。其中,“元也里可温考”题目引起正在准备撰写基督教史的青年学者陈垣的兴趣,他由是得以向英敛之请教问学,并著成大作,呈请英敛之指正。英敛之阅毕,大为赞赏,特请马相伯点定。马相伯仔细审阅全文,提出若干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在陈垣的定稿中均有所反映,如:该文首章中有“此马相伯丈说”<sup>②</sup>,即是明证。由于该文填补了传教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且本身就是“辅仁社”所出研究题目,马相伯和英敛之决定将其尽早刊行,以飨读者。为了扩大影响,马相伯特撰序推荐,称:“向余只知有元十字寺为基督旧教堂,不知也里可温有福音旧教人之义也,知之,自援庵君陈垣始。……君真余师也。”<sup>③</sup>

正是在马相伯的真诚鼓励下,陈垣不负众望,愈益发奋钻研,终成世所罕匹的史学大家。

也许是马相伯、英敛之的办学至诚感动了罗马教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即传来教宗必约十一有意在中国创办天主教大学的消息,以为“中国际此危急存亡之秋,提倡

① [法国]沙百里著,耿昇、郑德弟译:《中国基督徒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84~285页。

② 《元也里可温教考》,见《陈垣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

③ 《〈元也里可温考〉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99页。



道德,培植人才,尤不容缓”;同时,他还“亲捐 10 万义币”,并答应“此后凡属华谛冈(今译梵帝冈)出版品寄赠本大学一份,以表教廷之注重”。<sup>①</sup>此后,罗马教廷即派美国公教司铎奥图尔博士来华调查中国需要及教育实况,奥图尔调查后深感“中国高等教育,有振兴创办之必要”<sup>②</sup>。1923 年 8 月 7 日,全美本笃会受罗马教廷委托,讨论审议了北京公教大学兴学案,并获得通过。

马相伯得知北京公教大学兴学案消息后十分高兴,又对如何办好这一大学做更加细致的筹划。1924 年,他在致英敛之的信中写道:

美士拟办之大学,专为教众乎?抑兼为教外乎?若兼为教内外,一、宜召愿读华文子弟,如此则旧家子弟必来。二、读华文须聘真读书人,略变通古法。三、读西文亦须问过来人,近今私问南北华铎,及欧美游学生,皆谓宜改教法读法(教十六七岁华童,不应用教 10 岁以内之西童。前读英文,皆用印度课本,余已革命一次,但应革命者尚多也)。四、校基不应在京城内,若长辛店或更南,以能召致南方学者为妙。二哥老矣,断不能此,但我等不可不进忠言也。<sup>③</sup>

①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459~460 页。

② 《图沫记辅仁大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见朱有璈、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4 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 年,第 420 页。

③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456 页。



这些意见涉及办学的方针宗旨、招生对象、教师聘请乃至教学方法,引人深思。

1925年1月,奥图尔奉命来华筹办北京公教大学,英敛之被聘为该校国学部主任,特租北京西城定府大街涛贝勒府旧邸为校址。8月15日,英敛之建议沿用其原先在香山创办的“辅仁社”名称,在大学本科招生之前,于公教大学内另辟国学专修科,先行招生。国学专修科“分国文、历史、哲理三大纲,而总以辅翼道德,开拓识见,及接人应世必需之常识为目的”。简章内容如下<sup>①</sup>:

(一) 本科专事国学之研究,故取《论语》“会友辅仁”之义,名辅仁社。

(二) 入社之年龄,自18岁以上至25岁以下为合格。

(三) 入社程度,须能参阅书史,并能作二三百字通顺文字者。

(四) 凡愿入社者,请先来信报名,写明姓名、年龄、籍贯,并将自作文一二篇附来(万不可托人代作及修改,倘至时不符,则徒劳往返)。合格者由本社去信知照。至入学时,须有各本处主教司铎介绍函,始得收录。

(五) 本学备有宿舍及一切参考书籍,来学者每人每月只收茶饭费7元,一切学费、房费皆不收

<sup>①</sup> 《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见朱有璩、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4辑,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第421~422页。



取，惟笔纸被褥及零用之物，皆须自备。

(六) 本社以2年为毕业期，普通学识粗具，能自修习，即给以证书。其中偶有天资明敏，品行端方，愿为深造者，可升入大学预科或本科，并优待免费。

(七) 凡学生有犯规则，屡戒不悛，及天资愚钝，难期造就者，得随时令其退学。

(八) 来信报名，请直寄北京西城定府大街涛贝勒府旧邸内公教大学国学部收可也。开学日定于本年阳历10月1日。路途远者迟至，可随时收录。

(公教大学国学部主任英敛之谨订，1925年8月)

马相伯从报上获悉“辅仁社”事宜后十分欣喜，特致信英敛之表示祝贺，并对招生问题有所建议：

昨见《主日报》载辅仁社开学事，甚喜。但南方亦无学堂可入。……今有苏、松等教友，或年逾19，或不及19，愿求学于辅仁者，当不见拒。良则益倦，怕动笔，惟望我兄能久久辅助青年耳。<sup>①</sup>

马相伯对辅仁社“专事国学”的研究旨趣深致赞赏，以为极有利于修士素质的提高。他说：

承示仍愿为辅仁社之组织，良极赞成。王宝仑云：财政事易，我教中之人才实不易！试问修道

<sup>①</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80页。



中有读过十三经者否？五经四书者否？或四书兼（疑为集）注者否？……设令华修士不善华文，而善辣丁，亦有救；两皆不善，其奈之何！<sup>①</sup>

1925年10月，辅仁社共招收学生23人。不幸的是，1926年1月，英敛之因积劳成疾而病逝。辅仁社工作便落在学界新秀陈垣身上。是年，依据教育部有关私立学校条例，公教大学更名为“辅仁大学”，奥图尔为校长，陈垣为副校长，先设文科。1929年6月，文科改为文学院，增设理学院、教育学院，以及医学专修科和美术专修科。同时，依据国家有关外籍人员不能担任校长的规定，奥图尔改任教务长，陈垣为校长。

需要指出的是，马相伯由于年迈未能直接参加辅仁大学具体创建工作，但作为发起人之一，他与英敛之一起热衷辅仁社工作，设计了辅仁大学的前身——公教大学的办学理念 and 蓝图，从而有力地推动并导致辅仁大学崛起。

1925年，马相伯在英敛之中文初稿的基础上，特用英文重新拟就《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阐明其中西汇合的办学方针和宗旨。他说：“今之所创，一本斯旨，凡欧美新科，最新最确者，则以介绍于中华，中华旧有之文学、道学、美术等，莫不善善从长，无敢偏弃，持此物此志以周旋而已矣。”<sup>②</sup> 在他看来，当时中国将进入实业革

<sup>①</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80～481页。

<sup>②</sup>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8页。



命,沿海地区已先行输入欧洲物质文明,但此物质文明“安能垄断旧有之纯粹、高尚、优美之精蕴乎”<sup>①</sup>。

马相伯引杜威所言:“当18世纪,欧洲所谓改良时代者,举数千年之文物制度,皆摧枯拉朽而进绝之。”强调中国现在正“蹈此覆辙”,主张对“历史中无第二更老大、更特别、更自充足有裕之旧文化”进行理性改良,指出:“但欲改良,非融合新旧于一炉不办。其事功奇难、奇大、奇繁杂可想,但风会所驱,亦非数十辈醉心欧化者所可转移。”<sup>②</sup>

马相伯深信:“人同此心,即同此理,岂有能奏绩于欧者,而不能奏绩于亚欤?”<sup>③</sup>但引入欧美新科,不能不顾及中国的“社会所需”及“人民所缺”。他说:

至于本学课程,事在将来,今难拟定,盖必先审社会所需,人民所缺而后可。但大要有5门:一、神学,哲学。二、中外文字(盖文理为研究原理原则,大学之作用在此,世有定论矣)。三、自然科学。四、社会学,历史学。五、矿质学,建筑学是矣。<sup>④</sup>

其实,后来的辅仁大学即力求依此建制,体现中西汇合、文理融通的办学方针和精神。为了突出爱国民族精神,马相伯特别声明:

今此大学初创之人,虽皆美产,但来华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就附属品也。本会在—

<sup>①②③④</sup>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8页,第458-459页,第459页,第458页。



国,便为一国之会士,极愿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数十年后,会士为中国之会士,公教为中国之公教,大学为中国之大学,懿欤休哉!而本会之志愿方告成。<sup>①</sup>

综上所述,自1912年首议兴学,至1925年北京公教大学建立,1926年改称辅仁大学,长达14年,马相伯、英敛之历经千辛万苦,付出了无数心血与智慧。马相伯虽然年事已高,不能参与具体办学事务,但发凡起例,出谋划策,其贡献实非言语所能表达。马相伯在回顾该大学办学经过时,深情地写道:

此事动议于1912年,直至1923年始酝酿成熟,由教廷简派于时局最为适宜之美国本笃会士总揽其成,而本学组织之方针亦于是乎始定。肇路蓝缕,缔造维艰,所望会士持坚固耐久之心,勇猛精进之气,更望中国贤人君子不以远方衣帛菽粟为不可御寒充饥,不以公教之大学为一至中国便过淮成积,则庶几本会之讲学,宜于古者,亦宜于今,宜于欧者,亦宜于华。安见东太平洋与美对峙之大国,不能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sup>②</sup>

这一融古今欧华于一体,且有志于“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的崇高境界,正是马相伯为之奋斗终身的办学理想和信念。

<sup>①②</sup>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8页、第460页。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第

六

章

## 宗教探索与中西教育思想的文化审视

通过如上两章对马相伯办学事迹的剖析,不难体会其中西融通的教育思想特色。而要深入理解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又不能不首先涉及他在宗教方面的思考与探索。作为天主教徒,马相伯不仅阐明宗教的价值功能、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而且极力反对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努力探讨天主教中国化变革。作为近代教育家,马相伯则能够理性地把握西方教育的科学人文精神,从容地批判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致力于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汇合,为中国教育改革与现代化进程留下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 一、宗教的精神价值与教化功能

马相伯曾与上海天主教耶稣会有过激烈冲突,离会入俗达21年之久。1897年,他重新回到教会,力求缓和与教会的紧张关系。但由于天主教耶稣会专制性和殖民性有增无减,马相伯与之再次发生冲突便不可避免。然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他的天主教信仰,甚至老而弥笃。

作为虔诚的教徒,马相伯对“宗教”有独特认识。他说:“欧文字义,religion 宗教者,一再束缚也;谓即束缚以性法。性法者‘齐之以礼’之‘礼’,四端之一,能禁于未然,换言之,即性法,性法之上,而宗教又能加以束缚也。性法已非人力所能为,则加束缚于性法之上,更非人力所能为矣。”<sup>①</sup> 为了便于让人理解这一超人力的“religion”本义,马相伯十分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学理会通。他说:

朱子注“上帝”曰“天之主宰”。希腊哲学,以为主宰万物者,有“帝冥氏”焉。罗马哲宗季宰六,又多为之证;其证之精,至今学者称之。我《诗》、《书》之所载尤详。大抵存乎性者,触之即发,不啻火药之遇火也;故一遇人身之力,或人性之力所不能抗者,每呼天以抗之。孔子抗桓魋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孟子抗臧氏曰:“吾之不遇

<sup>①</sup>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09页。



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sup>①</sup>

这一中西学理会通，显然是继承了明末利玛窦的“学术传教”精神，与利氏在《天主实义》中所说“吾国天主，即华言上帝”，“吾天主，乃古经所称上帝也”<sup>②</sup>，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表达了他对“上帝”、“天主”的真挚信仰。他说：“吾之所谓教者，即冥冥中有一大力之主宰……夫既知我与万物皆冥冥中之主宰所造，则吾对此造物主宰各有其本分、其责任、其义务，斯即吾之所谓教也。教非他物，概括以言之，即人人对于造物主宰之关系耳。”<sup>③</sup>

马相伯进一步指出，宗教与人的价值取向和终极关怀密切相关。他说：“宗教非他，使人无迷失而已矣。人之生，生从造物主来；人之死，死归造物主去。人苟不从造物主来则已，既从造物主来，则人对于造物主有一定不移之本分，此义务无可推辞者也，此责任一生当尽者也。”<sup>④</sup> 由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输入，人们对“人从造物主来”产生怀疑，但他并不以为然。他说：“天演又天演，植物可变动物，动物可变灵物，而今植物变为植物，于理何难之有？”<sup>⑤</sup>

马相伯认为，宗教作为人的终极关怀，它具有超功利性。他说：“宗教者，与世无争，不谋生前之利；谋生前之利

①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09页。

② 利玛窦：《天主实义》上册，见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③ 《宗教在良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0页。

④⑤ 《宗教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5页，第156页。



者,一切团体公司胥是,非宗教也。”<sup>①</sup> 然而,这一超功利的宗教思想很难为急功近利的中国民初社会所接纳。马相伯说:“我国频年以还,日言提倡宗教,日言推重宗教,而上等人不肯取,下等人不肯奉,人心愈坏,世道愈邪,宗不宗,教不教,亦何用乎提倡宗教哉?”<sup>②</sup>

就下等乡民而言,则直言“吾欲吃饱饭,著暖衣,宗教果可吃可著者,吾欲之矣;否则,无所用乎宗教也”<sup>③</sup>。在这些乡民看来,利之所在,即其宗教:“今日东庙烧香,明日西庙磕头”;“人民之信仰,亦忽而回,忽而道,忽而儒,忽而佛。”<sup>④</sup>

就上等士人而言,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声称“无所用乎宗教”,但又热衷于祭天祀孔,“焚香顶礼,大叩而特叩,大拜而特拜者又胡为也?”<sup>⑤</sup> 职是之故,马相伯极力抨击甚嚣尘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习气,断言:“口宗教而内私欲,纵日言提倡宗教,日言维持宗教,日言推广宗教,然而言行不顾,丧尽天良,世道人心,由此益坏矣!”<sup>⑥</sup>

那么,马相伯心中的宗教究竟具有什么价值意义呢?对此,他引证著名化学家杜马(Dumas)的名言:“生命所从来,科学不知也;生命所由去,科学不知也!”并进一步指出:“因科学既认‘不知’,故‘知’必超科学所不能范围的宗教。唯有宗教能解决人生问题!”<sup>⑦</sup> 在他看来,惟有宗教,能够

①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12页。

②③④⑤⑥ 《宗教在良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9页,第149页,第150页,第150页,第154页。

⑦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2~563页。



回答人的由来及归宿问题,能够回答人除了穿衣吃饭之外,还需要什么样的精神追求问题。

针对有人以“宗教是束缚自由”诘难,马相伯认为,自由本身是有其范围和限度的。他说:

“自由”应有相当范围,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是。例如,目的在上,尽有往上追求的自由,可是并没有往下堕落的自由。不然,散漫无羁,任何事,不能办,何况要求解决人生问题呢?①

同时,他又认为,宗教对人的约束,“正示人以规矩,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使人享有应有的真自由,而且不妄想不能有的假自由”②。马相伯特别指出,滥用自由必然招致天怒人怨。他举证说:

我们现在所以反对日本暴行,就是因为反对敌军自由杀人,自由夺人养命土地,且妄以为可以自由掌管我四万万五千万人的生死存亡。我们固有天赋人权,不容剥夺,因此抗争!③

至于有人指斥“宗教是麻醉民意的”,马相伯回答道:“老实说,鸦片、吗啡等麻醉品,确能麻醉人身。宗教对于民众,真理教化人生,使人心悦诚服,是对造物主的钦崇,而自动来克己复礼,以救世主之心为心,唯造物主之命是从。故牺牲一切的一切,都是反本归原,所谓人事尽矣!毫无‘麻

①②③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3页,第563页,第563~564页。



醉’意义,极为显明。”<sup>①</sup>

由于“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近代西方观念确立,马相伯早在1902年底创建震旦学院时就宣称“不谈教理”,但在社会上他仍然十分积极地弘扬教理,深信“宗教力量,可以化民成俗,可以团结民心”<sup>②</sup>。如,1916年5月7日,马相伯在北京中央公园公开演讲《圣经与人群之关系》,听众云集,反响强烈。马相伯认为,法律与道德是治国的双刃剑,强调此二者与《圣经》均有密切关系。

就法律而言,马相伯说:“无法律,非国家,而法律之要,一在保障通国身命财产,二在通国上下一体奉行。”<sup>③</sup>但遗憾的是,中国向来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我国之人,无古无今,皆不知法律为何物,所知者取决于有权人之胸臆而已矣。即如孔子诛少正卯,按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虚者门人去仲尼而皈少正卯也。考其罪状,只曰‘心险而达,行辟而坚,言伪而辩,祀丑而博,顺非而泽’云云,试问有何可杀之条?”<sup>④</sup>有鉴于此,马相伯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急需一部以《圣经》为基础的国家法律。他说:“要按照良心,得一真正法律,保障身命财产,使军民上下一体奉行。苟无《圣经》诱掖万众天良,殆不可。”<sup>⑤</sup>

就道德而言,马相伯主张以《圣经》之训诫教化人群。

①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4~565页。

② 《乐善堂纪闻》,“假如甘地在中国”,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30页。

③④⑤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85页,第185页,第186页。



他说：“人群譬一挂朝珠，其串合必有线索。线索非他，即按救世主《圣经》之训，该彼此相亲相爱而已。”<sup>①</sup> 马相伯认为，《圣经》所说“兄弟是真兄弟，爱情是真爱情”<sup>②</sup>，而要实行这样的“爱”，“对于人群，从消极的先说，毋杀人，毋邪淫，毋偷盗，毋妄证；那积极的工夫，一要恕道，二要诚实，三要谦虚，四要知止”<sup>③</sup>。无论是消极还是积极，他都善于结合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与社会实际进行对比分析。以“恕道”为例，马相伯认为，《圣经》注重从积极向上的角度引导人伦关系，比《四书》阐述得更为透彻入理：

《圣经》说得好：“要人怎样看待你们，就该照样看待他。”意思间，不必问人看待如何，事事要照顾人看待的样，先施于他。可见爱人是积极的工夫，不是《四书》上消极的主见，只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够了。不欲人放火，不欲人杀人，我不杀人，我不放火，我中国人便自命是好人了。《圣经》不然，你要爱人，随处随时，实事求是。<sup>④</sup>

又如“诚实”之德行，马相伯说，《圣经》教人“毋发虚誓”，指示一切言行要心口相符、直心直肠。与之不同，他批评中国传统社会：“暗中撒谎，蒙骗其上，则又我中国人在下的权利。所以，为衙役的则蒙骗小官，为小官的则蒙骗大官，为大官的则蒙骗朝廷，‘瞒上不瞒下’，竟成官场俗语。请看一

①②③④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86页，第186页，第221页，第198页。



切奏章禀帖,纸面上的,皆谎也。”<sup>①</sup>应该肯定,这些批评并非完全确当,但确实击中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痼疾。

毋庸置疑,马相伯这篇《圣经与人群之关系》的公开演说,对于当时“你争我夺”的军阀专制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药石之功,其教化作用不言而喻。他深切地教导说:“诸位看救世主,从《马太》5章起,说到如今,辛辛苦苦,留下这篇圣训,不是教人看看便罢,是望人实践躬行的啊!”<sup>②</sup>

## 二、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宗教与科学所持认识论不同,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宗教教条的否定而前行。但另一方面,宗教与科学又相互兼容。西方近代科学就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诞生的,许多学者往往是出自对上帝造物——自然界的惊奇而导入科学研究,这种经由认识自然而认识上帝的观念和行动直接推动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作为教徒,马相伯相信上帝存在,也相信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有规律可循的,强调宗教与科学二者虽关注领域不同,但绝非不能相容。

宗教与科学有着不同的学术旨趣,这一点马相伯并不否定。他说:

夫宗教与科学之辨,一贵信仰,一贵见知。若

<sup>①②</sup>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03页,第219页。



徒信师言，而于所习之科无真知确见，则不得谓之学矣！譬则西文 Constitution 宪法，由 Constitute 以得名，意犹建设也，则国体政体所由建设，以维系全体国民之生存之权利，而敦促而扩张之也。虽有条件，而非法律之谓。法律乃人民与人民，人民与政府，分际上之规定，逾乎此则谓之非分非义。故法律虽本良心，而非道德之谓。不明乎此，虽言法律，不得谓之科学矣。宗教不然，全系乎良心之信仰，践所言者谓之言而有信，客观之信也；考实其人诚实无妄，而所言之事既与哲理无违，又为其人权力所及，因此信仰其言必有成就，此乃主观之信仰也，宗教之信仰也。仰者望也，望其有益于我身心性命，不虚生不梦死也。<sup>①</sup>

即是说，科学所关注的是人的“见知”，追求的是“真知确见”，如同法律虽本良心，但全凭良心则无法获得“法律”之科学定义。而宗教所关注的则是人的“信仰”，突出人的“良心”，旨在树立“不虚生不梦死”的积极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在马相伯看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

我国人每以有无造物为无关我事，不知苟无造物，我常处于独，而为一切势力之奴，甘心否耶？国务教务，事事不行者，正以妄认势力为主人，不知奋斗故也。<sup>②</sup>

① 《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48页。

② 《致英贞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79页。



宗教与科学虽然旨趣不同,但彼此又是有联系的。马相伯说:“造物为万物之灵,其造人必有所为,亦无疑!而宗教者,即所以宣示其何所为也;犹之科学,所以研寻其所做之工。”<sup>①</sup>为了进一步说明宗教与科学的相融性,马相伯不厌其烦地列举算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各种自然科学研究的许多近代科学家,以确凿的证据指出他们同时也是宗教信徒。以化学为例,马相伯说:

统计 19 世纪中,以化学名家者,约 51 人。无神派仅贝德禄 1 人,不关心宗教者 3 人,调查其宗教不甚明了者 8 人(一为该君,余皆未录)。除此 12 人外,余 39 人,皆笃信宗教者也。<sup>②</sup>

由此看来,宗教与科学确实有相容之处。马相伯断言:称科学“与宗教不相容者,非科学家之言,更非科学名家之言,益彰彰矣”<sup>③</sup>。应该肯定,马相伯这一判断符合事实。当代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约翰·H·布鲁克明确指出:“基督教的教会人上并非全都是蒙昧主义者,许多伟大的科学家都曾公开宣称接受宗教信仰。”<sup>④</sup>

然而,令马相伯不解的是,当时中国社会仍有不少人视宗教为迷信,“直谓宗教非他,迷信而已”。对此,马相伯分析说:“人訾其不知宗教,吾惜其不辨迷信。迷信者,迷于非

①②③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427 页,第 424 页,第 424 页。

④ [英国]约翰·H·布鲁克著,苏贤贵译:《科学与宗教》,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5 页。



果之因，非因之果，而认为因果也。”<sup>①</sup>如砍头而信其能醒，服丹而信其不死之类，均属“无关而信之”的迷信。至于中国人是否迷信宗教，马相伯调侃道：

中国迷信，如何可升官，如何可发财，可成仙，可成佛，可倚拳匪再造邦家，而迷信宗教，未之前闻。甚至一闻天主教，即叱为洋教，一若天主有洋天主华天主者。<sup>②</sup>

在他看来，过分追求升官发财等外在功利目的，必然导致权势迷信而沦为人奴。他在《致英贞淑》信中明确地表示担忧，称某些人“迷信势力，终不改，而反讥我教之迷信。愿为一切人奴，而不肯信奉真主，堂长将何以劝此执迷不悟者耶”<sup>③</sup>。

此外，还有一部分激进学生则人为地将宗教与科学对立起来，声称“读了科学，就极端反对宗教”。对此，马相伯善意地指出，你所读的科学书或许就是教徒所编，因为欧美“科学名家，基督徒亦不少。……现在你一面恨基督教，一面读他的科学书。恨则不赞成；不赞成，一定读不好。问你该担忧不该担忧？”<sup>④</sup>为了进一步说明道理，他耐心地分析说：

①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12页。

② 《宗教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59页。

③ 《致英贞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37页。

④ 《〈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1页。



小友生！……不瞒你说，我也读过些欧美人的科学，你读的是算学？是几何？是步天？是观象？是医学？是化学？是物理？是地质？是动物？是植物？是哲学？是名学？是伦理？是心理？等等，我可保你，绝无—科反对基督教，绝无—科之中所分之部，反对基督教。譬如算学，深纵深，在求等数，等数与基督教何反对之可能？人皆知几何有三界，是顶点、是极点反对基督教？是垂线、是斜线反对基督教？是平面、是曲线反对基督教？抑或基督教曾反对此三界也乎？你问心，你听了有民国学生如此糊涂，我们该哭还是该笑？<sup>①</sup>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意识不断高涨，非宗教运动在收回教育主权和实现国家独立等方面确有其重要贡献，但部分激进学生尚不能完全理解宗教价值以及宗教与科学的复杂关系。

至于那种一味夸大科学的万能作用，而走入唯科学主义的观点，更为马相伯所反对。他说：

树之生也，兽之活也，不在化学权限之内，然则死生有命，不在科学万能之化学医学，况所以善其死生者，若道德，若宗教，更不属科学之范围。

<sup>①</sup> 《〈尤其反对基督教理由〉书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2页。



以故凡言形下之科学愈发明，形上之真道德、真宗教愈无用者，皆吃言也，梦话也。<sup>①</sup>

即是说，像道德、宗教这样的人文学术与自然科学分属不同研究领域，有其各自的价值取向，不可以盲目地将二者对立起来。1923年，他在《致英贞淑》信中写道：“中国之学者，拾西人科学之唾余，动曰迷信。试问我国水旱洊灾，科学有法以救济之否？无法，是科学非万能也。”<sup>②</sup>应该肯定，马相伯这种提倡科学但又不迷信科学万能的认识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最让马相伯感到愤慨的是，某些急功近利者正在败坏宗教的美名，随意立教诱民，甚至视宗教为敛钱的工具。他说：“近见学者某，不独言孔孟与弟子皆立教，凡见于四书者，如管子、晏子、告子等，无不立教，虽下至秦汉诸子，亦无不立教，教殆以多多益善耶？惟其多也，而孔反不孔矣！近又见道光时，直隶某县文告，历举民间所立教名，真是书所未见，耳所未闻。此50年中，不知又立多少？……西人之所谓宗教也，虽各条其条，犹有所谓教条也，信条也；所以然者，因知不如此，不足为宗教也。若据某县文告，则民间所谓宗教者，敛钱而已！”<sup>③</sup>

① 《〈天民报〉发刊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74页。

② 《致英贞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46页。

③ 《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29页。



### 三、反对文化殖民与天主教中国化探索

作为教徒,马相伯相信上帝存在,相信宗教的价值,相信宗教与科学并不矛盾,相信真正的天主教信仰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没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天主教和新教教徒都是借助不平等条约来华传教的,外国教徒与所在国的世俗政府关系密切。以天主教为例,由于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保教权落入法国政府,罗马教廷的直接影响反而削弱,法国巴黎设有遣使总会,负责向各国派遣传教士。中国的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即由法籍传教士控制。马相伯曾受益于耶稣会所创办的学校教育,但耶稣会的保守性、专制性和殖民主义色彩,令马相伯与之发生多次冲突。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不断高涨,马相伯情不自禁地投入其中,开始对天主教中国化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探索,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

#### (一) 反对文化殖民 主张用中国语言传教

所谓“文化殖民”,类同于“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殖民者强行将本国文化价值观念植入被殖民国家的国民意识,其典型特征就是“强行用殖民者的语言替代当地的母语”<sup>①</sup>。由法籍传教士控制的上海徐家汇耶稣会长期坚持用法语传

<sup>①</sup> 赵修艺:《解读汤林森的〈文化帝国主义〉》,见[英国]汤林森著,冯建三译:《文化帝国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页。



教,反对中国教士以华语传教,甚至污蔑华语是“魔言”<sup>①</sup>,这不能不引起马相伯的愤怒和深思。

语言是人类智慧精神的象征,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标志,抛弃语言无异于背叛自己的民族。索绪尔说:“在民族统一体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应该过问的是语言。语言的证据比其他任何证据都更重要。”<sup>②</sup>对精通中外多种语言的马相伯而言,他当然知道语言对于一个民族国家的极端重要性。他说:

一国之语言,一国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国之文字,一国之理想所藉以征验也。……我国语言,其足以发明心志,而交通之与否,兹不俱论。而文字则固一国聪明才智会(疑为荟)萃之林,心力脑神表詮之地。<sup>③</sup>

马相伯深知本国方言传教的重要性,他举宗教史上的故事说,有一次,“圣保禄被如德亚人包围,将被杀害,保禄用如德亚话解释。如德亚人一听为同乡,立即将杀害之意变为亲爱之心。诸位看看,方言的力量,有多大呢?”<sup>④</sup>和他国方言一样,中国语言当然可以用来传教。他说:

圣神降临日,宗徒讲道,听众虽为散居各国的

①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94页。

②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12页。

③ 《〈古文拾级〉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1页。

④ 《学术传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9页。



人,但所听的皆为本国方言。……当时还有一个赐乐业(该民族是周朝来中国的),也在场听圣神讲中国话。如此说来,中国话也可以讲超性道理。<sup>①</sup>

相反,如果传教士不通华语,自然不容易得到华人理解,甚至会被当做异端对待,这也是人之常情。马相伯说:

圣保禄亦云:彼我言语不通,相交则夷狄,又何怪若辈之夷狄我,异端我?盖亦人之情耳!惟不论我华礼俗而已,论而专以欧语语欧人无益也,不如请命于罗马,而以华言言之为是。<sup>②</sup>

那么,为什么某些西方传教士反对以华语传教呢?显然与西方传教上的文化殖民思想及霸权主义意识有关。伴随着军事与经济侵略,西方列强必然继之以文化精神上的控制和奴役。马相伯尖锐地指出:“今之欧人,皆欲以文化化吾,甚欲以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sup>③</sup>作为教徒,马相伯当然不会赞同盲目地“反教”,但他能够理解华人反教的真义乃在于“反对外国之殖民政策”;而某些西方传教士“反对用华文、华语,非殖民政策而何?”<sup>④</sup>

其实,马相伯并不是单纯地反对“彼文彼语”,他自己就精通多种外国语言,而是反对全盘西化而丢弃“吾文吾语”,

① 《学术传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9页。

② 《书〈利先生行迹〉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24页。

③④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00页,第339页。



放弃自己的话语权力。著名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尔说过：“要是我们不懂任何外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对自己的语言也是无知的，因为我们看不出自己语言的特殊结构和显著特征。”<sup>①</sup> 马相伯就是一位中外文兼通的语言大师，既著有《拉丁文通》，又协助乃弟马建忠完成《马氏文通》。但是，那些只读西洋书的中国教士，马相伯真担心他们会误入歧途而丧失民族文化精神。他说：“读十余年西洋书，为西洋同化了，将中国旧有的礼貌风俗习惯都忘掉了。这样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何异？所以，修道的修士要好好读书，更要多读中国书，明了中国的习惯风俗。”<sup>②</sup>

然而，奇怪的是社会上西化日深，外国语大有取代国语之势，这不能不令马相伯心生隐忧。马相伯说：“今我国自中学以上，不善国文犹可，不读西文则必以为程度不高，而群情反对。……吾不敢曰：在某某势力范围圈内，不应读某某文字。如在山东者应读德文，但竟奉为国语，则期期以为不可。”<sup>③</sup> 他认为，在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里，学习和利用外语固然十分重要，但完全“倾心”，甚至“奉为国语”，则有违于中国教育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使命。

## （二）提高教徒素质 强调学术传教

由于马相伯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有资格对教内外各

① [德国]恩斯特·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

② 《学术传教》，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00页。

③ 《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1页。



种人才素质进行比较鉴别。当他重回教会,理性地审视天主教徒自身素质时,不免感慨万千。他说,明末传教士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专藉学问”,“用学问为诱掖之具”;而现在“来华传教士喜用学问诱掖者有几?只观在会与不在会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罗马攻书者有几?”以致“教中所养成者,椎鲁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时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如晨星。致令我国虽改为民主,而教中能备选国会议员者无人,府县议事会员者无人,一乡一市之议员者无人。岂非放弃利权,自居淘汰之数乎?”<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相伯和英敛之为在中国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并最终完成心愿。

通过办学提高教徒的素质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靠教徒们自身的主观努力。这一点,马相伯认为,明末传教士利玛窦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说:

利子所藉以为开教之先河者,文学科学外,不闻有灵异之行,不学而能方言也。顾信崇必由听受,宗徒保禄之言也。而听受必藉方言,又自然之理也。不学而能,固耶稣所赐,不能而不学,学而不力,不与恃贵交白卷,冀高中,同一妄恃欤?利子何敢然?故研习华文华语,不耻哑哑者垂 20 年。以彼天资之高,久久不厌如此,呜呼,可谓难矣!<sup>②</sup>

① 《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6 页。

② 《书〈利先生行迹〉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223 页。



遗憾的是,某些法籍传教士非但自己不学华文,甚至反唇相讥,对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前辈传教士进行人身攻击。对此,马相伯愤恨不已,并予以反击。1916年,他在《致英华》信中写道:

顷悉北堂有法星期杂志,内言:利子不善华文,所著无一足贵。南怀仁所铸之炮,以彼所有种种方便,我铸之当胜百倍。再康熙并不喜汤若望,不过藉以逐一回子杨光先耳!诸此吃语,不可不辩。盖利、南、汤之名,损之何益?尊处有《几何原本》否?徐(指徐光启——引者注)言死后得其手订云云(在重刊凡例内)。彼等以华语为难,故以为魔言,因想利等亦断不能通晓。妒耶?忌耶?然于中外及教外人何益?殆因学魔语而中魔耳!故此拟于《遗牍》或利传再附一跋,盖此等狂妄之风,不能不设法禁阻之。<sup>①</sup>

然而,最让马相伯不解的是,某些不学无术的外国传教士还自鸣得意。对此,马相伯讽刺道:“少年来此,专望一力致命,及其传教,言语不通,虽自以为饱学,一小儿耳!”<sup>②</sup> 还有一些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肤浅,停留在似懂非懂阶段,其“凡所谓懂者,但自以为懂耳,每据一二人,一二事之恶,以概中国一切事、一切人”<sup>③</sup>。另有一些传教士甚至把自己不学无术的责任推卸给华人,“其心理盖谓利玛窦

<sup>①②③</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93-294页,第336页,第336页。



西洋人,予亦西洋人,苟有华人助我,我所著作,将远胜利玛窦,然则予不著作,尔华人之过也”<sup>①</sup>。

马相伯对中国天主教和传教士的忧虑,赢得许多业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1919年,他代表北京教友拟就上教宗书,对传教士自身素质进行公开批评,称:

西教士十无一二可说普通语言,华教士十无一二可写普通文字,致令教与教外,判然两国,格不相通。由此所著之书,所讲之道,惟老教友之明白者,尚可勉强会意,而主教由此则更深居简出矣。<sup>②</sup>

除欠缺语言文字基本素质外,传教士的拉丁文、历史、科学等知识素养也非常贫乏。马相伯直言道:“颇闻修道院内,中国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则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sup>③</sup>

与这一情况相反,教外的人才则是与时俱进,日新月异,对比之下更使马相伯心急如焚。他写道:

现今批驳教友者,不独教外人与誓反教,诚以游学欧美,能英语者有数万人,能法语者有数千人。或于报纸,或于杂志,译有欧美教育家、政治家、社会家、历史家、科学家等等名姓书籍,以批驳

<sup>①</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31页。

<sup>②③</sup> 《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62页,第362页。



圣教者，往往而有。传教士，学问不高，何以开启华人，维持教务？<sup>①</sup>

马相伯所强调的传教士素质以及“学术传教”精神，引起罗马教宗重视。1920年，教宗本笃十五世明确指示：“传教者，固当富有神智心力，为众所称，渐摩以各种道义，涵养以各类人文。”<sup>②</sup>

毋庸置疑，天主教人才断层已成为制约中国天主教发展的致命原因。为此，除不断呼吁加强中国天主教学校建设外，马相伯极力主张派遣学生留学罗马。他说：“华牧之利，在华之外借才难，势不能不悉心以自造拉丁与汉文之才，科学之才，三 Canons 之才，并择颖异者遣罗就学。”<sup>③</sup>断言：“苟不选送罗马，则修道院中，中国司铎永无真正教授资格。”<sup>④</sup>此外，他强调培植人才，还须设立相应的会社，“或仿古所设讲道会，或仿今所设公教进行会，皆可”<sup>⑤</sup>。

### （三）主张西教士改为中国籍 谋求教会管理自主权

自罗马教廷委任法国为保教国后，中国天主教会长期以来受制于法籍传教士及其政府。马相伯说：“中国教务，自来主教会长等等，皆西来教士，近则西官每多干涉，凡属某国修道会者，且必用某国主教与会长矣。”<sup>⑥</sup>名为中国天主教会，其实中国神父在教会里毫无地位，既没有选举权，

<sup>①④⑤⑥</sup> 《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62页，第363页，第361页，第360页。

<sup>②</sup>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92页。

<sup>③</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43页。



更没有被选举权,与“小小当差”没什么两样,升为主教更是遥遥无期。据统计,1919—1920年,传教士人员中,“外籍有1417(人),本籍有963(人)”<sup>①</sup>。外籍教士在人数上超过本籍教士,近千名中国教士中居然没有一名主教。

这一违背人性的专制管理严重背离宗教平等精神,具有十分浓厚的种族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相伯认为,最简捷的办法就是西教士改为中国籍。他举例说,回教、佛教之所以盛行于中国,就是因为“其教之管理人同为中国籍”。同理,来华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何妨按国籍法,亦改为中国籍耶”<sup>②</sup>。他认为,将西教士改为中国籍,不仅可以提高教会的声誉,而且有助于消除人们对西教士及其母国政府的指责。他说:“改为中国国籍,则不含各该教士本国政府之臭味,益以证明教宗良十三,于中法战时所与光绪书,在华传教士,悉归宗座派来之语矣。窃谓果能行此,则一切疑忌之心,不待烦言而自解。”<sup>③</sup>反之,一旦中外战起,就难免中国激进派人士“以教友为汉奸,西来教士为坐探耶”<sup>④</sup>。

除主张将西教士改为中国籍外,马相伯还要求积极培养本民族国籍的教会负责人。1918年,他在《致英华》信中明确指出:“应栽培华铎,能为一方教会之主任”,以防中国教会完全堕落成“寄生物、殖民地之类也”。至于那种以为

① 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书店,1990年,第281页。

② 《答问中国教务》(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52页。

③④ 《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60—361页,第360页。



设了华主任即成为异教组织,马相伯反问道:“试问英之背教,不皆主教及各修院之长乎?何以英之教会,现皆英人耶?”<sup>①</sup>

令人欣喜的是,马相伯的主张引起罗马教宗本笃十五世注意。他虽然没有对西教士改国籍问题表示意见,但对本民族国籍教士参与教会管理工作持明显的肯定态度。1920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发表通牒,称:

凡管领一区传教者,其重要先务,当就所在民族,族人之充圣职神司者而陶养之,建设之……因本地司铎与本地人民,世籍、天资、感觉与心思,皆自相投合(谓痛痒相关少隔膜),则其能以信德渐摩本地人心,当何等惊奇耶?<sup>②</sup>

在肯定本地司铎传教优势的基础上,教宗十五世明确指出:“筹备本地铎曹,非令其以较卑之服务,辅佐外来之传教人也,乃令其负荷天主之任命,于管理本籍人民,终有一日确能承受之也。……不论何地,凡本籍铎曹治理颇敷,学术颇优,而于本位圣召亦足以相称,然后人谓其地传教之功业,已庆告成,教会之根基已然确定,是乃理所至当。”<sup>③</sup>在这里,教宗本笃十五世十分清晰地表达了其对本地教士“管理本地人民”的信任和肯定。

由于马相伯等爱国主义教徒不懈努力,天主教中国化

<sup>①</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45页。

<sup>②③</sup> 《〈教宗本笃十五世通牒〉译文》,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88页,第389页。



探索得到广泛认同,罗马教廷自20世纪20年代始在中国设立“宗座代牧区”和“宗座监牧区”。1926年10月28日,教皇在罗马亲自为6位中国主教祝圣,他们是:宣化教区主教赵怀义,汾阳教区主教陈国砥,台州教区主教胡若山,海门教区主教朱开敏,由蠡县监牧升为主教的孙德楨,由蒲圻监牧升为主教的成和德。<sup>①</sup>1933年6月11日,教皇又在罗马为3位中国主教祝圣,他们是:永年崔永恂,集宁樊桓安,雅州李容兆。<sup>②</sup>至1935年,具中国国籍的主教和监牧已有21位。<sup>③</sup>虽然中国人担任主教仍然很少,但中国天主教徒的自主独立意识和自主管理能力毕竟大大增强了。

#### 四、西方科学人文教育精神的把握和吸收

作为中国近代史见证人,马相伯深知科学落后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崇尚科学是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另一方面,他从来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而是强调文学、哲学、语言学、伦理学等人文教育不可缺少。

马相伯是中国近代较早接受西方科学教育的学者,他系统学习和研究过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对西方科学价值有很深的体悟。1902年底,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之初,

<sup>①②</sup> 参见顾卫民著:《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479页,第492页。

<sup>③</sup> 徐宗泽:《近十年来主教在我国之状况》,见张西平、卓新平编:《本色之探——20世纪中国基督教文化学术论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就曾对青年于右任坦言：“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sup>①</sup> 其后，在不同场合，马相伯一再强调科学对于民族生存和国家兴旺的重要作用。他说：“今世何世，生计之竞存，不根于实业，实业之发皇，不根于科学，可乎？”<sup>②</sup> 又说：

立国于 20 世纪科学之世界，必赖科学发达，始足以自存。中国今日之危亡，实根因于科学之落后。……是青年诸君，今日在校求学，必须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能如是，然后乃能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必有“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乃能实际应用，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此则青年诸君所应肩负之责任也。<sup>③</sup>

马相伯强调，科学与宗教是可以兼容的，甚至认为：“科学愈发明，愈显造物者之不可思议，何有乎宗教及科学之不相容？所以更希望科学教育之发达也。”<sup>④</sup>

正是出自对科学价值的高度赞赏和充分肯定，马相伯于 1902 年底创办震旦学院时明确把“崇尚科学”作为办学首要信念。在这一信念下，西方近代的象数学、物理学、化

①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 229 页。

② 《原言自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643 页。

③ 《新年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12~913 页。

④ 《九一寿辰演说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516 页。



学等科目均被正式列入学院课程体系。关于数理方面的课程,马相伯特别指出:

数理者,吾且以为不独科学之魂,而亦科学家之魂也。希腊有古贤,凡来学者,不先通几何,则不诲焉。……余抱定此观念,以期人才辈出、科学之日兴有年矣。<sup>①</sup>

众所周知,作为晚清第一个实行的学制——1904年《癸卯学制》,虽然一定程度地容纳了西方科学知识,但宗旨仍然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sup>②</sup>。“读经讲经”、“修身”仍然是各类新式学堂的必读科目。此类科目在马相伯的震旦学院课程表上则荡然无存。这种超时代的见解,不能不说教育家马相伯胆识过人。

需要指出的是,马相伯虽崇尚科学,但并不迷信科学。当有人把科学与宗教、道德人为地对立起来,马相伯疑惑不解地叹息道:“呜呼!举国昌言科学科学!无良心!无宗教!只有科学而已!”<sup>③</sup>在他看来,如果一味地高唱科学万能,而无视良心道德建设,其结果必然是“凶器以科学日新”<sup>④</sup>,而有害于人类的正义与和平事业。

与科学教育相呼应,马相伯对西方的人文教育十分推

① 《〈胡明复先生遗稿〉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90页。

②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折》,见朱有璘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78页。

③ 《九二老人病中语》,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25页。

④ 《答客问一九一五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67页。



重。这或许与他所受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有关。从12岁进入依纳爵公学,至31岁在徐家汇神学院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除研修过数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课程外,还系统学习过拉丁文、英文、法文、文学、哲学、神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因此,当他着手创办震旦学院时,便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信念:“崇尚科学,注重文艺”<sup>①</sup>。1902年,他手订的《震旦学院章程》即包涵有文学和质学两大门类,所谓“质学”,即包括象数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而“文学”,则指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包括正课和附课。正课,指古文(如希腊、拉丁文字)、今文(如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文字)、哲学(含论理学、伦理学、性理学);附课,指历史、舆地、政治(含社会、财政、公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精心构建的近代课程体系,充分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耦合互补,直至今天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以“西文”为例,马相伯说:“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sup>②</sup>这是因为语言作为工具,是人们认识科学文化新知的前提。他语重心长地说:“泰西科学制造,时有新知,不识其文,未由取益,必至彼已累变,我尚懵然,劣败之忧,甚为可惧。”<sup>③</sup>而拉丁文要学习,则是因为“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文多源于拉丁文。西洋一切

① 《一日一谈》,“从震旦到复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7页。

②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29页。

③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1页。



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sup>①</sup>。

又以“文学”为例,马相伯说:“夫文学者,即以想像形容之力,使人人见以为可欲,可欲之等差虽万不齐,各就文所注重者鼓之舞之,以致其曲,以尽其神。”<sup>②</sup>在他看来,文学不仅可以培养人的想像力,而且能够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浸润人心,揉成风俗”<sup>③</sup>。

至于“哲学”,马相伯把它译做“致知”,称“致知学为一切理义学之根源,度数学为一切形质学之根源,故首重哲学,次算学”<sup>④</sup>。在他看来,哲学之所以重要,“重在事事物物,根寻其所以然而已”<sup>⑤</sup>。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素来贫乏,而哲学素质又是当代中国人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素质。因此,他特意编著哲学教材《致知浅说》,声称:

中国民族若果要救亡图存,发挥光大,一定要想法培植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夫然后才有民国共和可言。<sup>⑥</sup>

① 《一日一谈》,“蔡子民先生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5页。

②③ 《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9页,第140页。

④ 《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34页。

⑤ 《重刊〈主制群征〉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77页。

⑥ 《一日一谈》,“‘Being’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40页。



需要指出的是,马相伯所注重的人文主义教育不仅限于西方人文主义教育领域,还应该包括中国人文主义教育意蕴。他说:“古道德,即国魂也。魂寓于文,考之我国尤信。故振兴古道德,以提倡古学为宜。”<sup>①</sup> 他不仅具备广博的西学素养,中学根底亦十分深厚;西学与中学的汇合融通,才是马相伯孜孜以求的崇高学术境界。

## 五、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批判与继承

马相伯不仅受过西方教育的系统训练,而且有很深的国学素养。这种国学素养的形成固然可以上溯至其早年的私塾学习,而上海依纳爵公学对中西学的兼重则强化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辩证认识。然而,促使马相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做进一步的批判反思,无疑是当时社会现实复杂生活的折射。其中,民初袁世凯复辟帝制而导致马相伯对孔教及其专制封建主义教育的激烈批判,就颇具典型性。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不久,马相伯应邀进京担任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他本想通过参政促进政治民主化,但没想到袁世凯竟然满脑子帝王观念,不仅亲自率百官祭孔,而且授意康有为等人成立孔教会,欲定孔教为国教,公然提倡尊孔读经,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写入《宪

<sup>①</sup> 《为函夏考文苑事致袁总统条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9页。



法草案》。这一切,不能不引起马相伯的深切关注和思考。

依据民国《临时约法》有关信仰自由、人人平等精神,马相伯首先对一国元首主祭行为进行批评。他直言道:“孔有孔后以祀之,无元首主祭之必要。”<sup>①</sup>这是因为元首是全体人民的代表,是“五族五教惟一元首,非一族一教人所得而入主出奴之。”<sup>②</sup>若元首偏袒某一族一教,显然有悖于民国的“自由”、“共和”宗旨,不利于各宗教的平等相处和自由发展。为此,马相伯重申:“信教自由者,谓各相安于所信之教,而不受政府之横加干涉也,则不受他教之横加干涉也,更可知矣。”<sup>③</sup>

关于定孔教为国教,马相伯更嗤之以鼻。他说:“孔子之教,质言之,要不外教学之教耳,非西文所谓国教之教也。何苦效颦欧、美,而定实不中其声之国教者哉?”<sup>④</sup>在他看来,孔子之教不过是先秦诸学之一派而已,“如谓国不可以无教,我国万不能舍故有之孔子,而奉行外来之教,此犹言国不可以无法,我国万不能舍向有之法律,而仿定外来之宪法也。人纵顽固,当无敢出此言也。”<sup>⑤</sup>马相伯进一步指出,尊孔祭孔不但不能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平,反而使人们的道德境界严重下降。他引清末的尊孔例子,说:“清末尊孔升为上祀,庙未修竣,而清室不纲矣!各府州县,春秋二祭,文武百官未尝不奉行也,而人心日坏,风俗日偷,官为甚。”<sup>⑥</sup>

①②③ 《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6页,第147页,第145页。

④⑤⑥ 《书〈请定儒教为国教〉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49页,第251页,第251页。



此外,因定孔教为国教,还将导致扰民伤财,甚至榨取民财的结果。马相伯借“大毛子”之口说:

民国一二年,孔教中人已呈请包修通国文庙,约计可 2000 所,所各 1 万圆,是 2000 万圆也;日后岁修若干圆上下,是 200 万圆也。而各府州县,国教僧官之岁俸,与扩兴国教之岁费,尚不知如(疑为若)干。<sup>①</sup>

更有甚者,有人建议,可仿照西方教堂,凡是婚配者皆须至孔庙,每对收 4 圆,按全国 4 万万人数核算,“一年婚配者可 3000 万,应收 1 万万又 2000 万圆。”<sup>②</sup> 如此看来,定孔教为国教,不为别的,就为榨取人民的钱财。

至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马相伯期期以为不可。他分析说:

一者,孔子之道,志在《春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尊王攘夷之说久矣,灌输脑筋,通都大邑在所难免,而乡间尤甚,故初设小学时,有呼为洋学而焚毁之者矣。保清灭洋之举,非伊然尊王攘夷之道乎? 山东发其端,全国蒙其难,故用以为教育似不可。二者,孔子之道,学而优则仕者也,栖栖皇皇,席珍待聘。我国自有宾兴以来,士之仕也急于农夫之耕,“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sup>①②</sup> 《〈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236 页,第 236 页。



往往有辍耕而怅恨者矣，此古今所由大乱也。……三者，孔子之道，以学稼学圃为小人，又以货殖为不受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业之不讲，此我国之大愚也。<sup>①</sup>

在这里，马相伯确实触及孔子教育思想中夷夏之辨、读书做官、德上艺下等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显然不可能作为民国教育的修身之本。况且，“国民教育”乃是与“国士教育”相对应，传统国士教育以德育为本位，而近代国民教育则包涵德、智、体几个方面。马相伯说：

即以国民教育言之，教育有德育、智育、体育，德育则修身是矣，乃所规定，有德育无智育，是旧说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不可使知之，是专制时愚民之旧说也。设谓智育体育，亦以孔子之道为大本。试问此等智育体育，尚能立于20世纪之新世界乎？<sup>②</sup>

显然，“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与近代教育民主化和世界教育潮流是背道而驰的。

马相伯认为，孔子之道非但不可以做近代国民教育的修身之本，而且内藏专制封建主义遗毒。他说：

我有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

<sup>①</sup> 《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51～252页。

<sup>②</sup> 《代拟〈反对孔道请愿书〉四》，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63页。



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这是三纲五常，我中国所以为中国也。罢！罢！罢！春秋到孔子，只有更坏；战国到孟子，何曾好了？<sup>①</sup>

马相伯不认为孔子的学说是一种哲学，只是一种“极肤浅的伦理学”，称其“一生最大的功劳就在‘正名定分’，替宗法社会的封建制度做了2000年的‘叔孙通’。正名定分的流弊便率天下后世以伪相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说谎”<sup>②</sup>。这种说谎行为具体表现在“在朝廷则欺罔君上，在闾阎则欺罔小民，在家庭则父子相欺，夫妻相欺，不说谎便不能过日子”<sup>③</sup>。在马相伯看来，由于尊卑界限分明，等级名分森严，必然严重束缚人的个性发展：“所以，尊孔的结果不但要把活泼泼的青年方兴未艾的天性残折殆尽，恐怕连国民一点‘白刃可蹈’的反抗精神，也都消磨于‘规行矩步’之中了。”<sup>④</sup>

更为严重的是，尊孔与忠君总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致使国民“只顾自己旦夕之安”，不能合群以谋社会久远之利，从而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马相伯因为曾经怀疑皇帝也懂得做八股文，遭到私塾先生的训斥；然而，这一事例也使他认清了“一般服从孔子之教，诵孔子之言的戴方巾朋友”的深层观念心理。他说，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天王圣

① 《〈圣经〉与人群之关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220页。

②④ 《一日一谈》，“孔教所给与中国的影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9页，第1131页。

③ 《一日一谈》，“说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2页。



明,臣罪当诛’的心理。由这种出发,小百姓自然是应该受苦,应该把天赋的人权(自由平等)牺牲得干净的。所以,《大清律》上载有一条说:30人以上在一块聚会,即以聚众论,格杀勿论。一个国家弄得人民束手束脚,钳口结舌,对于国家大事不敢联合起来同负责任,任你政府少数人,有什么三头六臂,七手八脚,或是真像千手千眼的观世音那样,也无济于事,只有把国家败坏得不堪收拾”<sup>①</sup>。

除封建专制主义遗毒外,马相伯对儒家经学教育的繁琐主义和空虚主义也深恶痛绝。他回忆说:

中国的经学真是害死人!我从小时候,有一位经学家时时为我讲解经书,常常为了一个字,引经据典讲了两个钟头。他把从前各家对于这一个字解释一句一句地背将出来,甚至连这些经学家的名字都说得一点不错,却是对于我一点也不发生影响。……后来我翻了一翻经学的注解,为了《诗经》上的“采采卷耳”4个字足足地写了3本书。他们这些注疏都是在书本上兜圈子,在字眼儿上打滚,不看还可以,看了,反把人弄得头昏眼花。<sup>②</sup>

这种繁琐主义和空虚主义经学教育严重地脱离社会生活实践,极不利于创新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养成,与民主共和精神格格不入。

① 《一日一谈》,“说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3页。

② 《一日一谈》,“经学与月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24页。



值得注意的是,马相伯在抨击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时,并没有全盘否定其合理性成分。马相伯曾说:“所见而精,则问学也;所感而正,则德性也;学问自有愉快之一境。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以哉!”<sup>①</sup>又说:“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又曰:‘尚志’。大丈夫之不淫、不移、不屈,有所志故耳。……故不志则已,既志焉朝秦暮楚,非人矣。”<sup>②</sup>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对儒家治学、立志、大丈夫精神的赞赏和认同。对于孔子的人格,马相伯直言道:“孔子一生,很是高尚。”<sup>③</sup>对于孟子的文采,马相伯在《致陈垣》信中写道:“外国文撒劳曼格言外,从未见有孟子义多而词简者,不识高明以为然否?故不读古书,难与言文学矣!”<sup>④</sup>

马相伯在肯定儒家思想某些合理性因素时,往往注意到它与现代思想观念的融合,别求其价值新义。例如,他曾巧妙地利用孔孟言论来警示和批评政府。他说:

孟子有言:“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专制时代,君主不仁不义,不爱人民,且得谓之一夫,现代国家的政府更不待言!即单就“孝”之一字言之,政府自己对待人民如同仇敌,则所谓“视民如子”的父母政府,便是不

① 《北京法国文术研究会开幕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1页。

② 《家书选辑》,19,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14页。

③ 《乐善堂纪闻》,“祈望长生的上智光照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50页。

④ 《致陈垣》,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79页。



“慈”，不慈便不“孝”。孔子谓“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又曰：“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现代的为民上者却恰恰相反：“民之所好，恶之；民之所恶，好之！”无论用什么高明的化学家来给他们做定性分析，也找不出丝毫“礼教”、丝毫“孝弟”的成份！<sup>①</sup>

又如，马相伯十分注重“自治”对当代民主政治建设的意义，并善于从儒家经书里找到必要的理论依据进行深入阐发。他说：

《书经》上所谓“则君，所以自治也”。可见，自治本是古代国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君有可以做民之则的地方，始成其为君，民亦始认其为君。那么，所以立君，就是完成民众的自治，而不是如韩昌黎所谓“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儒家末流之极的必然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华北现在一种违乎国法人情之伪“自治”运动，遂并自治本身而痛恶之，因为人民若果不能自治，那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sup>②</sup>

有一次，马相伯借用孟子言论来激励革命党。他说：

<sup>①</sup> 《一日一谈》，“所谓‘礼教’问题”（续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65～1166页。

<sup>②</sup> 《一日一谈》，“中国人应该知道国家是什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2页。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这两节话皆是做革命党的必要条件。但前一节的三句话，并不是并排的，而是说要不为威武所屈，就要贫贱不能移；然而贫贱不能移，我们还可以做得到，至于富贵不能淫，便非有伟大的精神不能，所以，这一层工夫最难。以上三者都是消极的革命精神。但是若果不具这三种精神，便休想积极奋斗，所以‘人必有所不为’就是这三句的注脚。有了这三种‘不为’的精神，才可以做有为的革命奋斗。黄花岗七十二雄鬼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榜样！”<sup>①</sup> 其言辞恳切，催人奋进，座下军人感怀激越，无不深受教育。

当然，马相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发掘和继承并非仅限于儒家，也不仅限于经学。对于道家，特别是对墨家的平民人生观及其逻辑知识论，马相伯曾给予较多的肯定。他说：

庄子一派完全是一种消极的悲观哲学，然而他们的思想却有一部分超出孔子学说之上。……至于墨家反对孔子，却是从积极的人生观出发。孔子虽然镇日价要“正名定分”，但他所谓“名”与“分”，都只是替少数治人者设下愚民欺众的弥天大谎，禁不得人家从实处追问。所以，墨子对于孔子答叶公子高之问，批评他不知道怎样为政（即不

<sup>①</sup> 《一日一谈》，“辛亥革命后南京政府第一个黄花岗纪念日”，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95页。



知“所以为之若之何也”),并且笑话他对于问题不能追求所以然的原因,所以,《公孟》篇说他对于“何故为实”与“何故为乐”的问题,答得不知所以。至于墨家为社会一般平民奋斗的精神更非孔子所及。就逻辑思想说,墨子实胜孔子远甚。<sup>①</sup>

从马相伯对庄墨的评论中,不难体悟他对平民积极向上人生态度的赞赏,对逻辑知识、科学精神的重视。

事实上,马相伯不仅善于从理论上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精华,还能够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实际办学过程中。如,他手订的《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中就专门列条:凡投考者,“其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摒斥”<sup>②</sup>。

## 六、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与汇合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像马相伯这样既掌握多种西方国家语言又深谙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学者并不多见。况且,马相伯不仅了解西方语言文化,而且亲身体察过欧美社会生活,这就为其理性地审视中西文化教育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一,关于中西哲学。马相伯说:“哲学第一任务就是在教人怎样思想,而思想首先碰到的就是 Being 问题。”<sup>③</sup>中国人多把“Being”译做“是”、“在”或“存在”,这在马相伯

<sup>①</sup> 《一日一谈》,“孔教所给与中国的影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1页。

<sup>②</sup> 《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3页。

<sup>③</sup> 《一日一谈》,“Being 问题一”,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8页。



看来是不确切的，“因为必有物可指，然后才有是非，必先有，然后可以存在，或在”<sup>①</sup>。但中国人之所谓“有”往往又是具体之有，而“Being之有，乃赅括大宇宙之总体而言”。马相伯说：“哲学的任务在追求 Being 的整体，不得已用中国语言，我们可以说，它是要知道‘全有’。”<sup>②</sup> 在他看来，人类知道了 Being 与 No-being，“才有了分别识；有了分别识，则万物万事才有能在我的意识中各从其类而加以适当的区分；有了适当的区分，则我对于此万事万物才有认识可言。人类自从呱呱坠地便渐渐养成此种需要，于是科学便应运而生”<sup>③</sup>。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一事一物下确切的界说——即所谓“分别识”，乃是哲学思维的起点。

以孔子论孝为例，马相伯说，孔子对于弟子问孝常给予不同的回答，这种情况往往被赞誉为孔子善于教人；但他则认为，“孔子答人问孝各有不同，是否是他善于说教，我们暂且可以不管，然而孔子本身对于孝之一字究竟做何解说，始终没有告诉我们。‘孝’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应该‘孝’？这些根本问题，见他老先生皆没有解决。他所言者，大都是应付一时的话，而没有解决人生根本问题，有什么哲学思想可言？”<sup>④</sup> 至于老子的“无名”、“有名”之论，马相伯说：“中国的学者以有无为对待，这是错的。就西洋哲学说，Being 与 Non-Being 为对待；就是说：有与非有为对待，而不

<sup>①③</sup> 《一H一谈》，“Being 问题一”，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39 页，第 1139 页。

<sup>②④</sup> 《一H一谈》，“Being 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39 页，第 1140 页。



是有与无为对待。因为 Being 固然是有,而 Being 之否定也是一种有,即 Being 而不是无。因为任他什么天神,绝对不能从无生出有来。”<sup>①</sup>

与中国哲学不同,马相伯指出,希腊哲学“从柏拉图已发其凡,到了亚理士多德,便给我们形成一个研究哲学的方法,即逻辑学,因此也就第一次给我们形成一个哲学体系”<sup>②</sup>。诚然,不能说中国先秦完全没有逻辑思想,马相伯承认孟子已表现出逻辑思想的萌芽,而“荀子的《正名篇》有许多话已经提出逻辑的大本源”,但他断言:“他们却没有力量给我们写出一部像亚理士多德的 *Orgawon* 那样有系统的方法论。”<sup>③</sup>

其二,关于西方学术概念的本土化翻译。晚清民初,是西方各种学术概念大量输入时代,如何准确地翻译西方学术概念,特别是某些重要的学术概念,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学术精神的建立。对此,马相伯有自己的独立探索与思考。他说:“我所用的术语都是取自中国的古籍,因为中国的古书上有许多名词,实与西洋哲学上的名词相吻合。”<sup>④</sup>

以“Philosophia”为例,马相伯主张将其译为“致知”,他说:“《大学》朱注:‘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殆即西庠所谓 *Philosophia* (非牢骚非阿),译言爱智学者欤!盖希腊国文,‘骚非阿’言知,‘非牢

<sup>①②③</sup> 《一日一谈》,“Being 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40 页,第 1140 页,第 1138 页。

<sup>④</sup> 《一日一谈》,“孔教所给与社会的影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30 页。



士’言爱。世纪前3世,其国七贤之一 Aristoteles(阿理是道)博学多知,王亟称之。对LI:多知何敢云?云爱知耳。后人遂以‘爱知’名其说,说见《名理探》。窃谓惟其爱也,故欲推极之。和译‘哲学’,似泛。况致知章既亡,则礼失而求诸野,正可取西庠之说以补之。”<sup>①</sup> 遗憾的是,马相伯这一极具本土化的译法并没有被当时学术界所采纳,社会上通行的仍然是日本人借汉语创造的译法——“哲学”。

又如,西洋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学术概念——Substraction,日本人将其译做“抽象”,马相伯则主张“用古书上‘摘其象’的‘摘’字而名之为‘玄摘’”。他解释说:“所谓玄摘,就是把我们所说的某种事物之属性或物德提要钩玄,于万有不齐中观其会通,于一般现象中分别差别,则‘玄摘’一词实犁然有当。我们自己本有适当术语,何必拾人唾余?”<sup>②</sup>

再如,西洋社会学中的 Negatiu 与 Nositu,这两个术语曾被译为“消极的”和“积极的”。马相伯说:“这种译法是抄袭日本人的,实在不恰当。”<sup>③</sup> 主张改译为“饰”和“增”。他说:“《礼记·礼器篇》说:‘饰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照《逸雅》说:‘饰,拭也,物秽者,拭其上使明,由他物而后明,犹加文于质上也。’所谓‘回’,就是‘奸回’之‘回’,恶德也。饰回,就是荡涤旧染之污的意思。所以,我现在决定用‘饰回’之‘饰’来译 Negatiu,用‘增美’之‘增’来译 Nositu。……”

① 《致知浅说·小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36页。

② 《一日一谈》,“Being问题”,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38页。

③ 《一日一谈》,“再谈国家”,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6页。



我们对于‘饰’和‘增’的两种作用看得一样重要，并且相须为用，缺一不可，没有‘饰’的作用，便不能有‘增’的作用。譬之人身：四肢百体的细胞一天一天地‘除旧布新’，就是说，一方面旧的老的细胞，已不能适应自然，不得不死去，不得不排除，而另换一些新的少的细胞继续整体的生命。排除旧的老的，便是‘饰’的作用，即西语所谓 Negatiu 的作用（亦所谓‘消极的’作用）；布置新的少的，便是‘增’的作用。”<sup>①</sup>显然，这样的翻译既贴近原意，又突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可谓一举两得。

其三，关于中西治学方法。马相伯做过扼要的比较，他说：“从学术的研究上讲，我国书生，埋头书本，尚纸上空谈。从前《大学》中所谓‘致知格物’的方法是失败了。欧西科学，重在实际，事事要实验成功！”<sup>②</sup>

马相伯十分赞赏《大学》中“致知格物”说，认为格物之“格”可“途为分格：分格书类物类品类，而穷其理也”<sup>③</sup>；并称荀子的“知通统类”，“此稍涉科学者所尽知也”<sup>④</sup>。但遗憾的是，《大学》中“致知格物”所包含的科学精神并没有得到后人的深切理解。他分析说，朱熹所作《格物补传》，“与无所补同，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此人所尽知者也。至谓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不思天下

① 《一H一谈》，“三论国家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7页。

②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6页。

③ 《致知浅说·小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40页。

④ 《致知浅说总序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738页。



之物,万不胜万,欲一一即物而穷之,如何能?阳明氏受其愚,欲看竹之长,费时7日而不堪,然犹幸其不堪也,不然,虽费7年,亦无望豁然之一日”<sup>①</sup>。其实,朱学之弊在于把外物之理视为“天理”的投射,并特别提倡通过读经书去体悟圣贤相传的永恒之理,从而把学生引向记诵之学,其末流者更是以清谈相尚,脱离社会生活实际。马相伯批评说:“宋明理学,天即理,性即理,谈来谈去,连一个名词都纠缠不清楚!如言‘君心正则国治’,不知君心正以至于国治,中间要有多少治国阶段!一个‘则’字,谈何容易?尚清谈,少实质。讲理学的尚且如此糊涂,其他更不问可知了!”<sup>②</sup>

马相伯认为,记诵清谈绝不可能致知明理,称:“理悬于天地,而系于心。故明理之功,贵寻思,贵细绎,贵体味,贵反求,尤贵自难肯明辨,所谓思则得之,学乃有获也。不贵师承,不贵考据,不贵譬言多而实理少。不贵繁引群籍之言,名贤之论。尤不贵多所涉览,而不能一以贯之。甚或望文生义,牵合寡通。信乎记闻之学,以之为修辞犹可,以之为致知,则大不可。”<sup>③</sup>然而,长期以来的经学教育致使“中国人不但懒于行动,尤其懒于思想”,“只重记忆……只知依样葫芦,等于只知贩卖,不愿创造”<sup>④</sup>。

依据如上分析,马相伯极力要求输入西方科学方法以

① 《致知浅说总序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738页。

② 《乐善堂纪闻》,“准备招待国联调查的一席话”,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22页。

③ 《致知浅说·小引》,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641页。

④ 《一日一谈》,“谈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5页。



补吾之不足,期望“青年诸君,今日在校求学,必须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能如是,然后乃能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必有‘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乃能实际应用,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此则青年诸君所应肩负之责任也”<sup>①</sup>。

其四,关于中西数理。马相伯沉潜反复,颇下过一番苦功夫。他说,自己曾“一方面研究西洋的数学,一面研究中国的数学,如开方、勾股,等等。初学时甚为艰苦,中国算术中的开方中有所谓‘赤方’、‘王方’,当时我简直莫明其妙,后来不知道在一本什么书上,看到这种算法,始得理解”<sup>②</sup>。

通过对中西学的比较研究,马相伯发现,“中国的‘勾股’,就是西洋数学当中的微积分;而中国之所谓‘方程’,就是西方数学当中的比率。……‘少广’就是西洋数学上的Extension”<sup>③</sup>。以“少广”和“Extension”为例,马相伯进一步阐发道:“Extension 义云‘扩大’,‘外延’,‘伸张’,又曰‘广袤’,在数学上则为以长度,阔度,高度,加上时间(故称之为四度空间),以测算物体的方法。中国数学上的少广,也是推算从小推而广之的数目,物体或时间的。……所以,译Extension 为‘少广’,以余之意,再恰当没有了。”<sup>④</sup>

又如,“天圆地方”说。马相伯从数理角度做了精密分析,他说:“就我研究中国数理的结果看来,深知道,此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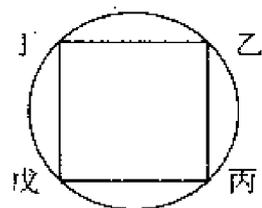
① 《新年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12~913页。

② 《一日一谈》,“我的幼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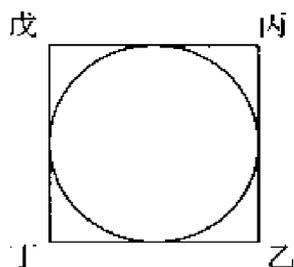
③④ 《一日一谈》,“中西学术的谈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83页,第1083页。



法,并非断定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是用它来测算圆周的。譬如甲图,……即在甲圆周内做乙丙丁戊四边形,因四边形而求圆周与其四面。或如乙图,在乙圆周外做丙丁戊己四边形,因四边形而求圆周及其面积亦同。”<sup>①</sup>



甲图



乙图

马相伯指出,古人并不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而是如上图所示,强调“因圆求方”的数学关系。马相伯继续说:“一班迂儒,拘泥文字,食古不化,遂把天圆地方解得不通,真是害人不浅。”<sup>②</sup>

特别令马相伯感到惊奇的是,中国人算圆周的方法竟与西人不谋而合。他说:“西人算术求圆周的率是 3.1416,而中国的圆周率是  $2/7$ ;  $2/7$  的数与 3.1416 一样的。”<sup>③</sup> 中西数理的研究与沟通,给马相伯带来了许多乐趣,他一度着迷得几乎发狂,以至于“夜间睡觉的时候,仰视帐顶上,都隐隐约约,闪闪灼灼地出现了许多数目字,梦中也发现到处都是数目字”<sup>④</sup>。

其五,关于中西艺术表现。马相伯认为,也有许多明显

①②③ 《一日一谈》,“谈屑”,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127 页,第 1128 页,第 1128 页。

④ 《一日一谈》,“我的幼年”,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84 页。



不同。以建筑艺术为例,他说:“中国的著名建筑物,地基要高敞,范围要博大。以前圆明园,就是这般情形。欧西的式样,如所谓哥梯克,如此高峻,迥乎不同。”<sup>①</sup>又如绘画艺术,他强调中西绘画艺术各有特点,“西崇实地,中崇虚神”。具体而言,“中国画,三笔两笔的描写,名家便能传神,好像带哲学的意味!墨井称它叫‘神逸’。其实,都是虚描,画人面,不必耳目口鼻俱全的”。与之相反,“西洋画有时很古怪:画个人头,描个鱼身;像埃及的女首狮身的建筑物,也要称为一伟大的艺术。我们看去,并不觉得有何意义”<sup>②</sup>。马相伯认为,中西绘画各有优长处,应该加强交流,共同进步,互相传习,“且看将来竞赛的结果,在画史上谁占优胜些”<sup>③</sup>。

其六,关于中西政治。作为中国近代史见证人,马相伯深知国家的苦难与屈辱,这就迫使他中西政治做更透彻的理性思考。他说:“原来中国和西洋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中国的政治是闭关政治,西洋的政治是殖民政治。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闭关,所以,皇帝不许人民有一些国家思想,直到现在连党政府不许人民干涉政治。因为中国是闭关政治,所以,一般人只知道巴结一个皇帝,其他一切都一概不问。直到现在,一般政客还是充满着皇帝思想,只知道争无上的权柄。”<sup>④</sup>在他看来,殖民政治下的西洋人很早就

①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5--566页。

②③ 《乐善堂纪闻》,“从刘海粟谈到中西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35页,第1035页。

④ 《六十年来之上海》,“殖民之治与闭关之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41页。



具备“开疆拓土的精神”，也知道“保守国土的观念”；而闭关政治下的中国人，“不但没有国家思想，更没有爱护国土的观念。人民只知道种田，完粮给皇帝，而皇帝也只知道穷奢极欲，享受他一人的天下。现在不知道有多少多少贪官污吏都是官气十足，无非是皇帝架子的缩影”<sup>①</sup>。

马相伯进一步指出，由于国民爱护国土的观念非常薄弱，因此“一有外患就弃土而逃，绝无守土而战的思想”。在他看来，近代上海的发展离不开外来移民的智慧与贡献，而这些来沪移民有相当部分是外患内乱逼迫所致。马相伯痛心指出：

中国人只知道没命地逃，内战时没命的逃到上海，外患时也没命的逃到上海，于是上海就一天一天发展起来。上海的繁荣就是西洋殖民之治和中国闭关之治激荡冲击的结晶。一部上海的繁荣史，就是一部中国的伤心史。<sup>②</sup>

有鉴于如上分析，马相伯认为，改善中国政治就是要打破闭关思想，从民治做起，让人民知道政治是自己的事，土地是自己的土地，保护和建设好自己的国土，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职责。他说：“中国要造成农工的大家庭，用科学的精神组织一番，务使对内有警察，对外有国防，时时刻刻拿我们

<sup>①</sup> 《六十年来之上海》，“闭关思想的中国，皇帝思想的中国”，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42页。

<sup>②</sup> 《六十年来之上海》，“没命的逃和上海的繁荣”，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43页。



生且居的土地保护好。”<sup>①</sup>

综上所述,马相伯对于中西文化教育许多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比较研究,提出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其实,中西比较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厘清彼此的优劣,而是要在认识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有机汇合与再创造,以寻求中国文化教育发展之新路。马相伯曾引吕东莱的话说:“为国者当使人依己,不当使己依人,己不能自立,而依人以为重者,未有不穷者也。”并发挥道:“今依东以拒西,依西以拒东,两者孰是?要非自立之道,为国之道。”<sup>②</sup>

就教育而言,马相伯深知 20 世纪中国急需输入西方近代先进文化课程,同时也明确指出:“功课宜合国情,而教授法尤应合人心理。”<sup>③</sup> 就文化而言,马相伯说:“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有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如果一律都要数典忘祖,老夫认为很可痛哭!”<sup>④</sup> 在他看来,当代中国固然必须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但必须在与本国文化相沟通的基础上去寻觅“文化增进之路”。他说:“如《大学》所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先修己,再立人,而追求‘至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实行不断努力求进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国民成为彬彬有修养的

① 《六十年来之上海》,“闭关思想杀了老百姓”,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544 页。

②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369 页。

③ 《致陈垣》,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378 页。

④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566 页。



人,然后大众促进国家日臻文明!……申言之,文明古国,要有‘世受国恩,义同休戚’的国民,不计算那什么古物,更不是常那‘暴发户’!譬如:珊瑚岛的成功,是由无数珊瑚日积月累的!文化增进,循此正轨必由之路的发轫点,正在我们青年,承继文化遗业,再往上增进的!”<sup>①</sup>

<sup>①</sup>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7页。



第  
七  
章

## 国难中的民族精神与教育文化使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沈阳,并同时向吉林、黑龙江发起军事侵略。这一危及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九一八事变,深深地激怒了全国人民。此时,马相伯已93岁,但他不顾年迈,以“百岁青年”的雄姿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发表了一系列颇具感召力的抗战言论,公开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主张民治救国,坚信人民力量,努力唤醒国人的爱国热忱;参与组织进步团体,救助抗日爱国人士,高扬爱国主义精神;阐发国家民族精神,提倡国难教育,引领青年前进方向,重申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凡此种种,都极大地鼓励了全国



人民的抗战决心和信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爱戴,被中共中央赞誉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逝世的消息传来,举国顿成泪海,山河为之同悲。

## 一、发表抗战言论,批评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第3天,马相伯即应中国民间学术团体——“日本研究社”邀请,参与该社理事会,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言论。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研究社启事》中写道:今日本“以武力囊括我东北河山矣。噩耗传来,天地变色!国家危难至斯,诚达极巅”。为了知日抗日,他强调“今后宜更进一步研究,力求明彼国情,共谋抗御”;声称“虽自顾老迈,亦愿勉励负一部分责任”<sup>①</sup>。自此往后,马相伯便以过人的精力在其栖居的上海土山湾“绿野堂”不断接受记者采访,先后进行12次广播演说,发表许多发人深省、催人奋进的抗日言论,“绿野堂”成了中国人民坚决抗日的一个重要民主堡垒。

揭露日本侵略者种种穷凶极恶的野蛮行径,是马相伯抗日言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相伯认为,日本犯我之心由

<sup>①</sup> 《乐善堂纪闻》,“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研究社启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23页。



来已久,“自 21 条提出,济南惨案发生,其野心更已露骨表现”<sup>①</sup>。他说,日本因明治维新成功而“自负东亚大国民,东攘西夺,已非一日。其处心积虑,以谋占我东三省诸领域,兹近 30 年,专家设计,秘密进行”<sup>②</sup>。此次日本侵略者“不仅强占我土地,甚且对于男女老幼都视同草芥,以屠杀为快意,枪射炮轰,不惜随处演出至极残酷之惨剧”<sup>③</sup>。在他看来,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不仅表明“有强权而无公理,并可说有强权而无天理”<sup>④</sup>;声言“吾人称日本为国际大盗殆无不当”<sup>⑤</sup>。为了唤起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马相伯特别指出,日本侵略者的险恶用心不只要占领我东北,吞并我中国,同时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希望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正义事业。他说,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今日可施之于中国东三省,安知他日不依法炮制,对付英美德法诸国乎”<sup>⑥</sup>。

值得注意的是,马相伯的抗日言论不只限于对日本侵略者野蛮行径的一般揭露,而是理性地审察日本侵略者得手的深层原因,公开批评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1931

① 《乐善堂纪闻》,“九一八事变后为日本研究社启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23 页。

②③ 《为日祸敬告国人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01~902 页,第 902 页。

④⑤ 《泣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05 页,第 905 页。

⑥ 《上海(民力周刊)载马相伯先生谈话》,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03 页。



年10月28日,马相伯接受上海《民力周刊》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日本侵略者敢公然冒犯中国,掠我国土,杀我国民,“说来说去,还是怪我们自己不争气;天演公例,优胜劣败,人家都向着好处走,我们偏向着坏处走。日人与苏俄接壤,不敢欺侮他,而独欺侮我,自然是中国有可欺之道。凡事不要钱,不要命,都有办法。这次日人升堂入室,就因一班军人要命,抱不抵抗主义,开门揖盗的缘故”<sup>①</sup>。

马相伯公开承认“我们自己不争气”,并对开门揖盗的“不抵抗主义”痛加谴责。从表面上看,“不抵抗”只是一班军人贪生怕死,但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腐败及其不抵抗政策。马相伯批评道:

对内徒言镇静,高唱不抵抗;对外亦徒乞灵于木偶之国联,陈诉呼吁,捉襟见肘,穷态毕见。学生诸君,赴京请愿,一而再,再而三,络绎而去,络绎而返,除照例听得“中央已有准备,已有最后决心,人民信任政府,拥护政府之教训”而外,东北失地,固犹是也!日寇猖獗,固犹是也!而国内之分崩角逐,亦仍犹是也!政府无能出兵,无暇出兵,无决心出兵,盖为显然之事实!<sup>②</sup>

马相伯进一步指出,日本只有8000万人,而中国有4万万人口,称“5倍大的中国,碰到只有自己1/5的日本侵略,竟不

<sup>①</sup> 《上海《民力周刊》载马相伯先生谈话》,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03页。

<sup>②</sup> 《泣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06页。



敢出来抵抗,这叫做‘缩头乌龟’。可是,缩头做乌龟的,是政府而不是人民。人民要出头抵抗,政府还要压迫呢”<sup>①</sup>。马相伯愤激之余,直斥蒋介石:“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sup>②</sup>

在日军得寸进尺、步步环逼的危急之际,蒋介石政府却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摇尾乞怜于“国际联盟”组织,马相伯对此深恶痛绝。他敏锐地指出:

国联之为物,本与日本同其臭味,同其实质,眼看日人之攫得我东北半壁山河,大好宝藏,其食指早已怦怦然动,早已有染指于鼎分一杯羹之打算。我与虎谋皮,问强权以公理安在?是诚为世之大愚,是徒自取屈辱,自貶伊威!不求自助而求助于人,欲以此而侥幸立国,此种心理,诚为亡国之象征,诚为极可痛心之现象!<sup>③</sup>

以递交“国联”的《李顿报告书》为例,他指斥该报告,对于“日本早已公开之侵略事实,反讳言之!……对于我方,越出调查范围,称抵制仇货为一国际法之问题;对于彼方,种种非法作战之举动,如用飞机轰炸大都市,施用达姆达姆弹,奸污妇女后又杀害之,俘虏加以凌迟等等,不胜枚举;破坏人道主义,影响人类恐慌,反认为不成问题,宁非所谓‘不可思议’,尚可称‘调整’两字之报告乎?”<sup>④</sup>如此颠倒黑白

<sup>①②</sup> 《救国谈话》,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6页,第597页。

<sup>③</sup> 《泣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05~906页。

<sup>④</sup> 《关于李顿报告书意见》,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38页。



的“李顿报告书”，绝非出自事实与公正，而是列强外交政策的延伸，实与日本侵略者同一声气，臭味相投。马相伯说：

国联之权利，不过根据天理人情；其实施，只在运用盟约。今国联既不根据盟约制裁日本，在事实上已明证其坐观成败。而该团报告书，反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宣言，依照顾问会议所提办法，组织一种特殊制度，治理东三省”。异哉所谓特殊制度，不啻列强共管而实委日本治理，真胡展堂先生所谓“我人在根本上认为绝不必要”者，老人且认为“绝不该要”者！……此报告书惟一价值，即欧美列强传统外交政策，共同协调，制成方案，非我所需要，亦非所应接受也！<sup>①</sup>

为了集中全国力量共同打击凶狠的日本侵略者，实现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马相伯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个月，就以超党派身份号召国人“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说：

嗟我民国主权在民，所望真正民意，彻底充分表现，立息内争，共御外侮！……惟最令痛心疾首者，我国今日，尚在勇于私斗，而怯于公忿之状态中耳！希望今后非国民之公意，对内绝对不多枉费一枪弹，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我国民其

<sup>①</sup> 《关于李顿报告书意见》，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38～939页。



猛省，我国民其亟起！<sup>①</sup>

由于长期遭受封建专制主义重压，国民的国家观念薄弱，加之日军残酷镇压的外力冲击，国民性弱点暴露无遗。为此，马相伯敬告国人要纠正3种不良心理：

其一，曰纠正武人富贵自保之心理。马相伯指出，今南北军事领袖之所以按兵不动，其心理“无非惴惴自保之一念：保富贵也，保名位也，保地盘也，保其子女玉帛之享乐耳”。然暴日之下，此“自保”非但不能实现，抑且使军事领袖之威权“扫地无余”。他说：“为今之计，只有认定天命，克尽天责。暴日逆天理，灭人道，残杀我同胞妇孺无算，我军人应抵抗，义不容辞，责无旁贷，争回我同胞之天赋人权，不容暴日之惨无人道以亡我国，兼灭我种也！卫国而死，死得其所！”何况前军将领顽强抵抗之际，必将得到全国人民竭力救援，他号召军人务必“及早为人道民族而做最后之抵抗”。<sup>②</sup>

其二，曰纠正文人苟且偷生之心理。马相伯对某些文人“竟主张迁就事实，退让谋和者”进行激烈抨击，并斥之为数千年专制统治的遗毒。他说：“此种苟且偷生之心理，苟不根本铲除，则亡国之后，所谓学者，亦只自陷于元代‘九儒十丐’之境地；然后始觉其非也！此数千年专制之遗毒！外族入王，文人学士，歌颂功德，仁王圣君，三跪九叩，毫不为

① 《为日祸敬告国人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02页。

② 《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30-931页。



耻！至今俘虏政府傀儡人物，尚有大唱其王道思想者。”<sup>①</sup>有鉴于此，马相伯特别强调要在国难中唤起国人的人性尊严和民族意识，“知天生烝民，我非奴隶；一切人民，同一造物所生，故生而平等；人类之尊严，即建于此种平等人格之上。我不必向列强乞怜，我更不受暴日支配；宁为玉碎，毋为瓦全”<sup>②</sup>。

其三，曰纠正国人过于悲观或乐观之心理。由于天灾人祸迭相骤至，有人发出“中国无救”的悲观论调，甚至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对此，马相伯下一转语：“若遵天理，中国不亡！”但又反对过于乐观，盲目轻敌，未能在实际行动中奋力抵抗。他解释说：“惟我此说，非如一般过于乐观者，引勾践尝胆以自况！此殆不知古今亡国灭种之异趣也。越虽尝亡于吴，吴未灭其文化，灭其人种，灭其土地生存等权，故越得10年生聚教养，能复国而复仇也！今也不然，日本之对待台湾、高丽，其惨史明明白白，写其亡国灭种之惨！故目前不奋力抵抗自卫，而预期日后之复兴雪耻者，实痴人说梦之类耳！”<sup>③</sup>在他看来，过于悲观和过于乐观都无益于抗日，称：“过于悲观，其弊自馁；过于乐观，其弊自娱；吾人执中，力图自救！国人自救，此其时矣！”<sup>④</sup>

马相伯相信，只要政府下定抗战决心，国人同心协力，军人同仇敌忾，全民抗日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他以教育家和宗教家双重身份，满怀激情地寄语国人，称：“国内英

<sup>①②③④</sup> 《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31页，第931页，第932页，第932页。



豪, 鉴此丹忱, 倘因此而益激发其爱国家保种族之天良, 则是心祷心祝久矣! 余深信创造世界之大父母, 不欲将老大之中国, 亡于暴日之手; 敢唤醒亿兆同胞, 各尽天责, 踊跃输将, 竭心力, 贡财力, 拥护卫国英雄以抵抗到底, 终必见暴日屈服于天理人道之下! 吾人其仁望此胜利之一日, 吾人其奋斗以图实现之!”<sup>①</sup>

## 二、主张民治救国, 坚信人民力量

作为中国近代史见证人, 马相伯洞悉国情民性, 深知长期闭关主义专制政治是国民性懦弱的根本原因, 批评有些人“不但没有国家思想, 更没有爱护国土的观念”; “一有外患就想弃土而逃, 绝无守土而抗的思想”<sup>②</sup>。但另一方面, 马相伯又相信人民的力量, 称人民为“国家柱石”<sup>③</sup>, 抗日“救亡惟有赖于人民”<sup>④</sup>。马相伯认为, 只有善待人民, 让人民知道自己是一方国土和整个国家的主人, 才能有效地激发起人民群众持久的爱国热情。换言之, 只有实行民治, 才能挽救中国。

所谓“民治”, 可以说是马相伯融会了中国传统“民本”与西方“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他说:

① 《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 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 第 932 页。

② 《六十年来之上海》, 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 第 541~542 页。

③ 《致复旦大学学生书》, 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 第 592 页。

④ 《苏联对中国毫无野心》, 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 第 594 页。



民治云何？曰整个人民自体自身，自出财力，自出心才，以自治；将劳心劳力融成一个我古代人民俭勤化而已矣。——大抵不外乡党则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国内则皆愿出于其途，藏于其市，水火工虞农牧，又皆能以科学智，利用土地，而通功易事焉。<sup>①</sup>

即是说，人民是民治的主体，传统道德精华与现代科学文化则是民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理论渊源而言，马相伯说：

我谈民治，还是我自古相传的民为邦本政策。宋苏辙在他著名的《民政策》文中，就有过很好的说明。略引几段：“王道之本，始于民之自善，而成于民之相爱；而王者之所以求之于民者，其粗始于力田，而其精极于孝悌廉耻之际；力田者，民之最劳，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妇之所不悦！疆所最劳，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劝所不悦，而使之有相爱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于民，其亦深矣！”我主张人民自治，就是人民自喜，彼此相爱，来问政治的，因为政党能替人民设计，难道人民反不能自动来组织么？<sup>②</sup>

显然，马相伯十分注意阐发我国的“民本”传统，崇尚“十室

<sup>①</sup> 《国难人民自救建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14页。

<sup>②</sup>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三次广播演说：民治从乡里组织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73—974页。



之邑，必有忠信”遗训，强调民治的基础在于民间乡里的文化道德组织。在实际操作中，马相伯则要求将西方民主精神与中国民本思想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创新。他说：

余倡民治，虽亦采取欧西德穆克拉西学说之精义，如主张“神我”、“形我”之宪法，保障人民之受赋自天之人权；然论方略，实源渊我国有之民政，如苏子由所论者，从民间组织起，由乡县保甲始。联数县为郡，联数郡为州，然后始有所谓“州联”。是以将现行省制根本改组，故不同于联省自治之主张。<sup>①</sup>

对于这一糅合中西文化的“民治”主张，马相伯十分自信。他说：“总之，一方保有古代民政良策，一方兼采欧美民治设备，总算尽了新中国民治的能事！”<sup>②</sup>

为了贯彻民治精神，马相伯认为，有必要迅速结束国民党训政而开始宪政，并制定宪法。他强调：“宪法草案，必需明白规定对于人民、政治、土地三大原则。”其中，对人民的受教育权利颇为重视，他说：

人民职业，十之九为生产者，十之一为生产之指导者。析言之，农牧居十之七，工虞十之二，专门技工与公务人员十之一。准此，人民应受职业教育之训练。各县分立农工商专科学校，州郡联

① 《兴国大计答客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34页。

②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三次广播演说：民治从乡里组织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74页。



### 合设立大学。<sup>①</sup>

此外,马相伯对于人民的身体自由权、财产所有权、居住权、营业权、言论刊刻集会权、信仰“无邪法害人”之宗教权以及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均一一予以关注。同时也指出,国民也有其应尽的义务,“男子,年18至40,有担任征兵之义务;18岁后,或中学毕业后,有练习1年兵操之义务。女子,18岁后,有练习护伤及修理军器之义务”<sup>②</sup>。

至于国难当头,马相伯认为,每个国民随时都秉承有保家卫国的神圣义务。他说:“目前急务,莫切于民治。人民自治,即所以自卫,自卫必乐输财力,共纾国难。民不用命,当法古人,以兵法部勒子弟。盖习兵法,乃有探险冒险之精神,与运用体质之精力。士农工商,不废其业,而举国皆兵。我中华人民应奉‘民胞物与’之训,一心一德,以抵抗天灾之洪水,与人祸之猛兽!”<sup>③</sup>

马相伯特别指出,民治的关键在于以人民利益为重,做到“以德服人”、“为人民谋福利”。他说:

为政之道,在于以德服人,而不在于以力威人。所谓以德服人者,一言以蔽之,即使民能安其生之意。民不聊生,甚且恶生乐死,威将安施?……政府应培植民力,俾能自治。政府为人民之公仆,而不应塞人民之聪,掩人民之明,而强其视,

<sup>①②</sup> 《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法以纾国难(附刍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24页,第923~924页。

<sup>③</sup> 《马相伯痛谈国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20页。



强其听。能如是，政府乃真为人民之政府，真的人民自己的政府，乃真能为人民谋福利，而政府乃能博得人民之拥护与爱戴。反之而不能为人民谋福利，是断不为人民自己之政府，而与政府打成一片，是何能得？故今日急应厉行民治，实行民主，俾民能自助自救。<sup>①</sup>

在他看来，政府固然要注意为人民办事，而人民应该积极参与政治，强调要“使人民知道政治是自己的事，土地是自己的土地，然后可以养成爱护国土的观念。有了民治，然后可以没有汉奸”<sup>②</sup>。马相伯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夺回国土，自卫自救，称：“东北人民的义勇军即是自卫自救的例。如果能照民治实行办法，从乡里着手组织起，那么，收复东北失地，恢复中国荣誉，都靠我们同志的努力做去。”<sup>③</sup>

### 三、组织进步团体，开展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不仅经常接受记者采访，发表抗日言论，设计救国方略，而且亲自参与组织抗日进步团体，从事实际抗日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马相伯联合同志在他

① 《双十节献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57页。

② 《六十年来之上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43页。

③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三次广播演说：民治从乡里组织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75页。



的寓所发起成立“江苏省国难救国会”，到会者有赵竹君（公子叔雍代表）、唐蔚兰（公子谋伯代表）、陈陶遗、沈信卿、穆藕初、金侯城、朱德轩、蒋竹庄、黄任之、陈彬、朱志尧等 20 余人。马相伯慷慨陈辞，称：“国难至此，我人出而救济，义不容辞；但救国须先自救，天主十诫，即是自救最好的信条！”他从军阀腐败谈到科学落后，以至于国难当头，希望国人“快快奋起救国，怕将来懊悔不及。国民人人秉着良心从事救国，国家方有希望”。整个演说历时 1 个小时，“态度激昂，听者感动”<sup>①</sup>。

1932 年初，马相伯和熊希龄、章太炎等人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致电蒋介石等政府首领，称：“最近暴日犯锦，长驱深入，关外义勇军纷起杀敌，美国且严重抗议。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诸公均称党国首领，乃亦散处雍容，视同秦越，亡国现象，一时齐观，夫复何言！”<sup>②</sup>

1932 年 11 月，马相伯发起成立另一抗日组织——“不忍人会”，并委托天津《益世报》代为筹募钱物，以救助东北被难同胞和前线将士。他引孟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侧隐之心”，喻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并称：

此不忍人之心，实即为生命之活力。惟不忍

<sup>①</sup> 《马相伯先生讲救国信条》，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10～911 页。

<sup>②</sup> 《与熊希龄、章太炎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通电》，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535 页。



故能爱人，亦惟不忍，乃能发扬其生命之伟力，以表示人类不甘为奴隶之心。今日我前线将士之所以出死入生，与强敌做艰苦之奋斗者，无他，亦即不忍我民族横遭蹂躏宰割之故；然则，吾人宁独忍坐视前线将士艰苦奋斗，而不予以援助乎？又宁独忍坐视民族遭受强寇之侵袭，而不奋起抗救乎？故国人今日在另一方面之工作，又应充分发挥其不忍人之心，以赴汤蹈火之精神，予前线将士以物质之补助与精神之安慰，以鼓励其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之勇气。<sup>①</sup>

不忍人会成立后，受到国人广泛重视和支持，很快“募得大批现款、棉衣，悉数移交天津市各界救国会”<sup>②</sup>。

为了筹募到更多的钱物以支持前线抗日，马相伯倡议开展“一人一日一铜元”义捐活动。马相伯指出，“一人一日一铜元”之国民义务捐款的目的：“第一，表现全民合作，与义勇东北军共赴国难的精神；第二，证明我国势不可侮，因为一人一铜子，一天就有四万万七千万。若是拿同一的精神，努力自救；那么，日本野心侵略最后只有失败！”<sup>③</sup>此外，马相伯还建议开展如下各种特捐活动，并做详细说

① 《〈华封老人言善录〉附载》，“马相伯章太炎沈信卿通电”，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14页。

② 《〈华封老人言善录〉附载》，“谈‘不仁人会’之发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11页。

③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八次广播演说：全国同胞捐助东北义勇军”，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90页。



明<sup>①</sup>：

一曰游艺捐，指在各种游艺会场者，自动捐助若干，或按抽娱乐税率办法亦可。

二曰拒毒捐，指黑箱中人，努力自戒烟瘾；先从每日少吸一筒两筒始；既利己，又利人，节费捐助，何乐不为？

三曰奢侈捐，指妇女少擦一次香粉，少用一瓶香水；青年学生少涂司丹康，少穿件洋服，即可多捐。

四曰节省捐，家居少吃一两样菜；店家少扣点小账；略事节省，可捐不少。就是小学生小孩子，也可节省糖果饼费。

五曰烟酒捐，每天少吸一枝纸烟，每回少喝一口老酒；烟酒朋友，谅也能可同情。

六曰佛事捐，如此次宁波三北抬阁，闹所费洋百余万；稍事撙节，十万八万；若将全部，移作义捐，真所谓救苦救难，大慈大悲！

七曰经忏捐，民间少举行一次两次烧纸烧香等，或仿现行征收经忏捐办法亦可。

八曰乐善捐，与其修福修心，给几个铜圆与游手好闲的乞食者，毋宁激发爱国的天良，慨捐以救

<sup>①</sup>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七次广播演说：劝募中华义勇军，一人一日一铜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85—986页。



济抗敌义军与难民。

这些捐款建议具体生动,切实可行。为了保证捐款真正用于抗战,马相伯要求有关组织将所得捐款集中后,须通过“国民公意表决此款用途:或源源接济抗敌……将士,或分拨拯救战地灾区同胞,即购置或制造飞机以充实我空防亦可”<sup>①</sup>。

令人高兴的是,在不忍人会伟大精神激励下,许多人不仅捐献了钱和物,而且直赴前线,救死扶伤。如已加入中国籍的比利时教士雷鸣远亲自组织救护队,奔赴当时“平常人所不敢到”的喜峰口最前线。对此,马相伯十分感动,深望国人能以雷公为榜样,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说:

惜余年耄耄,能言不能行。老友雷鸣远神父,有鉴于前敌将士死伤喋血,乃实行表现“不忍人”之仁心,而组织救护队。雷公为国际间极负盛誉之教士,故其亲赴前线,实行工作之举动,当胜于伦敦所倡和平军之纸上空谈,余亦纸上空谈。惟希望同胞效法雷公之实行耳!<sup>②</sup>

不忍人会的成立和雷鸣远教士的义举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曾任司法总长的徐谦特致函马相伯,称:“阅报

<sup>①</sup>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七次广播演说:劝募中华义军捐,一人一日一铜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86页。

<sup>②</sup> 《〈华封老人言善录〉附载》,“谈‘不忍人会’之发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11页。



载不忍人会之发起,及雷鸣远先生之赴前方救护,令人感奋。”<sup>①</sup>冯玉祥将军对于不忍人会的成立也至为推崇,他说:“长者发起‘不忍人会’,以为天下倡,定能振聋发聩,使懦夫立,怯者勇,恢复民族精神,与日寇为持久之斗争。”<sup>②</sup>至于雷鸣远教士以外人而热心于中国民族解放,不顾个人安危而深入前方工作的大无畏精神,冯将军更表示“至为感佩”<sup>③</sup>。

1935年,日本在蒋介石政府的妥协政策下,更进一步加紧对华北的侵略,企图进行“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再次陷入严重危机。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数千名北平学生涌向街头,他们高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从而引发全国性抗日救亡运动。复旦大学学生起而响应,投身到抗日救亡洪流之中。12月23日,复旦学生组织了“赴京请愿讨逆团”,聚集在上海火车站。蒋介石电令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前往劝阻。李登辉见学生爱国情绪高昂,遂回电表示无能为力,并向校董会递交辞呈。12月27日,马相伯得知情况后,特致函复旦大学学生,称赞学生“为国难而驰驱,餐风宿露,不遑宁处,余闻而大慰”。但他担心李校长辞职将影响复旦大学发展,建议学生从长计议,称“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sup>④</sup>

1935年12月12日,以马相伯为首的283人文化界人

<sup>①②③</sup> 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12页,第1013页,第1013页。

<sup>④</sup> 《致复旦大学学生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2页。



士发表著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该宣言声称，肩负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人士理应“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并提出 8 条具体主张：

1. 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
2. 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
3. 坚决反对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
4. 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
5. 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对敌人的侵略；
6. 严惩一切卖国贼并抄没其财产；
7. 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8. 全国民众立刻自动组织起来，采取有效的手段，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sup>①</sup>

这一宣言，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抗日救亡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1935 年 12 月 27 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艾思奇等 30 余人被选为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争取自由、组织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等重要议案，并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第二次宣言》，要求停止一切内战，迅速建

<sup>①</sup> 转引自齐卫平等著：《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98 页。



立民族统一战线,罢免并严惩一切卖国的亲敌官吏,释放一切政治犯及被捕爱国学生等。此后,上海相继成立“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组织。

1936年1月28日,这些救国会联名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马相伯被推为主席团成员。1936年4月16日,马相伯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须团结一切愿意为救祖国而奋斗之各党派、各团体,一致救亡,这是洗雪国耻惟一的道路。”<sup>①</sup>

1936年6月1日,全国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正式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马相伯和宋庆龄、何香凝、蔡元培等人被推为执行委员。这一联合会成立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时,马相伯已是97岁高龄,不能参加具体领导工作,但他始终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精神领袖。为了能够及时得到马老指导,联合会第2次执行委员会即在马相伯家中召开。马相伯特为执委会题赠对联:“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委员们备受鼓舞。<sup>②</sup>

活跃于上海的各类救国会活动激怒了蒋介石政府。1936年11月23日,上海国民党当局公然逮捕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等7名救国会同志。对此,马相伯十分气愤,特致信冯玉祥将军,称“幸我将军有以体恤之!国家幸甚!民族幸甚!”<sup>③</sup>

① 《苏联对中国毫无野心》,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4页。

② 《题赠全救第二次执委会词》,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8页。

③ 《致冯玉祥》,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93页。



1936年12月,马相伯应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斌邀请,离沪赴宁。1937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在南京,他仍一如既往地营救“七君子”。1937年7月31日,沈钧儒等7名救国会同志终于被释放。8月6日,他们一起去看望爱国老人马相伯,并与他合影留念。沈钧儒特书题“惟公马首是瞻”6字,表达同志们的深切崇敬和爱戴之情。

#### 四、阐发国家民族精神,引领青年前进方向

马相伯的抗日宣传有一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善于利用其渊博的知识,深刻阐发国家民族精神,引领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投身到伟大的抗日救亡斗争和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中。

马相伯对“国”字有独特解释:“我们中国的国字,古写本做‘口’,就是古代社会形成国家之始,各各划疆自守的意思,但到后来,国与国间,战争日多,遂发现保障国家,必须一口一戈,即人人皆须执戈以卫国也。……用现代语言表之,即一人一枪也。必须一人一枪而后国家可保,真正宪法始可产生。”<sup>①</sup>即是说,人人执戈以卫国,是每个国民的神圣义务。但遗憾的是,国难当头,当时仍有“一部分人宴安逸乐,已不复知有国家兴亡之感”<sup>②</sup>。

<sup>①</sup> 《一日一谈》,“宪法总题”,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14页。

<sup>②</sup> 《一日一谈》,“中国人应该知道国家是什么”,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3页。



所谓“国家”，依据马相伯之见，即指“人群最重要的政治组织”，并担负有“Negatiu”和“Nositu”两方面的使命。有人依据日本人翻译，将前者译为“消极的”，后者译为“积极的”。马相伯不以为然，他依据《礼记·礼器篇》“饰回增美，质措则正，施则行”，将“Negatiu”译做“饰回”，“Nositu”译做“增美”，称：“排除旧的老的，便是‘饰’的作用，即西语所谓Negatiu的作用（亦即所谓‘消极的’作用）；布置新的少的，便是‘增’的作用。”<sup>①</sup>在这一基础上，马相伯进一步指出，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在于其“能群”，“他们的群发展而为国家，完全由于两种目的：一种是‘饰’的目的，即所谓‘消极的’目的；一种是‘增’的目的，即所谓‘积极的’目的。消除天灾人祸，为国家的最大使命之一。所谓天灾，是指水、旱、疫疠等等而言。所谓人祸，小而言之，盗贼之行劫，贪官污吏之虐民，皆是也；大而言之，内而权奸当国，外而强邻压境，皆是也。……‘饰’与‘增’其为适相等，而饰的工夫还在先，所以古人不曰‘增美饰回’而曰‘饰回增美’，用意至为深切”<sup>②</sup>。

行文至此，马相伯下一转语，对国家大患的日本侵略者以及盲目高谈和平论调者进行猛烈抨击：

现在一般人高谈和平；实则今之所谓和平，乃奴隶与主人的和平，而不是平等自由的和平，因为和平是“增美”，而欲得真正的和平，必须先大刀阔

<sup>①②</sup> 《一日一谈》，“三论国家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7页，第1158页。



斧地与和平之障碍与蠢贼做殊死战,把他们消灭后,我们才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在层层压迫或无耻的投降状态中,谈和平,皆不知“饰”与“增”之道者也,皆醜然人面,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也!①

为了形象地说明“国家”的本质,马相伯有时候把“国家”直接说成是“一个法人”或“一条性命”。他说:“一个国民受欺辱,就是整个国家受欺辱;整个国家遭国难,更是全体国民同遭难。”②

面对暴日的疯狂杀戮,并不是要不要抵抗的问题,而是考虑如何进行“有效之实践奋斗”③。马相伯指出,在暴日步步进逼,企图“颠覆我国家,灭亡我民族”的严重时刻,“青年诸君,为社会之中坚,国家之生命所托,肩头上所负荷之责任,尤为艰巨”④。1932年新年到来之际,马相伯建议青年诸君应致力如下3件事:

其一,不买日货。中国向来为日本的最大市场,如能杜绝日货达10年之久,“在经济上足促以日本之动摇”。他倡议全国同胞务必身体力行,“而我青年诸君,当为社会之表率,尤应力求朴实,拒用日货,以为倡导”。⑤

其二,研究科学。马相伯认为,中国衰弱的根源在于科

① 《一日一谈》,“三论国家问题二”,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58页。

② 《华封老人言善录》,“第十二次广播演说:‘一国家’‘一法人’‘一性命’”,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00页。

③ 《泣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05页。

④⑤ 《新年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12页,第912页。



学落后。为此,他要求青年学生“今日在校求学,必须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能如是,然后乃能求得‘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必有‘真的知识’与‘活的学问’,乃能实际应用,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sup>①</sup>。

其三,唤起民众。马相伯深知中国文化教育之落后,由于信息闭塞,有些穷乡僻壤的民众甚至仍不晓得东北沦亡的事实真相。为此,他希望青年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国难教育,进行更广泛的国难宣传。他说:

寒假已届,诸君必多返里,际此时会对于日本问题与东北问题应加意研究,将国内外情势及暴日犯我东北之实况,详为乡民讲述,大声疾呼,使全国民众奋起,共救国家之危亡。<sup>②</sup>

马相伯认为,学生的本职是学习。他说:“现在学生两个字,要顾名思义才好,学然后可以生。不学,那就不可以生了!”<sup>③</sup> 然而,当国是日非,民族危机日益逼近之际,马相伯对于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持同情态度。一二·九运动后数日,有记者就学生运动问题专访马相伯。当记者说,现在“青年们已不能再安心读书了,他们又回复到五四运动时代的兴奋状态了,或则更超过五四运动时代的兴奋状态!若果他们安心读书,我们应当感谢政府及教育当局,那么,现

<sup>①②</sup> 《新年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12~913页,第913页。

<sup>③</sup> 《内政外交学风种种评论》,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09页。



在他们不能安心读书,要从学校走到街头,抛却书本来干民众运动,那又当怎样呢?”马相伯颇为机智地回答:

那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政府与教育当局,因为他们天天教青年们爱国,教他们要“忠”,要“勇”。孩子们看见国家到了“命在旦夕”的时候,出来呼告他们的父母兄弟,诸姑伯姊,赶快起来补救,这不是他们平时能以敬聆师长教训的结果吗?饮水思源,不是我们政府教育当局的耳提面命,以身作则的功劳吗?怎样不应该感谢他们呢?①

然而,令记者大惑不解的是:“今日学生的请愿示威等行为,正是实验他们所受的教育,为什么军政当局又严加干涉,甚至加以逮捕或施以各种压力呢?”对此,马相伯作了苏格拉底式回答,意在让记者自己去体悟其中的旨趣。他说: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问题我却不能答复,因为连我也不懂!敬以质之政府当局!②

## 五、重申大学教师的文化使命

与青年学生相比,马相伯认为,国难中的大学教师更应该是社会良心的象征,他们不仅要传递和研讨高深的学术

①② 《一日一谈》,“好学生”,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60页,第1161页。



知识,而且担负着国家的道德建设重任,秉承着民族的教育文化使命。

1935年11月25日,上海《申报》刊载蒋梦麟、胡适、任鸿隽、傅斯年等教授的声明:“除表示反对破坏国家统一外,并郑重宣称要求政府用全国的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完整。”11月27日,记者特就此询问马相伯先生有何感想。马先生很高兴地回答说:“应该的,应该的。”

一个国家之所以形成,必须有两种人为之重心:一种是负政治上责任的,就是站在政府机关以内的官吏;一部分是负人民教育之责,为之师傅的人。前一种人是用政治(包括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军警武力等等)来统治人民;后一种人乃是用他们文化工具使人民增进知识,发扬信心,培养道德。就国家社会之所以存立的根本言之,后一种人,即今之大学教授以下为人师表的人更重要。譬如人之一身:行政方面犹之四肢百体也,师者脑神筋也。……北平各大学教师早就应该站出来说话,直到现今他们才说,已经是太晚;然而他们还敢说几句应当说的话,这在我们的现时中国教育界实在是“空谷足音”!①

不过,马相伯认为,光有宣言还不够,更应该继之以实际行动。为此,他对北平乃至全国的大学教授及师表提出

① 《一日一谈》,“中国各大学教授所应做的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45~1146页。



殷切期望：

其一，“要对他们的信仰(即他们所宣言的)生死以之”。马相伯要求大学教师真正做到能言能行，敢言敢行，言行一致，而不只是“说了几句话摆架子”<sup>①</sup>。

其二，“要做中国的斐希特(Fichte)，不要中国的康德(Kant)”。马相伯对康德的哲学深致敬意，但指斥他“拜倒在异族的统治势力的脚下的人格，实在是一无足取”。斐希特“在哲学方面虽然说是继承康德，但在行动方面却恰恰和康德相反。当法兵攻普鲁士，柏林已经在拿破仑第一的枪尖之下时，斐希特大声疾呼，到处演说，唤醒德国民众反抗外敌的自信力与敌忾，又抛却大学校长的地位到前线去宣讲，以事不果”。<sup>②</sup>

马相伯呼吁：“我们的教授们，起码要以斐希特为榜样，中国才有希望，他们也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的天职，才可以俯仰无愧！”<sup>③</sup>

## 六、举世敬仰的救国老人

由于马相伯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和社会发展的卓越贡献，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之际他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赢得世人的广泛瞩目和高度赞扬。国人多次自发地为他举行祝寿集会，不难体会出

<sup>①②③</sup> 《一日一谈》，“中国各大学教授所应做的事”，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46页，第1147页，第1147页。



马相伯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20世纪20年代,由于非基督教运动的主张,马相伯曾一度陷入两难境地。朱维铮先生指出:

一方面,作为宗教信仰徒,他必须保卫自己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必须反对任何的消灭宗教的企图。另一方面,作为民主与科学的主张者,他又不能不承认非基督教运动的参与者决非义和团式的“愚民”,而是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他们指责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的变化取向相悖,指责西方传教士依仗强权贱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都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这方面马相伯本人的批评甚至更为严厉。既要坚持信仰自由,又要坚持民主进步,然而又受到教规和誓约的束缚,对非基督教运动大加谴责或公开同情都不行,这个处境实在令人不会感到舒服。<sup>①</sup>

如前文所述,马相伯不满意非基督教运动的某些过激言论,非常与英敛之等好友进行书信讨论和辨析,其心境寂寞可想而知。整个20年代,除一如既往地致力于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的兴建,关注天主教教育事业外,马相伯过着相对平静的宗教化学者生活,宗教文化译述和学术思想研究是他的主要生活内容。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20年代末非基督教运动走向低潮以后,国人开始对天主教徒出身的教育

<sup>①</sup>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14页。



家马相伯给予更多的理解和崇敬,开始理性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学术思想发展等多方面的杰出贡献,并亲切地称他“救国老人”<sup>①</sup>。

1928年5月6日,蔡元培、于右任等人为“马相伯9旬诞辰”发起隆重预庆会。会堂设在徐汇公学大礼堂,礼堂四壁悬挂着琳琅满目的寿联、寿幛。“相伯先生之自寿联曰:有生可悟常生乐,今世当知后世因。吴敬恒联曰:得天独厚,应寿一万八千龄,才经过二倍百分之一;其道大光,曾传三千七十子,皆能位两间壹是乎三。于右任联曰:先生年百岁,世界第一晨星。张元济联曰:博学多闻,鞅泽寄象;修道养寿,眉梨耄鲐。大同大学联曰:耳顺心从,久通圣学;克己复礼,宜享颐年。杨敦颐同子天骥联曰:据鞍顾盼矍铄援,敏帐雍容教授融。中国拒毒会横挂屏曰:龙马精神。蔡元培、胡紫波、朱志尧、邵力子等之寿幛,金问泗、朱炎等之寿轴,字有多至七八百者。”<sup>②</sup>

到会的嘉宾有胡适、杨杏佛、金问泗、静谦等。蔡元培的代表杨杏佛在颂词中充分肯定马相伯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巨大贡献,称:“先生无子孙,中国之青年皆其子孙;先生无财产,中国科学之发达皆其财产。”既表达作为弟子的真诚祝福,也体现其作为非基督教领袖对天主教徒马先生思想的深刻理解。于右任在来电中深情地忆及师恩,由其代表静谦朗读,说:“右任因念亡命海上时,承夫子训诲万方,资

① 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载《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5日。

② 《马相伯先生九旬诞辰预庆纪》,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52页。



以食米；并自谓我自尽国民之责耳，子将来当以学术自助，提命犹耳，转瞬 20 余年矣。右任奔走无状，无补于国，而学殖荒落，尤复愧对夫子。每维旧事，益念来日之艰，甚虑负夫子之深期也。所祈皤皤国老，时加教益，有不胜感禱者耳！奉电通讯，敬祝万岁！”<sup>①</sup>其后，胡适献上“精湛语”。外甥朱志尧更是出言不凡，直谓：“舅乃一小儿也，舅是常生不老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耶稣云：不变为小孩，不得升天国。小儿之诚实可爱，受人欢喜，莫不皆然。……”说得有声有色，满堂喝彩。马老面带微笑，始终沉浸在幸福愉悦之中。他最后以“爱”字为题致答谢词，称人生在世不出一爱字，勉励大家要“爱身爱人，爱国爱主”；并说：“我之一生，十去其九，用爱之时，惜已不多。诸君皆少于我，即用爱之时多于我，望善用其爱也可。”<sup>②</sup>

1929 年 5 月 4 日，蔡元培、于右任、杨杏佛等门生故旧在震旦大学为马相伯举行正式的“九秩寿辰”庆祝会。蔡元培携夫人周峻献上寿联为：“妙喻同岑，芥子一粒。为学日益，大椿千秋。”于右任代复旦大学书寿联为：“是开国时人瑞，为科学界伏生。”杨杏佛则呈上非常诙谐的寿语：“四海同登仁寿城，先生大笑八千场。”<sup>③</sup>此外，章太炎、徐季龙、杨雪玖、章奇等献上寿联、寿诗或寿画，风格各异，美不胜收。与庆祝会相呼应，北京《益世报》刊出“祝贺马相伯九十

<sup>①②</sup> 《马相伯先生九旬诞辰预庆纪》，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53 页，第 1054 页。

<sup>③</sup> 《马相伯先生九秩寿辰之余闻》，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1058 页。



寿特号”，对马相伯一生“特立独行”的高尚人格给予充分肯定；称马老“以宗教名宿，万流共仰，耆年硕德，为国之光。近年道德沦落，忧时之士，每归咎于军阀之战争，生灵之涂炭，衣食不足，礼教何兴……所最可忧者，惟老师宿儒，世无其人，为人心道德，做中流之砥柱。吾尝读史，至特立独行之传，未尝不废书而三叹也！何幸于人欲横流之日，独见有马相伯先生其人者，如鲁灵光殿，巍然独存”<sup>①</sup>。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更以“百岁青年”形象投身到火热的抗日救亡洪流之中。如前文所述，他一次又一次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抗日广播演讲，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记者采访，一次又一次地参与组织抗日民主集会……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地吸引了国人，成为国人坚决抗日的精神动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凝聚成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1939年4月6日，在马相伯百岁大寿之际，弟子邵力子特别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的优秀精神，称先生“即是继承此种精神且加以发扬光大的人”，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造次颠沛和艰难险阻，都不改其对国家民族的坚定信念。他说：

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有此精神，我民族必能永存。穷者且益坚，不穷者  
应当怎样？我们还能腐化贪污吗？老者且要益

<sup>①</sup> 《北京〈益世报〉祝贺马相伯九十寿特号》，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056页



壮，未老者应当怎样？我们还能萎靡退缩吗？……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久存在于世界，都在此。由相伯先生的益坚益壮推而广之以及于全国，敢断言抗战建国的必胜必成。相伯先生万岁！中华民族万岁！<sup>①</sup>

为了表彰马相伯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教育、思想学术发展以及民族解放事业多方面的卓越贡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1939年4月7日《致马相伯百龄大庆贺电》中写道：

桂林新四军办事处探转马相伯先生尊鉴：

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sup>②</sup>

《新华日报》发表《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短评，充分肯定他在文化、教育、政治诸方面的重要成绩，指出他能够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激流而不断地进步着”；特别是“近几年来，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马先生不辞老瘁，奔走抗日工作。对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都发生了重要的作用。……从这100年来马相伯先生的奋斗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儿女的优秀的特质，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光明灿烂的前途”<sup>③</sup>。

① 邵力子：《由益坚益壮到必胜必成——恭祝相伯夫子百岁大寿》，载《中央日报》，1939年4月6日。

② 《新华日报》，1939年4月7日。

③ 《新华日报》，1939年4月6日。



国民党政府颁布《国府褒嘉令》，对马相伯的学术人品和爱国情操给予高度赞扬：

学贯中西，名德夙著。中年以后，慨捐巨款，倡学海滨，乐育英材，赞覆匡复，为功尤巨。近自御侮军兴，入佐中枢，秉老当益壮之精神，参抗战建国之大计，忠忱硕望，宇内同钦。兹届转登百龄，襟怀豪迈，无灭当年，匪惟民族之英，抑亦国家之瑞。载颁明令，特予褒嘉，以旌勋贤而资矜式。此令。<sup>①</sup>

除国共两党公开表彰外，学术教育界对马相伯寿诞一贯表现出极大热情。继九旬诞辰预祝会（1928年）、九秩寿辰庆祝会（1929年）之后，《中央日报》于1937年5月16日出版《马相伯先生九十晋八大寿特刊》，1939年4月6日出版《马相伯先生百龄庆典特刊》，刊载许多著名学者及门人弟子的祝寿文章，表达了人们对马相伯先生的崇敬和爱戴。

**蔡元培：**松柏冬荣崧岳峻，蒲轮徵聘到闲云；

中西学术探玄妙，坛玷才华静寇氛；

绛县春秋忘百岁，河汾弟子半元勋；

天开寿守称人瑞，觞晋彭篴酒未醺。<sup>②</sup>

**于右任：**马先生是一个世界学者，但马先生一生，则无时无刻不为国家民族努力。其从政佐幕

① 《中央日报》，1939年4月6日。

② 蔡元培：《相伯先生九十八岁荣庆》，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16日。



时期,既自出其所学,以努力于国家民族。其创办学校时期,复传授其学,以教导吾人努力于国家民族。即在今日 98 岁之高年,亦尚在其老当益壮之精,勉励吾人、领导吾人努力于国家民族。<sup>①</sup>

当全民族抗战之时,遥祝百龄,与将士同呼万岁;

自新教育发萌而后,宏开复旦,论精神独有千秋。<sup>②</sup>

大邦人瑞,民族导师。<sup>③</sup>

陶行知:寿上加寿,寿星要中国长寿。

仁不违仁,仁者愿天下归仁。<sup>④</sup>

李登辉:先生领袖名流,风标儒雅,爰筹学府,熔铸宏才。<sup>⑤</sup>

毛西壁:先生既为宗教、哲学、科学之大师,其智乃集现代文化之大成,而先生又为仁,则仁者之寿,宜其与河山相映,绵绵延延,日进无疆。<sup>⑥</sup>

①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16日。

② 转引自许有成等著:《于右任传》,第49页。

③ 《于右任与马相伯先生》,见《方家六十自定稿》下册,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1987页。

④ 陶行知:《贺马相伯先生百岁寿联》,见《陶行知全集》(补遗一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75页。

⑤ 李登辉:《马相伯老先生百龄大庆祝辞》,载《复旦同学会会刊》第8卷第2期(1939年3月),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72页。

⑥ 毛西壁:《马先生之言行》,载《复旦同学会会刊》第8卷第2期(1939年3月),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75页。



**程中行：**综先生之生平，言为道范，行为世法，识先流俗，学究天人。自其服官退居，著书讲学，一归于国家民族之大本。百年以来，乾坤转易，世事沧桑，百年中之奇变大变，惟先生实亲示之。在此百变奇变大变中，有不不变者焉，曰国家民族至上，曰人与群之仁爱，曰守其信以化民成俗，曰正义和平克制强暴。此四者，百年世界文明进化之规模；此四者，先生所以教其徒与启其国人者也。<sup>①</sup>

**钱智修：**先生名高旗翼，德并岳渊。仿鹤湖鹿洞之规，启虎观鸿都之盛。大扣小扣，既应时而能鸣；经师人师，复一身而兼备。是以时雨之化，深入乎身心；雅风所扬，别开夫宗派。计自先生先后创设震旦、复旦以来，及门何啻三千，纪年且逾一世，莫不经北面，事以终身，奉若神明，依如慈母。河汾弟子，尽多开国之元勋。<sup>②</sup>

如上所引，社会各界人士从新学创办、人才培养、学术造诣、道德风貌、人格境界等方面充分肯定了马相伯一生的光辉形象，表达了国人对其发自内心的敬仰。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像马相伯这样在世时即受到如此崇高的评价，确

① 程中行：《马前校长先生百龄大庆寿言》，载《中央日报》，1939年4月6日。

② 钱智修：《马相伯先生大寿征文启》，载《复旦同学会会刊》第8卷第2期（1939年3月），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81页。



实是不多见的。

## 七、哲人星黯，薄海同悲

晚年马相伯达到其一生事业的光辉顶点，一言一行常成为媒体追踪的目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应冯玉祥、李宗仁将军邀请，马相伯移居广西桂林，住在城内叠彩山凤洞口景凤阁楼的一间木屋中。他在房门口贴上一副对联：“生有自来戚继光，死无遗憾范希文。”<sup>①</sup>旨在以中华民族杰出人物戚继光、范仲淹自勉，并昭示国人要不屈不挠，努力抗战，为国争光。马相伯在桂林的一年，也是我全民抗日极为艰苦的一年，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抗日前线状况和国家民族命运。为了支持抗日，他把社会各界赠送给他的寿仪全部奉献出来，作为犒慰前线伤兵之需。

1939年，由于担心马相伯先生年老畏寒，于右任特邀请先生移居春城昆明。但在前往的过程中因颠簸劳顿，先生体力不支，遂决定滞留越南谅山休养。此时，关心马老健康的社会各界人士常前来问候探望。当胡愈之来访时，马先生仍期期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sup>②</sup>胡愈之听了，亦感

<sup>①</sup> 黎远明：《爱国老人马相伯在桂林》，载《新文化史料》，1999年第3期。

<sup>②</sup> 《苦斗了一百年的马相伯先生》，见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附录一，《民国丛书》97，第234页。



慨唏嘘，无以为言。

居越期间，马先生愈益想念祖国，时刻牵挂着前线将士，“国人有过谒者，相见无别语，惟殷殷询抗战情形及各地建设状况，反复不已”<sup>①</sup>。他对侍奉左右的孙女马玉章说：“九香，你听爷爷的话，我死后，你就到重庆去，找于右任伯伯，要求到前线去，为国家效力。”<sup>②</sup>当上海复旦同学会为马相伯百岁寿辰举行集会之际，马相伯特从越南凉山寄来亲笔信，信中写道：

国无宁土，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  
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sup>③</sup>

11月3日9时，先生弥留之际，语音已不易辨别，仅闻“消息……消息”等字节。次日零时，先生怀着对国仇未报的遗憾，溘然长逝，终年100岁。

噩耗传来，举国沉浸在长久的悲痛之中。11月6日，《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肯定了马相伯对中国文化教育和民族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称马先生“晚年目睹日寇侵略加紧，民族危机严重，为救国事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马先生是热心爱国家、爱民族的，是永远有着青年人奋斗精神的”<sup>④</sup>。11月10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联名致电马相伯家属：

① 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民国丛书》97，第231页。

②③ 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57页，第140页。

④ 《悼马相伯先生》，载《新华日报》，1939年11月6日（短评）。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惊悉相伯先生于本月4日，遽归道山，老人星黯，薄海同悲。遗憾尚多，倭寇未殄。后死有责，誓复国仇。在天之灵，庶几稍慰。特电驰唁，敬乞节哀。<sup>①</sup>

11月6日，《中央日报》发表《敬悼马相伯先生》社论。社论称，马相伯一生饱经世变，然其“处变者有不变之数原则：一为国家之至上，一为人与群之仁爱，一为崇科学求进步，一为正义克制强权。先生守此四者，教其徒，启其国人。百年之中，先生于国家于社会，无赫赫之功，然先生之精神，所以化民成俗者，巍巍乎无得而名焉。先生是思想家，是宗教家，是教育家，是政治家，百年之中，学足以融会中西，识足以贯通古今，世界各国尤足拟于先生。先生在国之贡献，在思想，在学术，尤在行事。先生毕生精神特殊之点，最足以风世与针对时弊者，在其少年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以年寿而殊，不以时地而异。”<sup>②</sup>社论对马先生创办震旦学院和奠基复旦大学给予特别表彰，称“先生的结晶，乃在教育”，强调先生的逝世不只意味着“国丧元老”，更可说是“民丧师宗”；“不仅是中国国家的损失，乃是20世纪文明史上一件大事”<sup>③</sup>。

长期追随和关心马相伯的及门弟子更为痛苦不已。弟子于右任历念先生的谆谆教诲、得业功泽以及爱国真情，自

<sup>①</sup> 载《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0日。

<sup>②③</sup> 《敬悼马相伯先生》，载《中央日报》，1939年11月6日（社论）。



责作为弟子的不周之处,称:“疏谬之罪,百口奚辞?悲乎!非先生圣灵启示,俾余略增其绵薄之力,于先生所生死不渝之中兴大业,循其天职,稍补涓埃矣,余又何以自赎于先生耶?”<sup>①</sup>

11月26日,重庆各界为马相伯举行十分庄重的追悼会。弟子于右任送上的挽联格外引人注目:

光荣归上帝,  
生死护中华。<sup>②</sup>

蒋介石所送挽联贴切地表达了马老在教育文化和民族精神两方面的杰出贡献:

毕生广造英才,化育百年尊绛帐;  
临死尚饶敌愆,精魂万古式黄炎。<sup>③</sup>

追悼会由吴稚辉先生主持。吴先生用低沉的声音深情追怀马老不屈不挠的奋斗一生,从太平天国、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一直说到正在进行的抗战,称马先生亲历中国变化最多的100年,而100年来他始终在为中国的觉醒而奋斗,他勉励大家要“继承遗志,努力叫醒中国”。之后,于斌主教报告他在谅山的治丧经过,称马老的逝世不仅是中国的损失,也是“世界的损失”。弟子于右任极其虔诚,含泪致辞:

呜呼吾师,今胡遽别?余将胡依?民胡矜式?

<sup>①</sup> 于右任:《追念相伯夫子并略述其言行》,载《国民公报》,1939年11月26日,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94页。

<sup>②</sup> 《追悼马相伯》,载《大公报》,1939年11月27日。

<sup>③</sup> 《追忆马相伯》,载《大公报》,1939年11月27日。



大愿将酬，抗敌救国，胡晏庆功，而铿一昔。嗟师之生，忧患百年，罗胸武库，握手空拳。报国之心，托于造士，笃志殚精，忘其暮齿。伊余小子，讲犹一儒，诗狱瓜蔓，文网秋荼。师拯其危，亦乐其陋，大义微言，簪堂密授。共和肇建，再起匡时，中山国父，丹徒国师。刘巴居蜀，兵于敢欺，神奸觊鼎，师实折之。迥车北都，结庐江上，民治重辉，伊师之望。乌夷滑夏，发难沈阳，封狼荐食，浸窥南疆。其鼓堂堂，大呼杀贼，霜雪盈颠，风雪统舌。国有巨人，振袂得领，雪耻复仇，倾心託命。蒲轮就道，做宾上京，谋参密勿，礼尊老更。孰谓已老？心坚而贞，钢铁政策，播音铿铿。卢沟弄兵，妖胡内窜，何以御之？长期抗战。万里南天，一灵鲁殿，悬日中兴，有光若电。呜呼哀哉！心则不老，其年大齐，穷边岚雾，颓龄曷支。湖湘三捷，喜极而啼，声声“消息”，断续依稀。呜呼哀哉！伊余之身，师实再造，余粗有知，为师所诏。玩日愒时，骯骯亦老，余则负师，将何以报？师之灵爽，陟降帝阍，师之心血，注于人人。万心一力，应济艰屯，收京有日，再为告文。呜呼哀哉！尚飨！①

该祭文义理精当，情感深厚，意境高远，言辞恳切，令在场者痛哭饮泣不已。

① 《于右任与马相伯先生》，见《方豪先生六十自定稿》下册，第1990—1991页。



与于右任声情并茂的祭文有所不同,弟子邵力子则从哲理高度概括马先生一生的学问、事业和信仰:

先生的信仰是入世的,不是出世。先生要使举国人有信仰,在使举国人知道爱国救国。先生一生专业,具体的表现在教育。先生一生三任大学校长,震旦、复旦是先生创造的。先生虽是宗教家,而教育的方法,重“有容”,他对青年,使他们由“知”而“信”,这是先生最伟大的地方,先生所以为大教育家,就在于此。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一方面要使青年有信仰,同时要使青年由“知”而“信”,这样的信仰不是浮面的,不是他动的。……先生精神学问的最高目标在救国。现当抗战已入后期,爱国国人,都应人人效法先生。<sup>①</sup>

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先生感念马相伯对震旦学院、复旦大学发展的杰出贡献,称赞他不仅“弟子满天下,在学术上成为一代宗师”,而且为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说:

马老校长主持下的复旦、震旦两校,培育出了不少带革命思想和革命作风的人物,成为革命党人集会的处所。辛亥革命的成功,马老校长尽力不少。……他很明确地主张,支持抗战到底,对胜

<sup>①</sup> 邵力子:《救国老人马相伯先生》,载《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5日,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96~97页。



利的前途抱着十分的乐观。<sup>①</sup>

他说,作为物质的马相伯虽然不在了,作为社会的、精神的马相伯却依然长存,强调“我们今天在追悼他的时候,应本着他的精神的我和社会的我,而继续努力前进,使我们社会的、精神的马老校长永垂不朽”<sup>②</sup>。

1952年,上海市市长陈毅派专员陪同先生儿媳邱任我、曾孙女马百龄一起,将马先生灵柩护送回沪,安置在先生生前所置“安焉公墓”。之后,上海市政府举行隆重的“反帝爱国老人马相伯先生安葬纪念会”,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1984年10月27日,上海市政协在马相伯先生逝世45周年之际,决定将马先生墓地迁至上海万国公墓,并举行隆重的迁墓仪式。在迁墓仪式上,张承宗总结说:“马相伯一生的光辉业绩及其高风亮节,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与景仰。他毁家兴学,创办震旦与复旦大学,培育英才,桃李成荫,对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卓越贡献。他在那种恶劣环境下,不畏强暴,奔走救国工作,对当时抗日救国运动的推进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sup>③</sup>

<sup>①②</sup> 吴南轩:《在复旦大学追悼马相伯先生大会上的报告》,载《嘉陵江日报》,1939年11月15日,转引自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103页,第104页。

<sup>③</sup> 张承宗:《在马相伯先生迁墓仪式上的讲话》,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65页。



# 第 八 章

## 马相伯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一老南天身是史”(柳亚子语)。从鸦片战争爆发的 1840 年至抗日战争仍在持续的 1939 年,马相伯在这苦难的中国百年历史中艰难地跋涉着。100 年来,马相伯活跃于宗教、政治、教育诸领域,虽然各个时期侧重点不同,但立足爱国、与时俱进则是其始终如一的价值取向。正因为如此,他相信教育特别是现代教育的价值意义,但并没有过分地夸大之。他创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1917 年改为复旦大学),参与发起公教大学——辅仁大学,精心设计函夏考文苑,充分表明他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开拓者。而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实践,



也促使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智慧,从容思考近代大学理想,并逐渐形成独特认识。他向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但并不认为现代化可以脱离国情民性和文化传统,教育现代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始终是他努力探索的方向。

## 一、立足爱国、与时俱进的宗教、 政治与教育价值取向

马相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信徒,曾被誉为中国“现代的徐光启”<sup>①</sup>,也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宗教学家和宗教改革家。世奉天主教的家教熏陶及其所接受的系统的天主教教育影响,使马相伯很自然地成为一名天主教信徒。但作为中国人,作为饱受苦难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又不能忍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肆意欺凌和压迫。虽然西方传教士并不等同于西方殖民主义者,但近代西方传教士确实是借助各种不平等条约来华传教的,带有一定的殖民主义色彩。马相伯和其弟弟马建忠都曾离开过天主教耶稣会,其原因固然很复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国传教士控制下的天主教耶稣会未能善待中国信徒,刺伤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敏感的民族自尊心。但离会不离心,马相伯并没有改变其宗教信仰,只是对天主教耶稣会所习染的

<sup>①</sup> Ruth Hayhoe and Lu Yongling (eds). *Ma Xiangbo and the Mind of Mordern*, New York: M. E. Sharpe, 1996, p. 1.



殖民主义霸气表示极度愤慨。21年后的1897年,当脱离尘世恩怨,重新回归教会时,他感受到那种失而复得的灵性上的极大满足。其后,马相伯的天主教信仰再也没有动摇过,“即使几度出山从事政治,和一直努力举办新式高等教育时,也都是以本其信仰态度,推广教义,维护教会利益”<sup>①</sup>。甚至于20世纪20年代非宗教运动高涨之际,马相伯仍一以贯之地坚持宗教信仰自由,相信宗教与科学并行不悖,相信宗教信仰的社会教化价值与人生终极意义,并为之孜孜不倦地进行理论阐发与探索。另一方面,马相伯并非片面地维护教会利益,强调教会必须因时变革,倡导天主教中国化,反对文化殖民主义,主张用中国语言传教,改西教士为中国籍,谋求教会管理自主权。九一八事变后,马相伯的宗教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充分展示,他说:“一切人民,同一造物所生,故生而平等;人类之尊严,即建于此种平等人格之上。我不必向列强乞怜,我更不受暴日支配。”<sup>②</sup>号召全国人民务必顽强抵抗,“认定自助者天助,效法义腊厄尔,再造日路撒稜,一手做工,一手拿剑,共赴国难,庶有豸乎!”<sup>③</sup>在这里,宗教信仰俨然成为国人共赴国难、坚决抗日的精神原动力,而马相伯本人则神奇地再现“百岁青年”雄姿,日夜不停地投身到抗日斗争最前线。对此,弟子于右任深受感动,他

① 李天纲:《信仰与传统——马相伯的宗教生涯》,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251页。

② 《为抵抗日本第二次进攻华北告国人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931页。

③ 《国难言论集·序》,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899页。



解释说：“先生以稀世之高龄，犹能保持此少年精神，为国家民族努力者，与其宗教信仰，尤有深切之关系。盖人之精神，虽受物质条件之支配，而信道之笃，执德之坚，亦往往能转弱为强，回复青春时代之勇气。”<sup>①</sup>

在政治上，马相伯参与洋务活动，赞成维新，提倡立宪，以及最终选择民主共和，他都不同程度地浸染其中，形成其色彩斑斓的政治生活图景。青壮年时期，马相伯对世俗政治曾抱有极大热情，尽其所能提出许多改革举措，如初入山东潍县机械局的改革对策，担任朝鲜国王顾问的改革建言，调查轮船招商局的改革献议，以及为了洋务改革事业而出使美国的巨额借款等。凡此种种，虽然均无果而终，屡屡受挫，但这些探索和努力值得肯定，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引人深思。在传统观念依然相当顽梗的晚清社会，作为教徒出身的马相伯注定其不可能在政治上会有大的作为，而他在实践中也逐渐认清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全面腐朽。进入民国以后，马相伯的政治地位有了明显改善，他先后担任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袁世凯政府高级政治顾问以及后来蒋介石政府的委员等职，但时间均不长，也没有获得过多少实际的政治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马相伯只好被看做不成功的政治家”<sup>②</sup>。但另一方面，马相伯确实能够在历次政治变革中保持与时俱进的高尚品格。如：他一度对立宪政治表示

<sup>①</sup> 于右任：《百岁青年马相伯先生》，载《中央日报》，1939年4月6日。

<sup>②</sup> 朱维铮：《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72页。



赞赏,但清廷一再拖延的立宪行动,则促使他同情乃至认同革命。他曾受聘为袁世凯政府高级政治顾问,本想亲身感受一下新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当发现袁世凯的心事不在民主共和,而是热衷于帝制复辟时,他确实有所规谏,并有意回避一些诸如“筹安会”之类的政治活动,最后愤然而别。晚年的马相伯虽然很少直接参与政治,但没有停止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激烈抨击,坚决反对殖民主义文化侵略和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向往自由、平等、民主、独立、富强的社会。特别是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之际,马相伯旗帜鲜明的抗战立场,呕心沥血的抗战宣传,勇往直前的抗战斗志,为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和抗日战争最终胜利做出杰出贡献,赢得全国人民的普遍赞誉,被亲切地称做“爱国老人”。

与宗教改革、政治追求相契合,马相伯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自觉探索者,是深谙现代教育价值及其限度的思想领路人。所谓中国教育现代化,即指中国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教育转向以科学、民主、个性独立为核心的现代化教育的过程。这种转向当然“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简单否定,而是以‘中西融通,古今汇合’为基本旨趣”<sup>①</sup>。依据这一认识,我们不难发现马相伯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历史地位。如前所述,马相伯的新教育探索萌发于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以及旅欧的深刻反思:一方面,马相伯受惠于系统的中西学训练,入俗后又亲历各种社会生活磨练,当他

<sup>①</sup> 黄书光著:《中国教育哲学史》第4卷,引言,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的种种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主张屡屡受挫时,不能不使他去深入思考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及其教育问题;另一方面,美欧之旅使他开阔了眼界。他考察了英国、法国的一些著名大学,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习俗,从容地反思东西方文化教育差异,从而为日后选择“教育救国”奠定了基础。甲午战争惨败,戊戌变法流产,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亲人相继离世,这一切都使马相伯最终选择教育事业,并做出“毁家兴学”的壮举。他相继创办的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后改复旦大学)以及发起兴建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毫无疑问地贯彻了现代教育精神。“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是震旦学院的办学理念,“经世致用”则是复旦大学的价值取向,至于“无私纯爱、有教无类,民主作风、自治精神,正业居学、乐而有仪,兼容并包、自主研讨,博学雄辩、求真务活,身心并重、和谐发展”,更是马相伯长期从事教育改革探索的经验总结。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马相伯在探索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而是注意二者的有机汇合融通。诚然,马相伯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儒家传统教育有过激烈批判,对借儒学还魂的孔教会更是深恶痛绝,但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优秀成分,他手订的《复旦公学章程》(1905年订定)写道,若发现学生“有意唾弃国学,虽录取,亦随时摒斥”<sup>①</sup>。而他参与发起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更明确提出以“中西汇合”为办学指导方针。

<sup>①</sup> 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3页。



晚年的马相伯诸多人生体悟,认同“教育救国”价值,故能不顾年迈,矢志兴学。在他看来,“教育乃立国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非如革命仅一时之事,而不可一日或多”<sup>①</sup>。需要指出的是,他并非惟“教育救国”论者,而是强调教育价值功能的充分发挥离不开相应的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这一点,早在他担任朝鲜国王顾问期间所呈《上朝鲜国王条陈》中就表现出来,其改革“条陈”广泛涉及社会法律、经济建设及人才培养诸方面,教育改革只是其社会整体改革的一部分。其后,虽然越来越认识到人才素质及其培养在晚清社会改革中举足轻重的意义,但他认为,教育不可以脱离社会经济、政治发展而发展。他说:“不饥不寒,然后能教。”<sup>②</sup>而能否善教,在他看来,又是和“善政”与否密不可分。这可以说是他始终不渝的基本信念,也是他办学期间并不绝对排斥从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理想中的教育是与社会各职能部门相互推助、共同发展的。事实上,马相伯一度热衷的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之所以功败垂成,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初腐败的社会经济政治现状。这一点从一个侧面昭示人们,教育的独立及其救国功能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

由于认识到教育的救国功能及其限度,这就使马相伯

<sup>①</sup> 《教育培根社募捐小引》(残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398页。

<sup>②</sup> 《务农会条议》,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4页。



对当时学生运动持有较为理性的态度。以民族矛盾最为剧烈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为例,作为教育家,马相伯希望学生在关心国难的同时发奋学习。他说,“学生”的意思就是“学然后可以生。不学,那就不可以生了”<sup>①</sup>。他指出,青年学生在国难当头之际固然有“唤起民众”、“共救国家”的职责,但中国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乃在于科学落后,要求学生在校求学,必须努力学习,力求做到“手脑并用,研究与实验并重”,“以科学救国,以科学建国,以科学创造全人类之福利”<sup>②</sup>。当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因学潮准备辞职时,年近百岁的马相伯为之彷徨不安。他深知一校之长对大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特致函复旦大学学生,称“李校长劝诸君不必往南京,实为真的名言”,希望学生从长计议,“与其呼吁政府,莫如开导人民,街头巷尾,茶寮酒肆,皆诸君为国宣劳处也。务使彼等晓于自身之力量与其责任之所在,执干而起,戮力前驱”<sup>③</sup>。另一方面,马相伯极力反对国民党政府早期所制定的不抵抗政策,多次予以驳斥。当国是日非、民族危机迫在眉睫之际,学生们愤而上街游行,教授们公开向政府请愿,这在马相伯看来都是十分正常,是值得肯定的爱国主义行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相伯极力推崇德国民族英雄斐希特(Fichte)教授,认为中国教授们应以斐希特为榜样,主动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洪流之中,中国才有

① 《内政外交学风种种评论》,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09 页。

② 《新年告青年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912 页。

③ 《致复旦大学学生书》,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 592 页。



起死回生之希望。

##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与开拓者

作为教育家,马相伯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本书在考察其感人的办学事迹后必须回答的问题。

众所周知,马相伯“毁家兴学”之举是在其退出政坛、备尝生活艰辛后所做出的重大人生抉择。这一抉择也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失败后,整个社会所涌现的教育救国思想与兴学热潮密不可分。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1895—1920年乃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型期。<sup>①</sup>这一时代转型反映到教育上,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各种类型的中国近代大学相继出现。据学者统计,“由1895至19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其中4/5创立于转型时代”<sup>②</sup>。马相伯相继创办的震旦学院(1902年)、复旦公学(1905年,1917年改为复旦大学)以及参与发起的辅仁大学(1926年),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重要院校,马相伯所追求的近代大学精神在这些学校里得到不同程度的反映。

中国近代大学可以上溯至1895年10月2日由光绪皇

<sup>①</sup> 张颢:《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见《张颢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9页。

<sup>②</sup> 张颢:《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见《张颢自选集》,第111页。



帝批准、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的北洋西学堂(次年改为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大学”<sup>①</sup>。严格地说,应是“由中国政府行使教育主权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sup>②</sup>。也有学者说它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sup>③</sup>。与这依据美国大学模式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不同,马相伯于1902年底手植的上海震旦学院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极富个性的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是“中国最早创办的一所私立大学”<sup>④</sup>。但开风气之先的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马相伯在这一令梁启超“吾喜欲狂”的私立大学里再现了孔子办学“有教无类”以及早期书院自由办学的精神风貌,其“崇善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理念以及博大精深的“质学”(即科学)与“文学”为骨架的科学人文精神相结合的课程体系,特别是他所崇尚的学术自由及“民主自治制”,都充分显示了马相伯对现代大学精神的深刻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马相伯捐献其主要家产所创办的震旦学院,在师资及场地问题上主要仰赖于耶稣会帮助,虽然这种帮助可以视做接受马相伯巨额捐产的回报,但由于马相

① 王杰、张凤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创建问题之辨析》,见王杰主编:《学府史论》,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② 王杰、张凤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创建问题之辨析》,见王杰主编《学府史论》,第20页。

③ [加拿大]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 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0页。

④ 许有成:《马相伯与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纪念马相伯诞生145周年》,见宗有恒等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第202页。



伯、耶稣会与学院之间的复杂关系，学校管理权界日益突出。作为校长，马相伯不仅为震旦学院的办学旨趣、发展方向及课程建设制定了宏伟规划，而且亲临教学第一线，以精深的学问和高尚的人格引导学生，并注意吸引学生成立自治会，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但随着时间推移，耶稣会变旁观为干预，学院的“民主自治制”遭到严重破坏，课程设置也被肆意更改，最后学生们不得不愤而离校。从这个意义上说，震旦学院虽享有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的美誉，但毕竟体现出先驱者之创业艰难，它的首届学生也未能正常毕业。虽然继之而起的复旦公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震旦学院的血脉，除新招学生 50 名外，原震旦学生有 120 名转入复旦公学。但根据 1904 年颁行的“癸卯学制”相关规定及复旦公学官私共助性质，复旦公学只能算做高于中学堂而又低于大学堂的公立大学预备学校。尽管如此，马相伯、严复、夏敬观、高凤谦、李登辉等复旦功臣们并不计较学校的等级名位，甚至在民初已被教育部批准为“按大学办理”情况下也不急于改称大学，而是坚定地继承震旦学院的民主办学传统，务实地坚持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殚精竭虑，不畏艰难，“努力前程”（孙中山题赠），致使学校声誉日隆，四方才俊闻风响附，像大学者陈寅恪、大科学家竺可桢曾就学复旦公学。据 1917 年追踪调查，1908—1911 年复旦公学高等正科毕业生共 56 名，其中近半数成为教育工作者，其余分别选择出洋、驻外事务、政府部门、报社主笔或编辑等工作，绝大多数成为栋梁之才。1912 年夏，马相伯离任后，李登辉校长继承马校长的优良办学传统，同时结合时代需要



不断创新,从而实现了从复旦公学向复旦大学的转型(1917年),经过20年不懈努力,终于把复旦大学办成举世瞩目的中国一流大学。

与震旦学院、复旦公学不同,马相伯精心设计的函夏考文苑并没有成为现实。但他对中国最高学术研究的追求,对中西高等学术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把握,特别是他所揭示的内藏高深的学术文化精神和美好的道德建设目标,以及“不干政治,上不属政府,下不属地方”的学术独立性设想,都为我们当代高等教育改革留下值得深思的宝贵遗产。

至于辅仁大学,马相伯虽然未能参与具体创建,但他与英敛之一起长期商讨、联袂发起之功则是不可埋没的。从民国初年《上教宗求为中国兴学书》,到辅仁社的创办、中辍、重建,以至于1925年精心起草的《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稿》,马相伯始终与英敛之密切配合,共同奋斗,并最终建成公教大学——辅仁大学,从而极大地改善中国天主教教育长期落后的形象,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整体跃进。方豪曾深有感触地说:“没有英、马二先生的上书教宗,请求设立高等学府,恐怕到今天也不会有辅仁大学,而先后毕业或肄业于辅仁大学的中国神父,当然应该承认是叨英、马二先生之赐。如果说远一点,没有马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中国天主教人才的培养,文风的提倡,不知要落后多少年!”<sup>①</sup>尤其可贵的是,英敛之在创办辅仁社过程

<sup>①</sup> 《怀相伯与敛之,念万桑与润农》,见《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第2575页。



中发现了旷世奇才陈垣,马相伯审查了其部分学术研究成果后也大加赞赏,甚至引以为“真余师”,而陈垣正是后来辅仁大学的著名校长。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承认马相伯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想转型期重要教育家,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开拓者,对已进入晚年仍然做出如此贡献的前辈教育家不能不致以深深的敬意!

### 三、近代大学理想的不懈追求

近人谈大学理想者,很少不提及约翰·亨利·纽曼的《大学的理想》以及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其实,蔡元培的老师马相伯在大学理想方面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和思考,可供后人借鉴。

依据英国教育家纽曼对“大学”的理解,大学就是指“一个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sup>①</sup>。这种普遍知识是十分广博的,是由许多知识分支构成的有机整体。他反对学生过分囿于一门学科,主张大学应该包容各种学科,并赋予思想自由、学术自由精神。他说:“虽然学生不可能攻读对他们开放的所有学科,但生活于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人中间,耳濡目染,受其熏陶,必将获益匪浅。……一大群学识渊博的人埋头于各自的学科,又互相竞争,通过熟悉的沟通渠道,为了

<sup>①</sup> [英国]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页。



达到理智上的和谐被召集起来,共同调整各自钻研的学科的要求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学会了互相尊重,互相磋商,互相帮助。这样就造就了一种纯洁明净的思想氛围。”<sup>①</sup>在这样相互争鸣而又宽松自由的氛围中,学生才能养成“以自由、公平、冷静、克制和智慧为特征的终生思维习惯”<sup>②</sup>。

与纽曼思想相契合,中国近代教育家马相伯虽然没有对“大学”下过精确的定义,但他对大学理想的把握与实践,则与纽曼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受过良好的中西学知识的系统训练,又曾亲身考察西方著名大学,马相伯对人类知识进化与发展确有较全面的理解,对大学精神也能持有较理性的认识。纽曼曾说:“人类理性运用于三大领域:上帝、自然与人。现在我们暂且把神学放下,来谈一谈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两者分别从属于人类理性,从而形成了两类学问:有关自然的被称为科学,有关人类本身的叫文学。被如此考虑的文学与科学大致构成自由教育的内容。”<sup>③</sup>令人惊奇的是,马相伯在1902年底创办震旦学院所立下的办学理念即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其中,“崇善科学”,主要指崇尚西方的科学知识,“注重文艺”,则并非指注重狭义的文艺知识,而是指广义的东西方人文知识。加拿大学者许美德教授把“注重文艺”翻译成“to emphasize both

①②③ [英国]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第22页,第22页,第121页。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up>①</sup>，无疑是准确的。马相伯所厘定的课程，即是以“文学”与“质学”（即科学）为核心来架构其十分广博的知识体系，甚至连希腊文、拉丁文也囊括无余。复旦公学期间，马相伯继承了震旦学院的学术传统，声称其课程设置，“略参东西名校通行章程规定”，容纳了各种人文及自然科学知识。至于其理想中的函夏考文苑，更设想贯通中西学术，对“理义学”（相当于人文社会科学）和“形质学”（相当于自然科学）展开深层次研究。他精心设计的辅仁大学，其课程建设则包括有神学、哲学、中外文字、自然科学、社会学、历史学、矿质学、建筑学等内容，力求将中西古今知识熔于一炉，称：“今之所创，一本斯旨，凡欧美新科，最新最确者，则以介绍于中华，中华旧有之文学、道学、美术等，莫不善善从长，无敢偏弃，持此物此志以周旋而已矣。”<sup>②</sup> 这一博大精深的知识架构，体现了马相伯对大学理想的深刻理解和真挚追求。

其实，马相伯关于大学理想的思考，不仅限于对大学高深知识的理性认识，他对大学的思想自由、民主自治乃至文化使命也不乏新颖见解。为了倡导自由教育，纽曼先生指出：“自由”从语法意义上看，“它与奴性（servile）一词相

① Ruth Hayhoe. Towards the Forging of a Chinese University Ethos: Zhen-dan and Fudan, 1903—1919. In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83, London, p. 329.

②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8页。



对”<sup>①</sup>。同理,为了破除封建专制主义“奴隶之学”,马相伯进而提出要在“自由”的基础上追求“自主”,要求学生做学问必须独立自主,求真务活;强调学科教学,“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的自由研究之风”<sup>②</sup>。至于学生中思想不一、信仰各异,马先生并不计较。甚至因讥讽时政而遭清廷追捕的于右任,马相伯也能够藉其博大的“有容”精神,乐之为东道主,将其收归门下。在学校管理上,马相伯从创办震旦学院时即厘定“民主自治制”,要求学生照“自治规程”,参与学校民主管理。而一旦“民主自治制”遭到破坏,马相伯便别无选择地与学生们站在一起,重新构筑其心目中的大学理想。从复旦公学到复旦大学,虽然学校的具体管理体制并非毫无变更,但马相伯所开创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和民主治校传统则始终薪火相传,并融入复旦大学校歌之中——“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sup>③</sup>,成为复旦大学永葆生机的精神血脉。至于大学的文化使命,乃是大学作为国家民族精神象征的应有之义。马相伯在抗战期间特别要求大学生勿忘国耻,要求大学教师以德国民族英雄斐希特教授为榜样,要求国人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都不要忘记国家民族利益,都充分体现他对大学所承载的民族文化使命的独特认识。这一点,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国难

① [英国]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第27页。

②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56页。

③ 参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1卷(1905—1949),第111页。



时期特别阐明“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昭示师生要牢记“本校所负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sup>①</sup>，在“精研学术”的同时，不要忘记“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sup>②</sup>，可以说是不谋而合。

#### 四、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性与民族性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固然要以西方为榜样。中国高等教育要走向现代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吸收西方科学教育及学术知识精神。这一点，马相伯深信不疑，声称“欲革命救国，必须研究近代科学始”<sup>③</sup>；而要真正掌握西方科学精神，除了要通晓其语言文字外，更要研究其科学教育背后的宗教、哲学和政治传统，了解其学术知识的传递系谱。

正是出于如上考虑，马相伯 1902 年手订的震旦大学课程计划既容纳近代西方的物理学、化学、象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农圃学等科学教育内容，又把古文（如希腊文、拉丁文）、今文（如英吉利、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文字）、哲学、历史、舆地、政治等列为常设课程。至于宗教，则依据近代西方“政教分离”通例，将其逐出学校，但这并不表

①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 年，第 44 页。

② 竺可桢：《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第 43 页。

③ 于右任：《为国家民族祝马先生寿》，见复旦大学校史编写组编：《复旦大学志》第 1 卷（1905—1949），第 56 页。



明宗教没有价值；相反，马相伯十分注意阐发宗教的精神价值、教化功能及其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晚年参与发起公教大学——辅仁大学时，马相伯进而认为，“神学”作为学科之一，可与“哲学”并列，纳入学校课程体系。<sup>①</sup>

吸收西方教育的科学人文精神，归根到底乃是为了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向世界教育的现代化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引进外来文化教育不能不注意中国的学术传统和国情民性。诚然，马相伯对封建专制主义教育以及为袁世凯复辟张目的孔教会做过激烈批判，直言孔子教育思想中的夷夏之辨、读书做官、德上艺下等观念不符合现代教育精神，指斥以孔子之道为国民教育之修身大本，与近代教育民主化背道而驰，强调以繁琐主义和空虚主义为特征的儒家经学教育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实践，极不利于创新精神和独立人格培养，与共和民主旨趣亦格格不入。但另一方面，马相伯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儒家治学、立志、大丈夫精神以及民本自治观念，对墨家的逻辑知识和积极向上的平民人生态度，均给予不同程度的肯定。他1905年手订的《复旦公学章程》特别注明，凡投考者若“有意唾弃国学”，即使录取之后，也将随时开除。针对西方某些传教士欲以“彼文彼语，以化吾文吾语”的文化殖民主义<sup>②</sup>，以及国内学术界日益严重的全盘西化倾向，马相伯深以为忧。他

<sup>①</sup> 《美国本笃会士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58页。

<sup>②</sup> 《致英华》，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00页。



沉痛地说：“一国有一国的文化精神，一国有一国的语言文字。尤其是我国自数千年的历史，当自家知道爱护发扬它！……如果一律要数典忘祖，老夫认为很可痛哭！”<sup>①</sup>

为了理性地吸收西方教育的科学人文精神，同时能够巧妙地彰显中国优秀文化教育的民族特性，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族性得以相融共进，就需要对中外文化教育学术进行多维比较和整合。马相伯曾就中西哲学、西方学术概念的本土化翻译，中西治学方法，中西艺术表现，中西政治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讨，给后人留下十分深刻的智慧启迪。诚然，马相伯关于中西文化教育的比较汇合只是一家之言，比如：他认为孔子谈不上“有什么哲学思想可言”，就可能引起争论；他把“Philosophia”译为儒家经典《大学》中的“致知”，也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采纳。但是，他的种种努力，提醒国人要时刻注意中外文化教育的理论会通，并在会通过程中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中国学术体系，则值得肯定。马相伯理想中的函夏考文苑，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校订旧译，厘正新词，其目的即是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将“欧美新科”与“中华旧有之文学、道学、美学等”融为一体的公教大学——辅仁大学之办学宗旨，也是为了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现代大学，并进而“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sup>②</sup>。

① 《宗教与文化》，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566页。

② 《美国本笃会上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460页。



国家之光 人类之瑞

民族性离不开世界性,中国高等教育不能不吸收世界高等教育的先进办学理念与经验,努力追求教育现代化理想;同理,世界性也离不开民族性,世界高等教育的繁荣需要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积极参与。高等教育改革中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不仅是当年马相伯力图解决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附

录

## 马相伯生平大事年表\*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 1岁

4月7日出生,原籍丹阳,寄居丹徒。原名志德,学名斯臧,又名钦善、建常,改名良,字相

\* 此年表侧重于教育文化方面,重大事件参酌编入。不同说法,力求择善而从。除主要查阅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钱智修《马相伯先生九十八年谱》(载《中央日报》1937年5月16日),李天纲《罗马档案:马相伯为何出走徐家汇》(收入其所著《心同东西》),以及方豪等学者考证文章、马相伯孙女马玉章先生口述材料外,笔者还参考了廖梅编《马相伯生平简表》(收入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附录),夏林根编《马相伯生平事略年表》(收入宗有恒、夏林根编著《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张若谷编《马相伯先生年谱》,薛玉琴、刘正伟编《马相伯年表》(收入其所著《马相伯》)等。特向以上诸位先生深致谢意。



伯,或湘伯、芴伯。传说《文献通考》作者马端临为马相伯的第二十世祖。祖父,马行乾;祖母,郭氏。祖父母“合葬于丹阳北门外贡家村后”。父亲,马松严,名尊仙,字岳熊,号锦华,既经商,又行医,被戏称为“卖布郎中”。母亲,沈氏。父母均信奉天主教。马相伯出生满月,即受洗为天主教徒,取名若瑟(Jeseph),亦号若石。有兄弟5人,姐1人,他排行老四。长兄,马明学,早年夭折。二兄,马建勋,原名志新,学名绍良,又名钦荣、建勋,字少良。三兄,马钦福,早年夭折。大姐,名字不详,嫁上海富商巨擘朱朴斋,所生次子朱志尧,后成长为中国近代民族企业家。幼弟,马建忠,原名志民,学名斯才,又名钦良、建忠,改名乾,字眉叔。

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 5岁

入私塾读书,既阅读“教中经典”,又接受儒家“四书”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在私塾中虽然年龄最小,却是“学童领袖”。好奇思妙想,求知欲旺盛。

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 6岁

弟马建忠生。

1851年(清咸丰元年) 12岁

只身搭乘内河民船从镇江来上海,进入刚成立1年的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上海依纳爵公学(又称徐汇公学)。

1852年(清咸丰二年) 13岁



年仅7岁的马建忠亦入依纳爵公学学习。

是年,至南京参加江南乡试,所试首题为《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落榜。

1853年(清咸丰三年) 14岁

因国学有根底,深得热爱中国文化的意大利籍教士晁德莅器重。受聘兼任本校国文、经学助教,“一面当学生,一面做先生”。

1854年(清咸丰四年) 15岁

学习法文与拉丁文。曾随公学老师参观上海洋行、外国兵舰。

1857年(清咸丰七年) 18岁

获公学文科奖赏。

1858年(清咸丰八年) 19岁

获公学圣学奖赏。

是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订《天津条约》;太平军声势日盛。全家转至上海避难。上海法国领事馆欲聘请先生为秘书,先生谢绝,曰:“我学法语,是为中国用的。”

1859年(清咸丰九年) 20岁

又获公学圣学奖赏。